



# 学术研究

6

XUESHUYANJIU 1984

## 目 录

### · 经济特区研究 ·

- 加快全面改革步伐,把深圳特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梁 湘(5)
- 从深圳特区新的工资制度看我国工资改革的方向……………李克华(13)
- 必须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卓 炯(20)
- 开放金融市场刍议……………黄定龙(29)
- 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研究……………邓宏海(35)

### · 青年论坛 ·

- 谈谈哲学的社会功能……………刘德福(41)
-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徐伟新(43)
- 从社会生产系统探索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李树申 杨萃吉(46)
-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李秀林(53)

###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的两个问题……………李江涛(60)
- 海瑞哲学思想述评……………李锦全(65)

### ·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

-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颜泽贤(70)
- 谈谈信息论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梁桂全(74)
- 清顺治年间的吏治……………蒋祖缘(77)
- 中法战争期间的广东防务……………唐上意(85)

丘逢甲爱国思想的发展	刘圣宜 (91)
· 开发岭南的先驱 ·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何维鼎 (96)
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	杨应彬 (98)
如何评价苏轼	王季思 (101)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吴定宇 (104)
略论教育投资负担	黄静波 (109)
· 新书评介 ·	
有益的探索 崭新的见解	
——介绍章沛的《思维规律论》	亦 黄 (115)
读《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罗东升 (117)
· 来稿摘编 ·	
企业将才的素质	郭敬山 徐仲华 (119)
普通中学改革的根本点在于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孙喜亭 (120)
丘逢甲“挟款潜逃”辩讹	徐博东 (121)
林则徐与云南少数民族问题	林有能 (122)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郑之洪 (124)
· 书海酌蠡 ·	
“雀”辨	刘树华 (34)
关于《碧梧苍石图》题词	官桂铨 (103)
“屯，难也”辨	张桂光 (69)
《商颂》难句试释	晁福林 (84)
· 学术动态 ·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惠州举行 (64)	广东经济学界讨论招股集资问题
论点综述 (126)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八月至九月) (127)
《学术研究》1984年总目录	(128)
封面设计	王造星

CONTENTS

Step Up the Tempo of an All-round Reform and Rai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Region to  
a New Level  
..... Liang Xiang ( 5 )

A Tendency towards China's Reform of the Wage  
System As Exemplified in the New Wage System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Region  
..... Li Kehua ( 18 )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Commodity Economy  
Should Be Re-evaluated  
..... Zhuo Jiong ( 20 )

A Few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Opening Up of  
Money Markets  
..... Huang Dinglong ( 29 )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ocial Economic Benefits  
..... Deng Honghai ( 35 )

An Approach to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Production As Viewed from the System  
of Social Production  
..... Li Shushen and Yang Cuiji ( 46 )

The "Logic" of Building a Typically-Chinese  
Socialist Society  
..... Li Xiulin ( 53 )

Tw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Mutual Conversion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Socialist Society  
..... Li Jiangtao ( 60 )

Comments on Hai Ru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	Li Jinquan (65)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eign of Shunzhi of the Qing Dynasty .....	Jiang Zuyuan (77)
Military Defen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no-French War .....	Tang Shangyi (85)
The Evolution of Qiu Fengjia's Patriotic Thinking .....	Liu Shengyi (91)
Su Shi's Social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in Ling Nan (Su Shi --- a great master of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Song Dynasty) .....	Yang Yingbin (98)
How to Evaluate Su Shi .....	Wang Jisi (101)
Discussions in Hong Ko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Masses" and "the Adoption of a National For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	Wu Dingyu (104)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nvestment Burden of Education .....	Huang Jingbo (109)
<b>Recent Academic Trends</b>	
<b>Random Notes in Reading</b>	
<b>Book Review</b>	
<b>Extracts of Contributions from Our Readers</b>	

# 加快全面改革步伐，把深圳特区 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梁 湘

## 一、深圳特区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今年，在中央和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经过全体干部和职工一致的努力，深圳特区各条战线更加活跃起来，各项工作在一九八三年已获得的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主要是：

（一）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有新的突破。全市一至六月共签协议五百零六项，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协议投资总额十八亿三千多万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一千万港元以上的大项目二十二个，已经投入使用的资金五亿九千多万港元。在已签约的项目中，工业项目达四百一十六项，占百分之八十二。这些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设备是比较先进的。

（二）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新的发展。至六月底止，工业总产值达五亿五千五百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八，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三。新投产工厂五十一间，已移植了一批新产品，如东风牌豪华型改装汽车、磁头、抹音头、888K 收录机、石英钟、汽车节能点火器、油性建筑涂料等等。

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后，进一步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今年早造又获得了大丰收。蔬菜、生猪、三鸟、塘鱼上市量均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蔬菜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活鸡出口增长百分之十九。

（三）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一至六月份完成基建投资六亿零三百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四，占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一。竣工面积九十五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四十七万五千平方米，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和百分之一

百二十六。各项工程的优良率达百分之四十八。

（四）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一至六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八亿六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三。出口商品总值四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四。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三亿二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地方财政收入一亿九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地方外汇收入四千六百多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四。

（五）改革步伐有所加快。上半年，对市政府的机构又一次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将计委改为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掌握经济信息和开展市场预测；设立了工业发展委员会，作为工业引进和企业管理的权威机构；设立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制订市政建设规划；设立咨询委员会，起特区建设的“智囊”作用。同时，撤销市府办公厅辖下的几个工作处，分设基建、财贸、文教、农牧四个办公室，协助市长、副市长了解情况，协调关系，检查督促，指导工作。在组织人事制度方面，采取群众推荐、组织考核、上级委任的办法，改革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结构；机关推行岗位责任制和干部考核制；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选举聘用合同制；学校实行任期制；吸收干部采取公开招聘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明显。各级党组织抓紧了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全市三万多名党员参加了轮训，占党员总数百分之八十八。九十个县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改进作风，增强团结。查处了一批以权谋私的案件。“文明礼貌月”活动有了新的成效。针对不良倾向，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社会风气良好，社会秩序井然。

我们今年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绝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存在的问题，更须看到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今年初，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来特区视察之后，四月间，党中央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确定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接着，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赵紫阳总理提出了在今后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要积极办好经济特区。最近，谷牧同志又提出深圳特区要当好对外开放城市的“排头兵”，成为体制改革的先行点。而现在全国改革与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这无疑对深圳特区建设是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但也必然对我们这个“窗口”提出更艰巨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

这样，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圳特区面临的新形势，增强办好特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新任务，树立新作风，加快全面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努力把特区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不断开创新局面。

## 二、迅速把特区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深圳特区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加快速

伐，迅速地把特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区建设新水平的标准，是看是否充分发挥了作为技术窗口、知识窗口、管理窗口和对外政策窗口的作用。衡量“四个窗口”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关键是要看引进外资工作是否有较大的进展；引进先进技术是否有新的突破；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转移是否有新的成果；经济效益是否有明显提高，等等。一句话，就是体现在特区发展的一定规模和一定水平上。

最近，根据特区近几年发展的情况，参照内地一些城市和香港近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制订了深圳经济特区“七五”规划。这个规划总的目标是，力争到一九九〇年，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文明昌盛和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初步设想是：

（一）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型城市。“七五”期间要完成基建投资七十五亿元，城区面积由现在的三十平方公里扩大到六十平方公里，将罗湖、上埗、福田、沙河、南头和蛇口逐步联成一片，做到城建布局合理，市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城市人口由现在的二十五万人发展到四十五万人，人口素质有较大的提高。

（二）国民收入比重的构成有较大变化。现在比重排列的次序是：建筑业、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到一九九〇年，要转变为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工业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九八三年百分之十八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转口贸易，使特区成为转口贸易的商埠。商业发达，市场繁荣，成为汇集全国名牌产品、土特产品的“橱窗”。中外合资、客商独资企业的产值要有较大的增长。形成一个以先进工业为主，兼营农牧、商业、住宅楼宇、旅游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三）工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先进工业，形成一定规模的电子、纺织、轻工、精密机械、建材和石油化工的生产能力。加快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话、电厂电站等交通、电讯、能源的建设。一九九〇年达到平均每五至六人有一部电话，区内居民生活燃料实现煤气化。

（四）技术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兴办一批新兴科学技术产业，首先是兴办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光导通讯、生物工程等新兴工业；传统工业的装备有一大批达到八十年代先进水平。同时通过举办技术交流会、先进产品展销会和经济管理研讨会等形式，转移先进技术，传递科学信息，逐步发挥出技术窗口的作用。

（五）管理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要用新的技术装备工业、交通、电讯、建筑、商业、金融、旅游等行业和城市管理部门，逐步实现管理工作的自动化、电脑化、科学化。同时要培训出一大批精通企业管理的人才，使特区成为培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

（六）精神文明建设有新的面貌。文化、体育、卫生设施与特区建设同步发展，普及高中教育，办好深圳大学，兴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科技工业园。文化、体育活动活跃，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丰富。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井然。逐步形成一代新



风，培养出一代新人。

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这是特区发展的重要标志。一九九〇年正是特区建立十周年，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以雄辩的事实，为党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英明决策提供更为有力的论据，并向全世界显示出我们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其次，这是特区发挥“四个窗口”作用的具体体现。技术就是生产力，一定水平的技术反映在一定水平的生产上。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就在许多领域里将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吸收进来为我所用，“窗口”的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第三，这是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一九九〇年之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新的振兴时期。我们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将为“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国外一些经济界人士预言，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我们深圳特区位于西太平洋经济圈之中，其经济上的起飞，将显示我国所蕴藏着的经济活力，并对增强我国人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实现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实现“七五”规划还会碰到许多困难，但是，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实现这些指标有许多有利因素：有党中央、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后盾；特区“六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为实现“七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区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必将更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特区货币的发行，二线管理的实施，以及各项经济法规的完善，将使特区各项优惠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交通、能源、电讯的不断改善，将进一步增强特区对外资的吸引力；随着整党的深入开展，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必将得到加强，党风、民风，社会风气肯定会更为良好。这些，对特区经济发展必然起着促进作用。

同时，“七五”规划的各项指标是经过反复调查测算提出来的，是实事求是和留有余地的。例如，我们提出到一九九〇年工业总产值要达到六十亿元，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工业年平均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是较为扎实、符合实际的。只要我们努力作好工作，积极创造条件，把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引进来，是完全有可能完成或超额完成这些指标的。

纵观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所花的时间都不太长。新加坡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大约用了二十年；香港经济的起飞，也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能办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也一定能够办到。我们应该对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充满信心，并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改革和开放两件大事

为了实现上述远大目标，当前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改革和开放两件大事，以改革促开放，进一步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

#### （一）加快全面改革的步伐，迅速建立适应特区经济特点的管理体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深圳特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改革成

就，必须面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继续探索解决。最近市委对全市的改革重新作了部署，提出全特区要从局部的改革转向全面的改革，从单项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今后的改革，主要是向配套、综合、全面发展，而改革的重点，仍是要改掉那些妨碍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妨碍特区商品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具体内容要抓好如下十个方面：

1. 计划与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今后特区的计划是要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即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掌握经济信息，搞好市场预测，制定指导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按计划要求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要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计划指导，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特区的物价改革，要建立适应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非商品收费和由国家、省、市统一掌握的计划价格的商品，可实行控制价；大多数商品，如一般日用工业品、小商品、农副产品等，可根据供求关系，随行就市，实行自由价格。特区的物价要逐步与国际市场挂钩。

2. 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实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行政管理机构不要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国营企业要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并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客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内联企业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好企业中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群众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起监督作用。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所有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法规的原则下，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都应有自主权，并有权发行股票和债券。总之，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能够对国际市场变化作出迅速、准确、灵活的反应，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3. 流通领域的改革。总的要求是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性流通体制，放宽政策，鼓励竞争，把生意做活，形成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继续大力发展为群众生活服务的集体商业、个体商业和修理服务业。商业门店要普遍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要积极鼓励适销的农副产品进入特区，进一步办活农贸市场。特区的进出口贸易，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凡是国家没有出口配额的产品，可以采取企业自营出口、工贸、技贸、农贸联营出口等多种方式，开拓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单位要普遍实行创汇承包的自负盈亏的经济责任制。物资供应体制要打破现行的批发层次和地区、行业的界限，实行商品流通制度，建立各种形式的贸易中心，进行商品交换，使产销和购销直接见面，把物资流通搞活。

4. 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的改革。财政方面，要破除财政只管收支，不管经营的老框框，要利用多种办法，多种渠道，广集国内外资金，以财生财，发展特区经济；对事业单位的财政，应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税收方面，要统一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中外合

资、合作企业的税种和税率，使他们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金融体制方面，要充分发挥特区中央银行的作用；要抓紧培训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银行的业务，要向多元化方面发展，进行业务交叉，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要积极向中央要求尽快让一批外资银行开设分行和公布外资银行管理法；要抓紧筹办四间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发行及代理发行有价证券业务；要积极筹备发行特区货币，在特区货币发行之前，对引进的外资包括侨资港资实行优惠汇率。

5. 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不同作物和项目延长承包期限，鼓励农民向土地投资和开发性经营，努力发展商品生产。要进一步调整农业布局，改革农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要搞好农村供销社的改革，使供销社逐步成为供销、储运、技术等综合性服务的中心。

6. 基建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区的土地使用必须适应于引进外资，特别是引进先进技术项目的需要，审批程序必须简化，要和签订协议同步进行，已实行的工程招标、投标的作法，要总结提高，通过立法，坚持下去；建筑单位的职工实行合同制，要加强建筑地盘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和经济效益；基建行业要继续坚持多家经营，提倡竞争，搞好土地开发，做到规划一片、建成一片、投产获益一片，并实行建筑产品商品化和土地使用商品化。要逐步取消公房低租高补贴的制度，实行单位补贴，个人集资购买住宅的办法。

7. 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简政放权。要按照精简高效的精神，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层次。要扩大特区内五个区和宝安县的自主权。行政部门要建立干部岗位责任制，以做到职责分明，提高办事效率。今后，凡下面单位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报告，要在十天内予以答复，到期不答复的，则视为同意，下级可根据报告内容执行，出了问题，由有关领导部门负责。

8. 人事组织制度的改革。重点是突出“放”字和“活”字，要逐级下放人事管理权限，采取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逐步缩小委任干部范围，积极推广群众推荐与组织考察和选举聘用相结合的方法；要加强对干部的考试和考核工作，对新调入特区的干部一般都要经过考试，对已在特区工作的干部，也要定期进行考核；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严格按照“四化”的要求配备干部。

9. 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低工资、多补贴的工资制度。企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浮动工资、计件工资等多种工资形式；党政机关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单位的工资改革，实行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年功工资的工资制度。工资改革要同福利事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实行住宅商品化结合起来。总之，各种形式的工资改革，都是要把职工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果挂钩，把个人对国家的贡献大小和表现好坏相联系，做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克服平均主义。

10. 口岸管理体制的改革。口岸要为对外开放政策服务，应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各口岸单位都要搞好改革，进一步简化出入境手续。本着既严格管理，又简化方便的原则，建立二线管理制度。

**(二) 以引进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工业项目为重点，在利用外资工作上大做文章。**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以引进先进技术为中心，加强生产性项目的建设，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只有把先进的工业生产项目搞上去，特区的经济才有牢固的根基，才能充分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一九八四年我们要抓好一批重点项目的引进，并要做好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切实抓好洽谈、签约、建厂、投产四个环节，建立专项、专人的责任制，保证早投产、早见效。

为了使引进外资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我们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要加强领导。由市领导同志和专家相结合，组成强有力的班子，分工负责联系美、日、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客商和重要项目的洽谈，把考察、洽谈、签约、投产、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抓到底，抓出成效来。

二是要广辟渠道，把引进工作搞活。如通过我驻港机构、香港工商社团和金融机构广泛联系，引进项目。还应加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工作，将更多的港资、台资、侨资引进特区。还要利用多种途径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人才。香港一些朋友提出，特区可以对口聘请国外退休技术人员来特区工作，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三是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客商普遍反映，目前特区的土地使用费、土地开发费、养路费、电费、水费、电话费等标准过高。我们要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凡是不应收费的，应坚决取消；收费过高的，应作适当调整。在税收方面，税务部门要按照优于香港的原则，尽快研究出一个特区税法报中央审批。还要拟定特区有关税收减免的优惠规定。

四是重合同，守信用，提高办事效率。今后，凡经市政府批准的合同，双方都要切实遵守。需要改变合同条款的，要经合作双方同意并报市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同时，要认真改进工作，提高办事效率。

五是要积极发展内联，特别是要做好与中央各部的联合工作。通过与内地联人才、联技术、联设备、联资金、联产品，搞通产品销售渠道，发挥其吸收和转移技术的作用。

六是要积极扶助客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尽量帮助解决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使客商有利可图，尝到甜头。

七是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有计划地邀请港澳和一些国家新闻界人士来特区访问，通过新闻媒介宣传特区。并在国外召开特区经济研讨会和特区投资促进会，印发特区投资环境介绍材料、摄制介绍特区的电影和录像带，多方面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三)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外开放、经济开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要切实加强政治思想

工作，克服软弱无力的状态。要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深入开展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要搞好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的建设，保证所有适龄儿童上学。要大力提倡群众办社会公益事业，鼓励私人办学、私人开诊所，鼓励和支持外籍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在深圳兴办学校和医疗卫生事业。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来发展和繁荣特区的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要按照现代化城市的要求，加强市容卫生和绿化工作的管理。同时，要继续抓好打击经济严重犯罪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以及民兵建设等工作，使特区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

请 订 阅

## 《青年论坛》

**《青年论坛》**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我国第一家面向广大中青年的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今年十一月向全国发行。**《青年论坛》**以改革创新为旗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特色，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体化的问题，研究当前青年中带普遍性的各种思潮和重大理论问题，为广大中青年提供讲坛。

**《青年论坛》**将开辟改革研究、改革前线的报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西文化比较、当代社会思潮研究、青年学者小传、各地报刊青年论文文摘等栏目。发行对象是机关、城乡厂矿企业自学青年，大专院校学生、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各级宣传部门、共青团组织，各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文化馆。

**《青年论坛》**为双月刊，每期0.60元，欲订者，请从邮局汇款至武汉市武昌东湖路附50号**《青年论坛》**杂志社发行部。单位集体订阅，份数较多者，可通过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武昌水果湖办事处，帐号66—194。

# 从深圳特区新的工资制度 看我国工资改革的方向

李克华

深圳经济特区先是从涉外企业开始进行了工资改革，继而在有关国营企业也进行了与涉外企业相协调的工资改革探索，而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却一直没有进行实质上的工资改革，只在增加补贴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而旨在与涉外企业、国营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协调中进行修修补补。实践表明：第一，沿袭内地的工资制度，一些平均主义的弊病已经阻碍了特区生产的发展；第二，近年来在事业单位采取的低工资高补贴（补贴一般达100元左右）的修补做法，一是并未解决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工资协调问题，二是从理论上来说高补贴实际上是压低了V，把一部分V采取了m的形式上缴给财政，然后再从财政拿出一笔钱，采取补贴和社会福利形式，用按人头、平均主义的做法发还给个人；第三，这种旧工资制的因袭还违反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前提，深圳特区对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讨论，通过对几种方案的比较研究，从中择优。终于在今年八月份开始，试行了《深圳经济特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引起了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心工资改革的同志的高度重视。

深圳特区试行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新制度（以下简称深圳事业单位工资新制），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即以基本工资为基础，加上职务（职称、岗位）工资，再加上年功工资（即工龄工资）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工资制，按照深圳特区的说法，是将过去的工资等级制改变为工资分解制。

在“三位一体”的工资总体构成中，基本工资部分主要以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不分干部职工，都规定统一的标准——75元。职务（职称、岗位）工资部分，则随职务、职称、岗位的升迁而升降。比如：根据职务，从二级办事员到市长划分为15个等级，始级为65元，终级为320元。高低悬殊相差4.9倍。年功工资部分，即工龄津贴，以5年工龄为享受起点，满5年工龄每月发5元年功工资，以后每增一年工龄增发1元，但对到了退职退休年龄不办退休者也不增发年功工资。深圳干部职工队伍年龄较低，据测算，全部职工平均工龄为10.5年，年功工资月人平也为10.5元。比方

说，一个正县科级干部，工龄为15年，则其工资总额为：75元（基本工资）+165元（职务工资）+15元（年功工资）=255元。这就是深圳事业单位工资新制的总体概念。

## 一、深圳事业单位工资新制的基本特点

这种工资新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职级与薪酬一致。就职称工资来说，划分为教授（含相当于教授职称的研究员、主任医师等——下同）、副教授、讲师、助教、见习助教（技术员）等五大类。在这五大类中每类人员工资并不统一，不搞平均主义。同一职级中不同水平的人员报酬各异。比如副教授，划分为三等：水平较高者职称工资为265元，次之为240元，再次之为215元。讲师也分190元、170元和150元三个不同级别档次。因此，职称工资就划分为5大类13个档次。

第二，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工资水平比较接近。从深圳特区这几年试行工资改革的情况来看，据测算，涉外企业人平月工资收入大体上在160—200元左右。而事业单位推行工资新制后，人平月工资收入水平约为174元左右。企、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基本协调，改变了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收入以往存在的劳酬不均的情况。

第三，工资构成比例比较合理。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工资大体上由基本工资、奖金补贴所构成，其比例约为7：3。而深圳事业单位的工资新制据测算表明，基本工资、职务（职称、岗位）工资、年功工资三者之间的比例为43.1%：50.9%：6%。后者的比例要比前者的比例合理，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得比较充分，平均主义的流弊较少。

第四，工资与物价、财政收入的升降增减基本协调，体现了生产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职工生活水平提高三同步。深圳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1983年达到6.73亿元，为1978年的10.7倍。1980—1983年四年国民经济总值超过三十年（1949年至1979年）的总和。1983年财政收入达2.99亿元，比1982年增长82%，超过特区前三十年总和，试办特区四年累计为6.5亿元，等于前三十年的1.23倍。前三十年财政收入年平均递增0.1%，试办特区四年平均每年递增70%。特区的物价，从总体上看比内地高一些。居民生活消费值1983年每人月平均达53.8元，比1978年上升60%。推行事业单位工资新制后，每月人平收入174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与深圳特区财政收入、物价水平还是相协调的，是完全符合生产发展、国家多收、职工个人多得的要求的，是合理的。

第五，保留了与内地相同的合理的奖金制度和特种工种的补贴制度。深圳特区事业单位工资新制规定，施行改革后，为鼓励广大职工关心特区的经济效益，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拟根据全市工农业生产与财政收入情况，每半年或一年发一次奖金，数额限于一个月工资水平。另外还规定，实行新制后，除了取消诸如物价补贴、粮差补贴、边防补贴、煤气费等补贴之外，还保留国家统一规定的如从事有害、有毒的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的补贴。

第六，坚持工资水平的浮动性。除了职工个人收入的份额随职务、职称的升迁而变

动外，深圳特区事业单位工资新制还强调了今后工资水平是浮动的。市政府拟根据全市工农业生产与财政收入情况，并以严格的考核制度作保证，确定各类人员的工资升级（加薪）幅度，做到工资水平经常作浮动性的调整。

### 深圳事业单位试行工资新制的客观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事业单位试行工资新制，是对传统的工资旧制的重要突破，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大胆尝试。应该说，这一工资新制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首先，这一工资新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生产要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的。传统的观念认为，工资问题只与按劳分配规律相联系，而一般不提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联系。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律，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其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讲的是生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又与分配有关，而分配又涉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采取工资这一形式。当然，先有生产后才有分配和消费。但分配和消费对生产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问题在于，这个消费（这儿只谈生活消费，舍象生产消费）或叫个人消费品分配，是只限于维持劳动者再生产在萎缩状态下的消费？还是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维持劳动者扩大再生产的发展状态下的消费？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创造条件不断满足后者而不是前者的要求。陈云同志讲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其实就是指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这是对以往“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挑战，提出了我们应重新思考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关于个人需要或者说是个人消费，是划分为三个层次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应从较低的消费层次创造条件过渡到较高的消费层次。我们的工资制度就要不断解决这个问题。深圳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我看就是为着解决或不断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尝试，其结构工资制中的基本工资部分，就是考虑了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的生存需要。干部职工本人生存需要部分，是按照48元考虑的，接近深圳特区50元左右的生活消费值；而以一个职工赡养1.56人计算，包括职工本人在内定为75元，这就基本上满足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存需要。而职务（职称、岗位）工资部分，再加上年功工资部分，就是为着在生存资料的消费需要之外，为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进行补充的。多劳者，相应地在发展和享受需要方面就要多满足，否则就少满足。因此，我认为，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

其次，这一工资新制也遵循了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工资制度所要改革的，就在于



要改掉“干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做法，让“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原则树立权威。邓小平同志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指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工资旧制没有树立按劳分配的权威，而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在这方面就有所前进。诚然，结构工资制中的基本工资部分，采取大拉平的方法，似有点平均主义的性质；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为解决人们的基本需要，即生存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须保障的。但就从职务（职称、岗位）工资部分而言，职级与报酬一致，是符合按劳分配客观规律要求的。有人会说，职位和级别，似乎对“劳”考虑不够。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职级所以有别，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工作能力）有别。能力有别，劳动（工作）的数量与质量也有别，报酬也体现了有别。要知道深圳特区是决不会把实际劳动（工作）能力较差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的，而且实际上也打破了职务终身制。其二，职级似乎只体现工作能力，但工作能力与劳动能力是一回事。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不能只把体力劳动者称作劳动者。由此可见，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不但符合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原则的要求，而且正是以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原则作为改革的主要依据的。

再次，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遵循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报酬上相区别的原则。所谓简单劳动，“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58页）。而复杂劳动则指经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因为它“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同上书，第228页）。因而，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或加倍的简单劳动。可惜，传统的工资旧制忽视了这一点，为今天我们改革工资制度造成了许多不便。深圳特区事业单位试行的工资新制就是以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新制所反映的工资水平来看，职务工资的最高级为820元、职称工资的最高级也为820元，而岗位工资的最高级则为155元。从某种相对意义上来说，大体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反映在工资报酬中的比例为2:1。这种比例是否合理尚可研究，但起码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符合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在工资的分配上体现了老、中、青干部（职工）的利益同时兼顾。工资旧制的其中一个毛病是：对老干部（职工）和新干部（职工）都片面强调资历与工龄。工龄长者，不管干得怎么样，都一样拿较高的报酬；工龄短者，干得再好，也只能领取较低的工资。在内地试行的工资改革探索中，有的单位又“矫枉过正”，干脆把基本工资拿出来进行全浮动，结果新职工年轻力壮拼命干，拿的报酬多；老职工年老力衰，在劳动的竞争中落在新职工之后，所得报酬少于原来的工资，养家糊口都有困难，特别在体力劳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其中一个依据或叫原则就是体现劳动贡献的积累，再加上一条是鼓舞人们上进而提职提薪。这就把新职工的上进心调动起来了，又适

当照顾了老职工的利益，把老职工的积极性保持下来，从而达到了职工队伍的安定团结。职务（职称、岗位）工资，既尊重了老职工利益，又调动了新职工的积极性；而年功工资，与考勤、考绩相配合，却较多地考虑了老职工的利益，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年功工资实际上体现了对过去积累的劳动贡献的尊重。每个人都要经过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发展阶段，工资新制也体现了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这样一来，就兼顾了新老职工各自的物质利益。深圳的工资新制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二、深圳经验对全国工资改革的借鉴意义

以上所议的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是对工资改革的一个尝试。尽管可能还会有某些不足，但大方向是对头的，可行的。至于某些不够完善的规定，如职务、职称、岗位工资始级水平大体一致，似在这方面没有很好研究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比例的折合等，这只是在工资改革中如何不断加以完善的问题。

那么，深圳特区事业单位推行的工资新制对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具有那些借鉴意义，对我们从事工资改革的探索又有那些启示呢？

首要的一点就是，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非改不可。这个“非改不可”并不只限于理论上的抽象研究，而在于应该付诸改革的实践进行探索。在这几年的工资制度改革探索中，企业单位倒是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企业在自己享有的权限内，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工资改革试验。而在内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除了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了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的改革试点外，基本上还是保持过去的平均主义一套做法。因此，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事业单位的改革就要递延落在企业单位之后，造成内地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水平的新的不协调。而要着力于从事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关键又在于国家从宏观上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有总体改革方案，并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有相应的自主权。现在，深圳特区在这方面给我们划出了经验，当有助于国家劳动工资部门以及事业单位认真思考工资改革问题，把事业单位工资制度非改不可的问题付诸改革实践。

其次，在某些方面，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具有相同特点，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工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表现在报酬方面职级不符，劳（工）酬不一致。按理说，社会主义应该全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工资旧制中真正体现似乎不足。提降职务（职称）与工资升降不协调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能不是事业单位有的工作人员不求进取的一个主要原因。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就要以深圳经验为借鉴，致力于解决好这方面与企业单位相同的问题，从而调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祖国四化建设献计献策献力。

再次，深圳特区推行的工资新制的一个特点是工资与物价相挂钩，工资升降与财政增减相联系。工资、物价、财政收入“三挂钩”应作为我国工资改革的方向定下来。深圳规定，物价指数上升3%以上，工资相应增长3%以上；工资水平不固定，要根据特区生

产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适当加薪。我认为这个做法很好。这是因为，工资与物价挂钩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因物价的升涨而降低，这是改革的最起码的要求；工资的增减与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这既把上述问题解决了（因为财政收入一般都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增加的，相应就要增加工资水平）；又符合了社会主义要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着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这一改革方向是对头的，全国的工资改革也应以此为借鉴，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全国工资制度应朝着逐步取消补贴，改暗补为明补，即把补贴份额作为工资份额的方向进行改革。深圳已经这样实行了（保留从事有害有毒工种的补贴，严格说来是营养补贴，这是必要的），受到了干部职工的欢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早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种补贴从表面上看是 $m$ ，其实本应是 $V$ 。只不过先压低 $V$ ，把本应是 $V$ 的一部分作为 $m$ 上缴，国家又从 $m$ 中拿出来作补贴。这样做，工作烦琐不说，就对干部职工而言，因为补贴（如粮食、农副产品等购销价格倒挂的国家补贴等）不发给个人，摸不着看不见，对他们的积极性的调动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该改暗补为明补，改形式上的 $m$ 为实际上的 $V$ ，还 $V$ 的本来面目，这样从财政来说，实际上并未减少真正的收入。一旦改暗补为明补，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第五，应循着“中等工资水平、中等物价水平、中等消费水平”（简称为“三中”）的趋势要求来改革工资制度，保证工资、物价、消费同步并进。改革前，深圳工资水平尽管与内地相比还是高一些，但与特区本身的生产发展水平相比还是不协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深圳本身而言，工资水平还是低于其总体经济效益（此类数字上面已述）的提高幅度的。改革前，大体上全民所有制企业人平月收入为125元，而国营事业单位要低于国营企业单位月人平收入。改革后，国营事业单位的人平月收入据测算为175元，而改革要求事业单位工资水平与企业单位（含涉外企业和国营企业）工资水平一致，国营企业单位的工资水平也会进行协调性的调整的。从这来看，改革后不是工资调低，而是根据生产发展和财政收入的情况而适当提高。过去，经济学界传统的观点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下简称“三高”）政策不加分析地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三高”政策是否就没有一点合理因素了呢？应该承认它有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工资、物价消费需求的同步增长的协调性。把“三高”政策加以革命的改造，根据我国的国情条件，就可用于为劳动人民造福。在我国试行上面所述的“三中”政策也未尝不可以。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三低”（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向着“三中”发展，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任何人都不可逆阻：（1）从近几年的经济生活现实来看，物价水平是有所上涨；工资虽未作大的改革，但奖金上去了，职工收入还是增加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始点，逐步向着发展资料、享受资料的需求方面进取，说明消费水平还是相对

提高了。(2)从理论上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是社会主义要通过发展生产而使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对消费需求应该从较低层次(生存需要)向较高层次(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发展;按劳分配规律要求按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多消费,这是必然的辩证之理。(3)中央的方针,发展经济是为了摆脱贫困、生活富裕,到二〇〇〇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二番,而工资水平也将成倍增长,全国人民要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田纪云副总理最近也指出,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中等工资中等消费。由此可见,工资、物价、消费三协调,从“三低”开始向着“三中”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而逆转的客观趋势。工资改革就应该循着这一趋势前进,而不应该倒退。这也说明了,坚持工资、物价、计划等体制改革的协调性与同步性,应纳入体制改革的总系统中通盘思考,才能使改革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工资改革不宜一刀切。试点的面不能单一,因为事业单位性质各不相同,划分成多种门类,每一个门类都应试点,才能从特殊中探索一般的规律。“不宜一刀切”的含义,还包含改革的模式不强求一律,改革后的工资水平不强求划一。允许有的地区或部门根据自身的财力及物价水平等因素,作符合本地、本部门特点的改革探索。深圳特区推行的工资新制,就其原则、精神、方向来说,都是可以借鉴的,但不一定强求各地工资水平与深圳一致。毕竟内地的情况与深圳不同,不能全部照搬照套。

一九八四年九月



# 必须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

卓 炯

## 一、要认识商品的二重性质

在马克思《资本论》体系中，关于商品有两段不同的论述，充分说明商品具有二重性质。有一段论述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sup>①</sup>另一段论述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任何判断。”<sup>②</sup>

从第一段论述来看，作为商品的性质是同生产方式没有联系的，只要经历交换过程和发生形态变化，就是商品。这种形态变化就是商品变货币，货币变商品。这是人人都清楚的，从第二段论述来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又必须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否则就不知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特征。所以不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商品的性质，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商品的特征。因此，商品或商品生产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

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却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说成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因此，只有在两个原因同时存在时，才有商品生产。我们只要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质的原理，就知道私有制只能说明商品生产的特征，而不能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

其实，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分工，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有大量的论述，却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是从社会分工来论述商品生产的起源的，他说：“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sup>③</sup>“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

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④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⑤象这样非常确凿的历史事实却不被承认，是很难理解的。马克思也说过：“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⑥列宁也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⑦但是，不幸得很，有人甚至离开社会分工而强调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骆耕漠同志就是一个代表。斯大林也离开社会分工而强调所有权，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是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既然商品生产可以存在于极不相同的所有制之中，要想从所有制引出商品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如果不从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商品生产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的。我们要遵循马克思的商品和商品生产二重性质的观点来正确解决商品和商品生产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出路。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分工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而所有制只能说明商品生产的特征。树立了这个观点，必然承认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我们说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不是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是要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商品一般的共性，特性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者叫做计划商品经济和自由商品经济。社会分工不仅可以说明商品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而且可以说明它的未来，看它是否存在社会分工。关于这个问题，许涤新同志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似乎是有矛盾的。《辞典》在论述商品生产时承认了它的共性和特性，例如它说：“商品生产的共性，是为交换而进行生产，它有一个一般的基础，即社会分工。”（上册，第338页）但在论述商品时，又强调“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而这个历史阶段似乎只包括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提法是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货币的，但是当社会主义也出现商品经济时，我们就不能停留于这种说法了。我们认为，这两种提法是不矛盾的：一个是指它的共性，这就是社会分工；一个是指它的特性，即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商品，为的区别不同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我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的出发点。

## 二、要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既然商品或商品生产具有一般性，那末与商品经济有关的一系列经济范畴也应具有一般性，这就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所以所有经济范畴都以劳动为特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即独特的生产关系的范畴。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主要是讲生产劳动，什么叫做生产劳动？首先，生产劳动是从物质生产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就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马克思说：“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sup>⑧</sup>这就是生产劳动的第一种含义。

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含义，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sup>⑨</sup>我们要进一步问，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的答复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如果在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那末，绝对地说，这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存在的基础。”<sup>⑩</sup>

由于不少同志只看到这一面，就只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经济范畴。可是，马克思接着又加以说明：“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sup>⑪</sup>马克思在前两段中，用了两个“新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可是两者之间是有共性的，至于它们的社会性质，虽然是不同的，前者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后者是指社会主义制度。

从此还可以看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生产率，只要有这个劳动生产率就有剩余价值一般。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剩余价值应该与剩余价值一般有所区别。我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叫做无偿占有价值，把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叫做公共必要价值。作为一般劳动过程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就完全符合马克思以下的表述：“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⑫</sup>更何况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作为剩余价值一般的存在应该是毫无问题的。既然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劳动过程的范畴，那末，与价值和剩余价值有关的一切经济范畴，都是劳动过程的范畴，它的核心就是  $c+v+m$ ，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价值和剩余价值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价值规律也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规律，这就是价值规律的一般性。价值规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运行的时候，它才成为特殊的价

值规律。

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这种共性，因此，我主张建立一个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范畴就把它叫做资金。我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叫做社本（Social Capital）。

从一般劳动过程来看，马克思是从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开始的，这表明属于劳动过程的范畴，也属于商品的一般矛盾。但当进入所有制分析时，却多了一层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表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商品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也就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只有这种商品才能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或经济细胞。

马克思所论述的简单商品生产是以小私有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这种小私有制的商品生产进一步地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在看来，有必要建立一个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商品生产，这种简单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扩大商品生产，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属于扩大商品生产的类型。马克思所论述的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只要脱去所有制形式，就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商品再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

例如，马克思说：“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sup>⑩</sup>

由于马克思的这种表述，我们一直把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而长期不敢谈价值增殖，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价值增殖已经成为大家所认可的东西。农村提倡深加工以争取价值增殖正成为必然的趋势。因为没有价值增殖，农村就不可能富裕起来，而我们所强调的提高经济效益，实质上离不开价值增殖。

作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应该这样表述，即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扩大商品生产的过程。

所以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与扩大商品生产过程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价值增殖，后者有价值增殖。由简单商品生产到扩大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坏事。如果把价值增殖同资本主义剥削等同起来，那就是坏事。由于把价值增殖看作是坏东西，我们就把满足需要和价值增殖对立起来。其实，如果没有价值增殖，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只是一句空话。

### 三、要看到扩大商品生产的优越性

所谓扩大商品生产就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流通。从一般劳动过程来看，就是资金流通。资金流通的公式是： $G-W-G$ ，也就是货币—商品—货币。资金流通是对商品流



通而言的，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W-G-W$ ，即商品—货币—商品。从一般劳动过程来看，商品流通就是简单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就是扩大商品流通。要显示扩大商品流通的优越性，就要同简单商品流通作个对比。

首先，在 $W-G-W$ 中，两极 $W$ 和 $W$ ，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衣服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即使这种流通形式的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不等的，它也不会改变这种流通形式的性质，因为目的是满足需要而不是价值增殖。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的正常进行的条件。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需要为限。

相反，在 $G-W-G$ 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这就说明，这种运动可以连续下去而无止境。何况 $G$ 变成了 $G + \Delta G$ ，100元变成了110元。这就是价值增殖。如果这种价值增殖不能连续下去，例如，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不论窖存多久，不会增加分毫。又如把这110元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再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金。所以资金的特征就是要使价值不断地回收和增殖。这种资金必然要采取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才能不断地循环和周转，这就是商品经济的优越性。我们过去看不到这一点，对商品经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要大搞产品经济，对资金采取无偿调拨，不重视资金的回收和增殖，结果造成资金的大浪费。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现在应该清醒过来了。

如果能使价值不断地增殖，就会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社会的财富。至于增殖的目的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增殖，其目的是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增殖，其目的是增加劳动人民共有的财富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过去把生产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主义的绝对目的，看来是不科学的。把剩余价值本身当作目的只是扩大商品生产的一般目的。至于一种社会形式的生产目的是由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不能把这两种目的混为一谈。

作为资金流通，原预付价值100元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10元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就消失了。在过程终了时，不是100元原价值在一边，10元剩余价值在一边，而得到的结果是110元价值。这个价值和原先的100元一样，也完全适宜于开始新的价值增殖过程。货币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是占有使用价值，满足社会需要。相反，作为资金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金的运动是有限度的。但也不是说，只是为增殖而增殖，它总要分离出一部分来满足社会需要。那末，这个有限度的运动好不好呢？应该说，从社会发展来看，资金的无限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好得很。就拿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也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

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④</sup>为什么会创造这样大的生产力呢?就是靠的这种扩大商品生产。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所以,作为资金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持有者必须是企业家。作为企业家,货币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时,他才能执行资金的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企业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的利润,而是谋取利润无休止地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要采取的手段。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企业家。我们最大的缺点是受了产品经济的影响和简单商品流通的限制,不懂得运用资金以谋取无休止的价值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却懂得怎样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因此,在资金运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向资本家学习。

我们的党中央,强调发展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而是扩大商品生产,正符合资金运动的要求。为什么农民会首先富裕起来,成为万元户,就是因为有价值增殖。只要按这种价值增殖的办法去搞生产,全社会也会富裕起来。这就是说,没有价值增殖,没有剩余价值,富裕就成为一句空话,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其次,商品的价值在W—G—W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了。相反,在G—W—G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形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形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是化了装的存在形式。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这种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金是货币,资金是商品。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这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原价值的自身分离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生产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价值。这是扩大商品生产的优越性,也是它的必然性。不认识这一点,就会否定扩大商品生产的客观存在而形成历史的停滞或倒退。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期不能发挥优越性的客观原因。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交换中一直保存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100元,现在是110元,等等。但货币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金。因此,货币在这里不象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都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

且是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

我想，我们只要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性来理G—W—G这个公式，就不至于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特殊产物，把剩余价值和剥削等同起来。剩余价值只是价值增殖的必然产物，而价值增殖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承认这个客观过程，就必须承认商品和货币。没有商品和货币，价值增殖也成为不可能了。我之所以要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特别是扩大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我的立足点。

#### 四、向产品经济过渡是不可能的

现在不少同志还在设想将来一定会消灭商品货币，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理解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由如下：

第一，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sup>⑧</sup>

什么叫做价值决定？价值决定就是：

$C + V + M$ 这个公式

实际上也就是价值规律。这里的劳动时间的调节，就是指个别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谓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也就是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所谓簿记就是经济核算，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离开了价值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经济核算，使用价值是无法担当起这个任务的。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孙冶方同志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说：“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受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落后的、中间的和先进的企业为了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水准而不断进行的竞赛，也就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大道。”<sup>⑨</sup>很可惜，我们由于受到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影响，一直和价值规律对着干。孙冶方由于对商品经济发生了误解，也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既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商品、货币和价格，价值规律必然要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广泛领域中起作用。”<sup>⑩</sup>我们也可以说，价值规律的这种优越性也不是任何规律可以代替的。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价值简直成了联系经济的一条纽带，没有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无法组织起来。

我还发现：“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sup>⑪</sup>如果是这样，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消灭货币既不可能，未来就只能是商品经济。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生产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集中与分散并存，并且分散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

托夫勒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描写了一幅未来的商业世界，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他在能源方面作了描述。二次浪潮建立的生产体系是以不可再生的能源为前提的，特点是高度集中。新能源的特点，它是取自可以再生，而不会耗用殆尽的资源。它不须依赖密集的燃料，它所利用的是许多分散在各地的资源。在技术方面，将采取密集和分散的两种方式，而且是更为分散。这种分散的趋势可以减少浪费，因为可以用各种品质的能源来应付不同的需要。这种分散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即社会分工将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电子业和电脑业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电脑的成本急剧下降，而能量却惊人。今天，廉价的小型电脑即将打入美国家庭。家用电脑可以连接到银行、商店、政府机构、邻居和工作地点，它不仅会改变商业世界的面貌——从生产到零售，也会改变工作的性质，甚至家庭的结构。

其次是太空工业的发展动向。波音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产生能源的人造卫星和太空平台。科学家认为，许多高级科技的原料需要精密的控制，而地心吸力会形成干扰。但是，在太空中，不必担心重力问题，不需使用容器，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空、超高温和超低温。有一种血凝溶剂，地上制造每剂要二千五百美元，而在太空中制造，只需花五十分之一的代价。

再次是海洋工业。深海探险可能成为新科技环境中的第三种主要工业。海洋可帮忙解决食物问题。只要能善于经营，海洋可以无限量地供给我们最需要的蛋白质。海洋同时也供给人们丰富的矿藏，从铜、锌、铝到银、金、白金，甚至于有可制农业肥料的重要磷矿。

最后还有遗传工程，这是生物学的高度发展。遗传工程将有惊人的商业用途。遗传工程学者认为，每一项遗传突破将有其商业用途，消费者会被诱发新的需要，新科技将打开新的市场。

从现在的历史看，作为生产形式，只有两种：一是自然经济(包括产品经济)以实物为特征；一是商品经济以价值为特征。至于计划经济，它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只是生产形式的一种特征。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商品经济。

这就是我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的一种展望。我在六十年代曾经设想共产主义还是商品经济，这个观点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从现在来看，社会分工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有人批评我是商品经济万岁论，价值规律万岁论，我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说得好：“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sup>⑩</sup>我们只要相信马克思的这个观点，确立商品经济

还有长远的历史作用是有客观根据的。

- 
- ① 《资本论》第3卷，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63页，下同。
  - ② 《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注（73）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 ④ 同上，第159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162页。
  - ⑥ 《资本论》第1卷，第127页。
  - ⑦ 《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 ⑧ 《资本论》第1卷，第205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42页。
  - ⑩ （同上），第143页。
  - ⑪ 同上，第143页。
  - ⑫ 《资本论》第1卷，第243—244页。
  - ⑬ 《资本论》第1卷，第223页。
  -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1972年5月第1版。
  - ⑮ 《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
  - ⑯ 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 ⑰ 《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1984年10月11日。
  - ⑱ 《资本论》第2卷，第397页。
  - ⑲ 《资本论》第3卷，第718页。



# 开放金融市场刍议

黄 定 龙

开放金融市场，对于改革金融，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和信用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开放金融市场的有关问题谈几点意见。

## 一、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是金融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接触，进行各种金融工具或证券自由买卖的场所，即同类金融工具或证券同一时间受同一价格支配的区域。它是社会资金自由分配的一种工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生产的大规模发展，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已是改革金融体制、搞活金融、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其理论依据有五条：

1、开放金融市场是健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要内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除运用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外，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发展和完善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控制体系。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有代表性的是与商品供求有关的商品市场，与资金供求有关的资金市场，与技术（包括经济情报、管理经验）供求有关的技术市场等。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市场早已开放，并在不断发展。国家保护专利权，允许技术和经济情报有偿转让，技术的供求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国家允许科技人员合理流动，有些部门和单位开始实行干部、职工招聘制，实际上人才供求市场也在开始萌芽。商品、技术、人才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引起了资金的联系与流向趋于市场化，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资金市场的开放。否则，将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完整体系。

2、开放金融市场是打破单一间接金融方式，搞活金融的突破口。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阐明，资金的融通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开金融市场上，最后放款者与最后借款者互相接触的资金融通方式，称为直接金融方式。另一种是金融债务人与债权人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资金的借贷，称为间接金融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切信用集中银行，一切借款通过银行”的单一间接金融方式，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等信用形式受到严格限制。人为地割断了资金盈余单位与资金短缺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割断了资金的横向联系与流动，影响了货币向资金转化的速度，限制了金融规模的扩展，阻碍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改革金融必须要打破单一间接金融方式，

实行以间接金融方式（银行）为主，直接金融方式（市场）为辅的原则。这样，一方面通过银行有计划的集中部分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部门的资金需要。同时，开放金融市场，扩大自由借贷的活动范围，增加市场型金融资产，利用市场机制来灵活调剂各部门、各单位的资金余缺。另外，打破单一间接金融方式，还会给金融业带来活力。金融市场的开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及多种融资方式的出现，可以打破银行“独家经营”的局面，创造金融业竞争的条件，推动金融业提高劳动效率，改善服务态度，加快技术进步，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活动服务。

3、开放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主动调节货币流通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中央银行在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控制货币量和信贷量时，除运用指令性计划外，其一般性控制工具主要是储备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种，而在运用这三种工具中，公开市场业务则是最理想的一种主动调节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证券，如国库券、公债等以控制货币量及利率的活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央银行认为有收缩银根的必要，则应出售证券；反之，如中央银行认为有放松银根的必要，则可购入证券，以达到控制市场货币流量和扩张或收缩信贷的规模。因此，公开市场业务可由中央银行在任何时候主动进行，不致引起争议和人为的干扰，也不会对银行体系产生过份突然的冲击。储备率和贴现率的变动则不然，一旦确定之后，再次调整的时间相对较长，不仅容易引起争议和人为的干扰，而且对银行体系的冲击较大，无法适应经济活动经常变化的要求。显然，中央银行要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这一工具，必须要首先开放金融市场，并具有高度发达、相当深度、广度和弹力的证券市场。

4、开放金融市场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开放金融市场，允许企业发行股票、债券，为投资者在投资方向、投资方式、投资条件等方面提供多种选择；也为借款者在借款来源、借款方式、借款条件等方面提供多种选择，使资金的投向按资金效益的高低自由流动。一方面使社会资金自发地向投资效益高、收益率高的部门和企业流动。为那些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劳动效率高的企业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提供筹资的自主权。从而使这些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经济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把投资者和筹资者的经济利益直接结合在一起，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使资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关心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社会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

5、开放金融市场是建立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专业化的发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经济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的发展，以大中城市为轴心的经济中心正在形成。经济中心的形成必然要打破资金在区域间的流动，要求和推动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中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它可以运用货币、信贷、利率、结算等经济杠杆，通过融通资金和调节经济利益来调节生产和流通，为经济中心服务。金融市场是联接该经济中心区域内一切信用组织和各种资金的纽带，没有金融市场，金融中心这个体系是无法形成的。只有开放金融市场，提供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打破资金

纵向分配，条块分割的封闭式资金体系，使资金在区域间进行横向融通，才能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建立和发展。

## 二、开放金融市场的客观条件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开放金融市场的客观条件。

1. 有了一定数量的社会资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调整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逐年增加。1982年预算外资金达到885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的74%，1983年预算外资金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储蓄存款1984年6月底达到1012亿元，城乡居民手中的货币还有500亿元左右。同时，国家允许企业暂时不用的自有资金，通过合营、联营、补偿贸易等形式向企业外投资，也允许采用股份制形式发行股票集资办企业，这就给了企业投资和筹资的自主权。特别是农村“两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中有一部分人已聚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他们除了继续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外，需要寻求理想的投资方式，以充分发挥其手中资金的效用。上述大量的社会游资为开放金融市场准备了资金基础。

2. 出现了多种直接融资方式。近几年来，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直接融资方式相继出现。一是合资经营。现在，有些经济联合体通过发行股票筹集长期资金；有些沿海先进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也采取各种形式向内地直接进行投资；还有些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向个人发行股票，集资办企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市农民筹资创办企业已达8000万元以上。二是民间借贷日趋活跃。随着农村“两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互相借贷的民间信用很活跃。据对湖南常德市个体工商户的调查统计，全市有个体工商户1884户，在银行取得贷款的只有50户，而自由借贷的有280户，是银行贷款户的4倍多。三是商业信用的发展。国家允许有控制的开放商业信用之后，企业之间赊销预付，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较快。此外，有的银行还试办了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业务和消费性贷款。这些直接融资方式的出现，为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准备了条件。

3. 创造了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随着多种信用方式的出现，创造了多样化的金融工具。（1）国库券。为了筹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1981年至1983年，国家已经对单位和个人发行了132亿元的国库券，1984年又计划发行40亿元。（2）票据。为了加强对商业信用的管理，银行试办了票据结算业务，一些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商品交易实行了票据化。其中有企业承兑票据，也有银行承兑票据，银行从1984年三月一日起又在全国增加了汇票结算业务。市场上相继出现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3）股票。许多经济联合体实行股份制，发行股票；还有些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力，还向企业内职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因此，企业和个人手中有了不少股票。（4）债券。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筹措长期建设资金，向团体和个人发行了一些长期债券。（5）抵押契约。随着住宅商



品化的发展和房地产业的兴起，不动产抵押契约也已经出现。上述金融工具的出现，为开放金融市场准备了一部分筹码。

4. 建立了多种金融组织。实行中央银行体制以后，各种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已经分设，同一区域已经出现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等几家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另外，有些地方还创办了地方性的信托投资公司、城市金融合作社等集体性质的地方金融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正在恢复集资入股、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性质；个别经济富裕的农村还出现了私人金融机构。多种金融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建立，必然要求有一个互相融通资金、联系业务的纽带——金融市场。同时，上述金融组织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为金融市场的开放准备了机构和业务人才。

此外，有了比较健全的经济法规体系。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先后公布了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等法规，还有一些经济管理法规、条例正在起草和讨论中，也即将公布。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立法正在逐步完善，公众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加强。这也为开放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

### 三、开放金融市场的设想

金融市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的综合体，它不仅直接牵涉到千万企业和家庭的实际经济生活，而且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开放金融市场，不能一哄而起，要先搞试点，摸索经验，逐步开放。

1. 金融市场的业务。金融市场一般分为三大类，即短期资金市场、长期资金市场、外汇市场。根据目前的条件，可以先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开放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地开放。

(1) 短期资金市场。短期资金市场交易的业务对象是比较短期的证券，时间一般以一年为限，一年以下的证券和金融工具属于短期资金市场。短期资金市场交易的业务对象其偿还期甚短、流动性或变现力极高，风险极小，因此和货币差不多（故也称为货币市场），如国库券、商业票据、可转让存款单、同业拆放业务等。我国近期内短期资金市场业务可以开办以下五种：第一，经营国库券业务。改革国库券的发行办法，国库券的期限要缩短为三个月或六个月，最长也不得超过一年，并适当提高国库券的利率，使国库券的利率略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允许国库券进入公开市场买卖，使国库券成为单位和个人短期投资的一种方式。第二，试办无记名定期存款业务。银行可以试办单位或个人无记名定期存款业务，存款期限从半年至五年。银行可以把这笔资金用于中期贷款，持单人需要现款时，可以随时转让变现。第三，开展票据承兑业务。在国家允许的赊销预付范围内的商品交易可以采用票据结算。商业票据可以由企业承兑，也可以由银行承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票据承兑所，专门办理承兑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的业务。第四，开放贴现业务。国库券、经过承兑的票据和可以转让的存款单，既允许到公开市场上买卖，也可以到贴现市场上贴现。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可以专设票据贴现所，办

理票据贴现业务。没有条件的暂时可以由中央银行指定专业银行负责办理贴现业务，专业银行办理贴现业务的资金要经中央银行核定专门指标，设专户管理，票据贴现所和专业银行贴现资金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再贴现。第五，开展银行同业拆放业务。县级以下专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允许相互之间开展拆放业务；也可以通过贴现市场调剂资金余缺；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织银行同业存款市场，让那些暂时有资金多余的银行，把款存给短期需要资金的银行，各专业银行可以通过该市场进行资金调剂。

(2)长期资金市场。长期资金市场交易的业务对象是比较长期性证券，一般一年以上的证券和金融工具属于长期资金市场（也称为中长期投资市场），如公债、股票、债券、抵押契约等。近期内我国长期资金市场可开办两种业务。一是政府债券。国家除了发行短期国库券外，还可以发行较长期的公债券来筹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长期公债券的期限可以从五年至二十年。各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批准的计划范围内也可以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发展地方经济。允许政府债券转让流通。二是企业股票、债券。国家允许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体，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企业股票、债券可以转让流通。企业发行股票、债券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由信托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代为公开发行。

长期资金市场业务办理的机构，可先选择经济、金融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建立证券交易所，负责办理投资证券的发行和买卖。暂时还不具备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地方，由中央银行委托有关专业银行的信托部负责办理此项业务。参加证券交易的双方可以是团体投资人和团体使用人，也可以是个人投资人和个人使用人。

2.金融市场的管理。金融市场的开放将会大大加速货币向资金的转化速度，成为银行灵活调度资金的一种手段，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金融市场毕竟是一种市场机制，有一种自发的倾向，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1)要设立管理金融市场的专门机构。各级中央银行都要设立管理金融市场的机构，其职能是：协调、指导、检查、监督各金融组织在金融市场的经营活动，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动作，以保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审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开业，必须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后，才能允许开业；核批进入金融市场的专业银行办理市场业务的资金额度；发现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违反经济、金融法令，要进行劝导，对于严重违反经济、金融法规的金融组织要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其停业整顿。

(2)参与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分工。一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业务活动是代政府发行国库券；为专业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和直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控制与调节。二是专业银行：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批准的进入金融市场的“专项资金”额度内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对票据承兑所和票据贴现所提供短期贷款；发行无记名定期存单。三是其他非银行金融组织：经过批准

成立的集体性、地方性、行业性的金融组织，如地方自办的信托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城镇金融合作社等依法参加金融市场的活动。四是经过批准设立的票据承兑所、票据贴现所和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参加金融市场的经营活动。

(3) 金融市场的服务对象。金融市场现阶段服务的对象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国营企业、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地方政府、取得法人地位的农村“两户”和城镇个体经营者及有合法身份的城乡居民。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地方政府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企业、个人都可以用自有资金入股，购买股票、债券、国库券和定期存款单，并可持上述有价证券在金融市场上贴现、买卖和申请抵押贷款。

(4) 加强经济立法和金融立法。要保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必须要加强经济立法和金融立法，尽快制定出银行法、金融管理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有价证券发行条例等法令和条例，用法律办法和经济办法来管理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沿着正确道路发展。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 “雀”辨

刘树华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喙之锐出者，“雀”虽有喙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鄘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我以为，“雀”很可能是“萑”的讹字。

(1) “萑”有“角”。《说文》四：“萑，鸛属。从隹从丁，有毛角”。“丁”，据今人康殷考释，“即鸛的毛角形”，有“毛角”的鸛现在就称为“角鸛”(otus bakkamoena)。

(2) “萑”是“恶鸟”且能“穿屋”。在《诗经》中鸛的出现均与不祥和凶暴联在一起。《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鸛萃止”，此为不祥之征；《幽风·鸛鸛》：“鸛鸛鸛鸛，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朱熹注：“鸛鸛，鸛鸛，恶鸟。”这里鸛鸛的“鸛”一般写作“萑”，康殷云：“象鸛鸛探爪伸入鸟巢之状，含有侵入、危害、欺凌等意。”正类于《行露》中之“穿屋”。

(3) 从形体看，“雀”“萑”同从“隹”，字形又极为相似，前人因之而讹误非无可能。

# 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研究

邓 宏 海

近几年来根据经济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经济效益的概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提出这一概念后，原来对经济效果的一套解释又搬到“经济效益”的名下。这样一来，不仅理论上没有前进一步，反而给研究、评价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造成了混乱。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应用现代系统科学，对经济效益进行系统研究。

## 一、经济效益在生产效益中的地位

生产效益可以定义为生产实践的有益效果。生产实践，必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产生一定的结果（后果），分别说来，必然在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以至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产生一定的结果。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用结果，即为各个方面的效果，如物质效果和精神效果，或者环境效果、生态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以至艺术效果等等。生产实践在经济上产生的有用结果即为经济效果，构成经济效果实体的，可能是产品、商品、货币，也可能是劳务或其它各种服务。这些都是经济效果存在的具体形态。以这些具体形态出现的经济效果，在质上都有一定的效用；在量上都体现为用某种计量单位表示的绝对量。任何一种具体形态的经济效果，尽管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效用，但这种效用能不能实现，就要看对这种生产实践所依以进行的生产方式的主人翁是否在经济上有益，只有那些在经济上的给生产方式主人翁带来经济利益的效果，即经济上的有益效果，才是经济效益。

这样看来，经济效果与经济效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效果是指经济活动产生的在经济上有用的结果；而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产生的在经济上有益的结果。经济上有益与经济上有用，这在经济实际中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在经济上有用的不见得有益，但在经济上有益的必定要在经济上有用。至于判别在经济上有用的结果是否在经济上有益，那就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生产的目的、取决于这个生产方式的主人翁的经济利益。

与生产效果在物质运动形态上、时间上和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形态一样，作为生产的有益效果的效益在物质运动形态上、时间上和空间上也表现出不同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劳动生产的结果（后果）划分为社会结果与自然结果、直接后果与间接后果、近期后果与长远后果。同样，作为有效果的效益，也可划分为社会效益与自然效益、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自然效益包括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社会效益包括技术效益、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军事效益、社会效益（社会学效益）、艺术效益等。所有这些方面的效益按生产系统的结构组合起来，便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生产效益系统。经济效益就是这个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成分，或一个子系统。因此，生产效益的评价，按效益的物质存在形式来划分，可分为环境评价、生态评价、资源评价、技术评价、经济评价、政治评价、军事评价、社会学评价和美学评价等。所有这些有关方面的评价按生产系统的内在结构组合起来，就构成生产效益的综合评价（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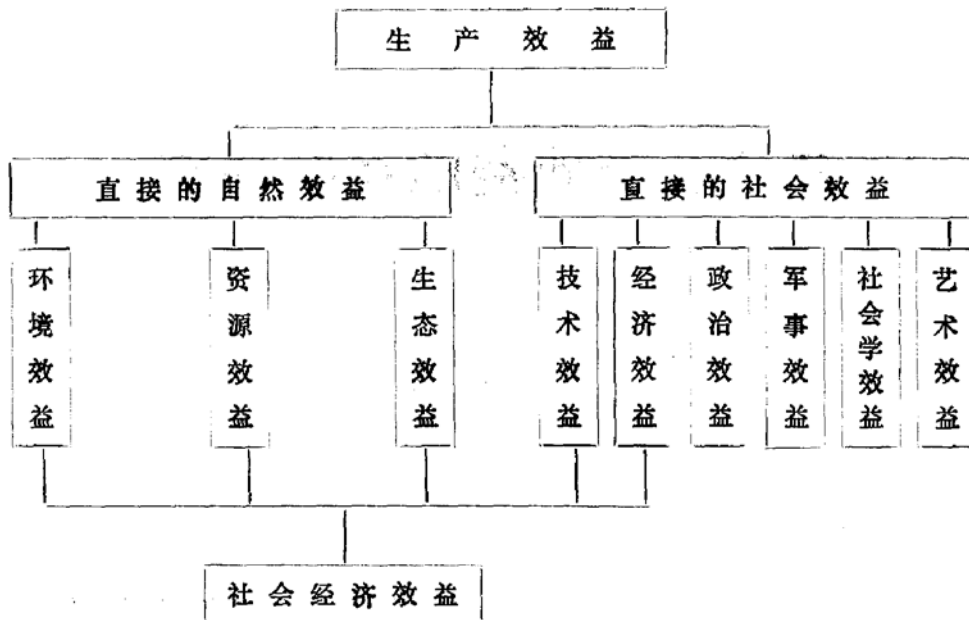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效益系统的结构

生产效益在质量和数量上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效益，是直接由生产的各种功能（产生一定效果的机能）分别决定的。生产系统的所有功能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有益效果，便构成生产效益。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是用货币单位计量生产系统的所有功能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有益效果，即计量这些功能在相互作用中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些功能在相互作用中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经济效益。分别来说，生产系统的环境功能、生态功能、资源功能、技术功能、经济功能等在其相互作用中各自带来的经济利益，就分别是环境效益、生态效益、资源效益、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经济效益按生产系统的经济结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它不仅从物质运动形态来看，而且从生产系统由微观到宏观、由点到线到面到整体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来看，都是多层次的。在此情况下，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及其各种组成成分，诸如环境效益、生态效益、资源效益、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等，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与分属于各个学科范畴的各种形态的生产功能、各种形态的生产效果在性质上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说，我们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是评价生产功能给生产方式主人翁带来的经济利益；我们对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是评价生产系统的整体功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我们对各种生产功能的效益进行经济评价，是评价各种

生产功能在相互作用中带来的经济效益。由此看来，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经济效益，是社会经济效益，它是生产系统整体功能带来的总的经济效益；狭义的经济效益，是指个别经济效益，它是由生产系统的经济功能带来的一份经济利益。二者不仅有严格的质的界限，而且有显著的量的区别。（1）作为“直接的社会效益”的一个方面的经济效益，是个别生产单位内部的经济效益，即通常所说的个别经济效益。它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也包含有人们通常所说的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或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一个方面。（2）作为个别生产单位内部效益的经济效益，是社会经济效益得以构成的基础；但后者又不是前者的简单相加。这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类的原因外，还要考虑环境效益、资源效益和生态效益对社会经济效益构成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一个生产单位在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净化了环境，节省了资源或保护了生态，并为别的生产单位提供了环境效益、资源效益或生态效益，即所谓“内部效益外部化”，则这个单位的社会经济效益会大于它内部的经济效益；反之，如果“内部费用外部化”，则这个生产单位的社会经济效益会小于它内部的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好反映着整个社会与个别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sup>①</sup>而经济关系又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而，按生产方式主人翁的经济利益来评价生产的结果，是生产结果评价的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效益的核心是生产实践为生产方式主人翁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也就是说生产效益系统的核心子系统是社会经济利益系统。

## 二、经济效益评价标准的系统性

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生产方式的主人翁不同，主人翁的经济利益不同，因而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的标准也不相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经济效益做过精辟的概括。他说：“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sup>②</sup>这说明，各种生产方式主人翁的经济利益都是寄托在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之上的。由于各种生产方式中这些剩余产品的经济形态、性质、结构和功能都是不同的，因而各种生产方式主人翁对这些剩余产品进行经济评价的标准也不同。

资本主义前的几种生产方式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尽管这几种方式的主人翁所追求的剩余产品的经济形态、结构、功能和数量有着根本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追求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谈到古代经济学家对生产效益的评价时说：“古代的著作家却是专门注意质量和使用价值。……他们偶然提到了产品数量的增加，他们指的也只是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丰富。他们没有一个字说到交换价值，说到商品的便宜化。”<sup>③</sup>这说明，在自然经济中，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对其总产品使用价值的比率是这种经济的主人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

价的标准。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价值；而商品价值的共同尺度是货币。因此，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价值的货币当量，就成了这种经济的主人所追求的目标，即他的经济利益所在。因而，这样以货币单位为计量单位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共同特点。但由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在不同商品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形态、性质、结构、功能和数量是不相同的。因此，商品生产的方式不同，其主人翁对生产效益进行货币评价的标准也不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主人翁是资本家，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在于用最少的资本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利益的实现程度，不是由它（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决定，而是由它对总资本的比率决定，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而是由利润率决定。”<sup>④</sup>因此，资本利润率就成为资本家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的标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主人翁是全体劳动者，全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在于用有限的消耗达到社会需要最大程度的满足。因而，满足社会需要就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以一定经济消耗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就成为全民对生产效益进行社会经济评价的标准。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还存在和发展着，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有上述共同的经济利益外，还存在着局部经济利益的矛盾。这种情况决定了对各个社会主义生产单位的生产效益必需进行货币评价，并且评价的标准还要采用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价值的货币当量与其经济消耗的比率。这一比率，尽管在数量上可能等于利润率，但其经济形态、性质、结构和功能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有本质的区别。因此，这一比率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的利润率，我们这里叫做效益率。

过去把经济效益与经济效果混为一谈，把二者都说成是“所得”与“所费”之比，或者说是“产出”（output）与“投入”（input）之比，或者说是效果与劳动消耗之比。这其实不是经济效果，而是经济效率。某一经济活动或某一经济系

统的经济效率就是它的所得与所费之比，或它的产出与投入之比，或它的效果与劳动消耗之比。

用“经济效果 =  $\frac{\text{效果}}{\text{劳动消耗量}}$ ”这个公式表示经济效果，不仅在数学上说不通，而且与各学科（从力学、物理学、化学到生物学、生态学）对“效率”这个概念的普遍定义相抵触。各个学科通用的“效率”这个概念，都是指输出（output）与输入（input）之比。因此，为各学科所通用的这个“效率”概念，规定了经济系统产出与投入之比，或所得与所费之比或效果与劳动消耗之比，只能是该系统的经济效率，而不是经济效果。前者是相对量，后者是绝对量；前者是商数，后者是被除数。这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就像生态效率是对生态功能作用的有用结果——生态效果的相对量度，技术效率是对技术功能作用的有用结果——技术效果的相对量度一样，经济效率是对经济功能作用的有用结果——经济效果的相对量度，而不是经济效果本身。经济效果本身是有一定物质形态的客观存在，可以用某种计量单位表现为某种绝对量，如产量、产值、净产值等；也可以用效率（输出与输入的比率）表现为某种相对量，如百分率和系数等，这就是经济效率。既然经济效率是经济效果的一种相对量度指标，而不是经济效果本身，那就更不能等同于经济效益了。

这样看来，包括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和生态效率在内的生产效率，是评价生产功能的标准；包括经济效益率、技术效益率和生态效益率在内的生产效益率（利润率）才是对生产效益进行经济评价的标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效率与利润率是作了严格的区分的，他说：“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用。”<sup>⑥</sup>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不仅是两码事，而且是有矛盾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系统（企业或农户）各种生产功能的生产效率（包括生态效率、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等）与其决定的生产效益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效益率随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在生产效率提高到某种水平后，效益率便会随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这时，效益率便成了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数量界限。只是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这一界限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要广阔得多，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益率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能允许生产效率更加迅速地提高，而不致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 三、社会经济效应的结构

由于生产系统是由生态（环境）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组合而成的综合系统；生产结构是由生态（环境）结构、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交织而成的立体网络结构；生产力是由生态（环境）功能、技术功能和经济功能结合而成的整体功能，因而，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就相应地由生态效益、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而成为综合效应的。这就是生产效益系统的社会效益子系统效益结构。

社会经济效应的这一结构，是生产系统结构和功能在其经济效益上的表现。在生产系统中，生产的生态子系统，往往既包括有它的环境系统，又包括有它的资源系统，则生产的生态效益，就相应地包含了它的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这就是说生产系统在自然环境、生态和资源这几个方面的效益，在其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互相融合并统一表现为生态效益；这种生态效益又在生产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与它的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其内在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作用下结合起来，构成社会效益（图2）。

生产系统的生态效益、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直接由生产系统的生态功能、技术功能和经济功能在相互作用中综合产生的，尽管在经济评价中对这三种效益都是用货币单位进行统一计量的；但这三种效益是这三种功能分别按其内在的机制产生的。生产系统的生态功能是间接地通过影响产业资源的丰度和产业环境的质量来对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的技术功能，即生产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系统的功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各种能量和物质的利用效率或增加产量来增加社会效益的。生产系统的经济功能，即它的经济系统的功能，包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组合、产品、分配、交换和消费、经营及位置、规模和结构的选配等。这些经济功能都是通过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之间的变换来直接对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作用的。由于生产系统的这三种效益的形成机制不同，就导致在社会经济效益中出现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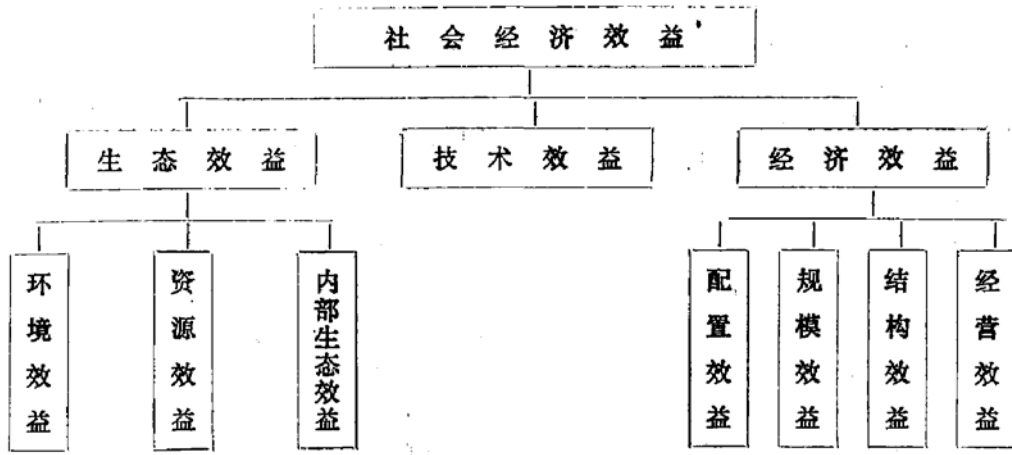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经济效益子系统结构

部效益与外部效益、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差别和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反映了生产的生态效益、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既有着统一，又有着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社会经济效益的这种复杂结构，生态(环境)效益在社会经济效益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人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自觉地去认识。自从资本主义国家对传统手工业实行工业化以来，人们只看到它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益，忽视它的生态效益；在其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前二种效益总是以内部效益的形式出现，而后一种效益总是以外部效益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内部效益，即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驱使个别企业搞产业现代化，只在提高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而不管生态(环境)效益的下降。资本主义产业因此受到生态规律的一次次惩罚，遭受一次次损失和挫折，直到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出现后，这些国家才不得不以经济效益、技术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结合上检讨已发展起来的产业，企图寻找将这三种效益相结合的新的产业模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这三种效益结合的根本障碍，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一些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三种效益结合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的经济效益、技术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这种情况使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生产的生态效益、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表现出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

的经济利益之间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在这最根本的经济利益上，三者是统一的。但三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有着局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三者在经济利益上的这种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情况，决定了三者对生产的经济效益、技术效益和生态效益追求的侧重点的联系和区别。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看，往往强调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从企业的经济利益来看，往往强调技术效益、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这些效益在形成过程和分配及再分配过程中的矛盾，在三者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统筹兼顾、协调解决的。2.生产的生态效益、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表现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利益上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但二者不仅在产品的交换上，而且在效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上存在着局部的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工业和城市，不仅可以通过剪刀差分享农业和乡村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直接享受农业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资源效益。因此，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必须将生产的经济效益、技术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3.生产的生态效益、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表现出产业内部的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关系。产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单位、各个人，尽管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经济效益的形成机制也相同，但由于所处的具体条件千差万别，生产效益的形成结构和分配及再分配结构也是千差



万别的。产业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个人在生产效益形成结构和分配及再分配结构上的这些差异，直接关系到这些部门、地区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要处理好产业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必须将生产的经济效益、技术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这三种效益有着互相结合的客观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还需我们对生产的这三种效益有综合的认识（评价）和综合的调控。只有在对生产的这三种效益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综合地采取一整套经济调节手段（包括价格、税收、补贴、信贷、经济立法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来调控这三种效益的形成、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

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产业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520页。
-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9～390页。
-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25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4页。



## 李匡武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出版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集《工具论》，已由李匡武教授翻译成中文，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填补了我国在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古典名著方面的一个空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恩格斯称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六篇逻辑论文的总称，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其中《范畴篇》以论实体、量、关系、质等范畴为主；《论解释》由对词、句的研究引至关于命题（判断）的学说；《分析前篇》系统地阐述了三段论推理问题；《分析后篇》论述证明、定义等问题；《论题篇》着重讲证明方法；《论诡辩式的反驳》论反驳。《工具论》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并且对这门科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何天静）



在广东社会科学界举行的咨询活动中，许多青年同志提出不少他们在学习和社会生活中碰到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在哪个理论环节上想不通而发生疑问，这些最好由生活在青年中间、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心理最熟悉的青年同志来议论、解答。于是，我们开辟了这一个《青年论坛》，希望正在学习、研究理论和有理论兴趣的青年同志来稿。

——编者

## 谈谈哲学的社会功能

刘德福

很长时间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轻视哲学的看法，或者认为哲学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远，便“不相与闻”，或者认为哲学是令人生厌的论证工具，“正确的东西能够论证，错误的东西也能论证，实际上什么也不能论证。”因此，“哲学无用”象梦魇一样缠绕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其实，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它对正在探索生活道路的青年一代本应具有的“深刻的哲学要求为之疲缓松懈”，①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

“哲学无用”思想的产生，首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哲学曾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来当作政治的婢女和证明的工具，从而败坏了哲学的声誉。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肆意歪曲哲学的社会作用。他们鼓吹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是政治，把哲学的作用仅仅归结于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为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从而把哲学歪曲成为一种可以论证任何错误乃至反动观点的变戏法，对我国人民进行精神讹诈。这是哲学蒙受的

奇耻大辱。但是，这无损于哲学自身的光辉。哲学的被沾污绝不能等同于哲学自身。我们不能因为曾受过硫化铜的欺骗就怀疑真金的存在。我们要把林彪、“四人帮”加在哲学上面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民族“现实的智慧”的本来面目，让智慧之光重新照亮我们前进的路程。

“哲学无用”思想的产生，还有其不可忽视的认识根源。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大胆追求，无疑是当代青年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但又不可否认，我们这些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学习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因而就其总体而言，理论思维的准备是不够的，对哲学这门抽象程度极高的科学就容易浮光掠影，浅尝即止，只满足于一些抽象的原理和规律，而不善于深刻地、准确地把握其抽象的词句后面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更不能如实地、全面地了解哲学的社会作用。

不错，哲学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黑格尔就讲过，哲学的研究好似猫头鹰一样，当黄昏到来时，它才起来。意思是说，当着一切思想材料都已齐备之后，才有条件作哲学概括。恩格斯也说过，离现实最远的两种意识形态，一是宗教，一是哲学，它们好象是悬在半空里一样。但仅仅是“好象”而已，并不是真实如此。哲学和现实、哲学和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学过西方哲学史的同志都知道，黑格尔生活的早期，在德国这个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却一度流行着轻视或蔑视哲学的社会思潮。黑格尔非常痛恨这种浅薄无知的作风，认为对哲学的轻视会导致一个民族的堕落，因此为哲学的社会地位大声疾呼。他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指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②哲学“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显示的。”③在黑格尔看来，惟有理解了一个时代的哲学，才能真正认识那个时代，对历史的见解才是深邃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这一思想，对哲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给予了充分肯定。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从“表面上”、而且从“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哲学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现实的智慧，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④恩格斯也曾指出，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地适应本世纪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既然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结晶，是文化的活生生的灵魂，那么，它迟早总有一天不仅从内部（即在内容上），而且从外部（即在形式上），来触及和影响当代的现实世界。

可见，哲学虽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问，但它决不是一种盘旋在太空、没有根基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那看来抽象的概念、范畴、规律和原理记录着时代风云，凝结着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类由低级向高级、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每个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那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产生的、以在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则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

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就使他们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意识到时代赋予它的伟大历史使命，承担起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彻底地改造世界的重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全部革命活动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我们党的各种政策决议，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部科学著作，不管是理论方面的或者是实际政策方面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正确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表现。中国革命实践表明，我们党内无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不能够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思想方法方面背离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路线，走上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道路。这其中包括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五年以前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尤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为甚。他们不是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为了彻底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从世界观上加以分析清算，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根源。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为了清除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而写的。这两篇光辉哲学名著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揭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不同方面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错误；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著作和其他科学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了全党，指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个历史经验充分证明，能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到革命的成败。那种把哲学看做是和实际生活或工作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哲学的社会功能表现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又在社会变革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这已为古今中外人们的历史实践所证实，也正在被我们当前的实践所检验。正在我国进行的重大改革以及各方面所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就是基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讨论。正是这个讨论，成了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的先导，为我们全面的拨乱反正、为当前所开展的重大改革、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开辟了光辉灿烂的前程。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没有用了，而是更加有用了。实现四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在向科学的进军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向导和指路明灯。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学科越分越细，边缘的、综合性的学科越来越多，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础性的工作。但也要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精神武器，善于进行哲学思考。这样才能开阔自己的思路，解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征途上所面临的

问题和困难。没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sup>⑤</sup>更谈不上会有什么科学的建树了。

由此可见，任何对哲学的误解和轻率的怀疑，都是对这门科学的社会功能缺乏正确认识的反映。我们必须清除社会偏见，正视和恢复哲学应有的权威。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有志于做合格的、清醒的、站在时代前列的、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建树的青年朋友，都应当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哲学素养作为第一位要求，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①黑格尔：《小逻辑》，第2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1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

徐 伟 新

有些学理、工、农、医的青年朋友认为，搞自然科学的，学不学哲学关系不大；不懂哲学也一样发明创造。因此，他们埋头于自己的专业，而不注重哲学素养的提高。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它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自然科学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支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有必要加以探讨的。

当我们接触到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问题时，首先就会发现，哲学和自然科学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差不多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两千多年群星灿烂的自然科学成就，几乎就是哲学的累累果实。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若离若合，沿着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曲线前进。我们看到，在整个古代很长的历史时期

中，哲学作为一种朴素的学说，同人类文明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融为一体。自然科学还在哲学的襁褓之中，仅仅是哲学家的一种“副业”。那时的哲学家同时就是自然科学家。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界模糊、肤浅、笼统的描述，与哲学原始、素朴、直观的性质有着天然联系。经过近千年中世纪黑暗王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和发展，在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才使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哲学和自然科学也历史地走上了由合到分的阶段。然而就是在那时，哲学发展史也有着一条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线索，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孤立、静止、片面地考察事物的形而上学形态相吻合。作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由合而

分趋势的对立，产生了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科学之科学”。他们抱着解答一切疑难、穷尽一切知识的奢望，君临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用自己的哲学原则和逻辑方法去编织自认为天衣无缝的绝对真理的体系。显然，这种企图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来避免哲学和自然科学分离的做法是甚为拙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自然科学在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时所出现的自然科学抛弃哲学的“实证论”，同时也反对企图把哲学当作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从而正确地揭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实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在经历了原始综合、近代分离之后，在新的科学基础上再次结成联盟。从此，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一种携手并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走着历史必由之路。

深入历史现象的背后，审视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自然科学之所以离不开哲学，乃在于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是靠哲学的智慧之光照亮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是人类对整个客观世界认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向何处发展，研究从哪儿突破，都亟需辩证思维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在物质微观结构不可穷尽问题上的预见性，就是一个范例。一百年前，当科学家们还把原子不可分奉为金科玉律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人恩格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家——第一次指出，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他说，原子理论已经被引向这样一个极端，以至于它不久必定要破产，“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①“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②恩格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预见了对原子的可分性，为深入探索物质结构指明了方向。二十世纪初，当自然科学攻破原子跨进微观世界大门，发现原子是由更小的电子和原子核组成时，有不少自然科学家又认为电子不可再分了。这时，又是一位哲学家——列宁，首先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并就物质结构问题作出新的预言：“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③场和实物可以相

互转化。此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言。原子的坚壳被敲开以后，科学家们乘胜向揭示原子核结构的奥秘进军。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发现了一大批基本粒子，至此，又有许多人认为关于物质结构的认识已走到了尽头。而毛泽东则在一九五六年明确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认为基本粒子中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对立面的统一无往不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层子模型，这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从近、现代研究物质结构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每一次自然科学陷入困顿从而把物质无限可分系列中的某一关节点当成分割的极限的时候，都是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指出物质结构的不可穷尽性，指引自然科学渡过迷津，走向物质结构的更深层次。

哲学的恒久魅力还在于，它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与科学方法息息相关的，科学的突破离不开研究方法的突破。正确的方法能使人事半功倍，马到成功，而错误的方法则使人误入歧途，劳而无益。德国化学家肖莱马是自然科学史上第一个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家。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参照《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从纷繁众多的有机化合物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和性能，找出它们之间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确定了其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脂肪烃（ $C_nH_{2n+2}$ ）为衍生出一切有机化合物的“细胞”，并且分析了脂肪烃的一系列矛盾及其发展，找到了有机化合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了有机化学的规律性，从而揭开了有机化学的秘密，成为现代科学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与此相反，自然科学史上由于缺乏正确的思维方法，对重要发现做出错误的结论的，也不乏其人。十八世纪英国的普利斯特列，在将氧化汞加热后得到一种能使蜡烛燃烧更旺的新气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氧气。可是，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燃素论的坚持者。从燃素论的观点出发，他错误地解释了自己的发现，说新气体不含燃素，碰到蜡烛便贪婪地从中吸取燃素，所以火燃烧得特别旺。这样，他虽然析出了氧气，却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

得到真理。”④

当人们透过由成功和荣誉编织的花环，探寻科学家成功的奥秘时，还会看到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另一重要作用即它可以加速科学发现的过程。

如果人们“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⑤即对事物辩证本性的认识。缺乏对辩证思维规律的了解，必然会走弯路，碰钉子，延长认识事物规律性的过程。在发现行星三大定律以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用了三十年的功夫，长期观察行星的运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但他长于观察，短于思维，因而未能从浩繁的观察资料中发现天体运行的规律。他的助手刻卜勒则擅长理论思维。刻卜勒在第谷已取得的天文观察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和理论分析，找出了行星运动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由此可见，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培养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哲学方法的素养，乃是早出成果、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的科学发现的途径。英国生物学家海登就曾不无体会地说：“如果我们以前比较熟悉恩格斯的思想方法，那么在过去三十年中物理学中观念的……变革可能会顺利一点。如果人们一般都知道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我个人首先就会避免许多糊涂思想。”⑥

当然，自然科学的发展，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科学实验手段是否先进，管理是否科学，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

否对头，等等。但是，这些条件决不可能也代替不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那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我们学理、工、农、医的青年学生来说，学不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极大，而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⑦青年朋友们，我们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应该抛弃、清除和抵制各式各样“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而代之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在将来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为人类的文明，为自然科学的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P3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P568

③ <列宁选集>第2卷，P268

④ 同②，P555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16

⑥ 海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P192—193

⑦ 同②，P533



# 从社会生产系统探索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

李树申 杨萃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以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都愈加突出了发展精神生产的重要。研究精神生产的发展规律已是紧迫而重大的新课题。本文试图从社会生产系统这个角度，探索精神生产发展的根据、条件以及国际间的影响等方面，揭示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源泉，为精神生产领域的改革提供一管之见。

## 一、精神生产发展的内部根据

精神生产就是通过脑力劳动，开发智力资源，创造出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规范、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以及科学技术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科学试验、理论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等脑力劳动，都属于精神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生产形态，有其自身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精神生产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①</sup>精神生产的发展，同物质生产一样，也存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精神生产发展的内在根据。

精神生产力就是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它包括三个要素：（1）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生产力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状况，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2）精神劳动资料，如学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实验室、科学仪器、资料信息等等。它是从事精神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也是标志一个国家精神生产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3）精神劳动对象，即脑力劳动者的研究对象，它的范围随着精神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和深入，包括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思维等所有领域。它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精神生产关系也包括同物质生产关系相应的三个方面，即精神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其中精神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精神生产关系的基础，标志精神生产的性质。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的统一，便构成精神生产方式。任何精神产品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精神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精神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同物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并受其制约。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精神生产力又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引起物

质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精神生产关系也相应的发生变革。精神生产关系制约着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当着精神生产关系同精神生产力相适合时，就促进精神生产的发展。当着精神生产关系同精神生产力不相适合时，就阻碍精神生产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发展的片面性和腐朽性，就是由精神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决定的。由于资产阶级占有精神生产资料，因而决定和支配着精神生产。他们把精神生产作为剥削和奴役人民的手段。资产阶级一方面为了提高物质生产追逐高额利润的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需要生产腐朽的精神产品用以麻痹和腐蚀人民。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败坏。所以马克思说过，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把科学技术用在生产，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把科学技术用于奴役人民。毛泽东同志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sup>②</sup>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这种片面性、腐朽性和畸形发展，不仅是精神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也不可能产生出高度的精神文明。这种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精神生产的发展。变革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关系，是精神生产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关系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相适合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为精神生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是在人类精神生产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精神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支配。精神生产的目的是创造精神财富，用于社会进步和不断满足全社会成员精神生活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列宁说：“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sup>③</sup>所以，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那种片面性和消极的方面。它不仅大力大力发展科学文化，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核心，大力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风尚。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是提高人们精神生活，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手段，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决定性条件。我国科学思想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关系的巨大优越性。但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关系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精神生产的水平还不高。发展社会主义精神生产，需要从发展精神生产力与完善精神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发展精神生产力方面：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发智力资源，努力扩大和提高精神劳动者的队伍。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sup>④</sup>现在我国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数（包括这方面的工人在内）大约一千多万人，只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二，相差甚远！而且现有人员迫切需要再学习，再提高，实现知识更新。其次，在精神劳动资料方面，应十分重视采用



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第三，在精神劳动对象方面，要面向物质生产。根据物质生产的需要培养人才、确定科研任务、课题。精神生产只有面向物质生产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才有生命力。这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如英国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很重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很多，自然科学曾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脱离物质生产，没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实力并不强，也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在精神生产关系方面，也迫切需要下功夫进行改革：（1）要进一步完善精神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资料，数量很少，只为少数单位所垄断，外人使用很困难，得不到充分利用。我国本来人才不足，但一些老大学和科研单位积压浪费人才问题严重。这说明我国有些精神生产资料，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基本上是各干各的，很少协作往来，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这是与精神生产发展的社会化状况和要求不相适应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科技队伍的组织管理问题，要认真考虑，现在的管理形式不行，要想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就要统一管起来，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这些指示是十分正确的。（2）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需要彻底解决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同是国家主人，劳动者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批判、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同时也做了大量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工作。这是精神生产力又一次大解放。我们要努力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要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实际存在着的从事精神生产的复杂劳动低于从事物质生产的简单劳动的实际收入的“倒挂”现象。在精神生产内部，也要解决“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问题。总之，精神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合，才能促进精神生产的迅速发展。

## 二、精神生产发展的外部条件

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系统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三种生产都不能各自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这三种生产交互作用，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由此可见，研究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不能只研究精神生产的内部原因，还要从社会生产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中，考察精神生产发展的外部条件。

首先，精神生产是在与物质生产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产生看，两种生产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精神生

产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适应物质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的条件，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无法进行。物质生产必须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们不断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越深刻、越正确，物质生产就越有成效。反之，没有人对自然关系的认识，就不能进行生产。马克思说过，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态的建筑设计图。<sup>⑤</sup>就是说，人在进行物质生产时，首先要产生一个思想蓝图，然后按照这个思想蓝图动手去操作。这个思想蓝图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人们依据对自然关系的认识，经过头脑加工产生的。这个“对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加工蓝图”的过程，就是精神劳动，产生的精神产品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可见一件物质产品，从总体上说，是经过三道工序和凝结两种劳动，即：（1）对自然关系的认识；（2）设计蓝图；（3）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操作。简单的小生产，两种劳动集中于劳动者于一身，社会化的大生产，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下，两种劳动一般地是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分别承担。另一方面，物质生产还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没有这种社会关系，就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联系，就不能进行生产。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政治、法律、道德等思想体系之类的精神产品。这类精神产品起着调节和维系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以保证物质生产的正常进行。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由精神生产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它既反映自然关系，也反映社会关系。从两个方面，间接地影响着物质生产。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自然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精神产品，就构成了指导人们生产斗争或社会生活的精神财富（宗教是精神产品，但不是精神财富）。没有精神生产创造的精神财富作指导，物质生产就不能进行。

从发展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三个方面：

（1）在生产力的方面两种生产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一方面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力的转化。精神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使精神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才能不断提供先进的实验技术、实验仪器、图书资料、场所和设施等精神劳动资料；也只有物质生产的扩大和发展，才能充分的暴露自然关系、社会关系，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提出新的课题，从而不断扩大精神劳动对象，丰富精神生产的内容。另一方面，精神生产的发展也实现着向物质生产力的转化。精神生产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改进生产工具、扩大劳动对象、提高管理水平，从而“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sup>⑥</sup>

（2）在生产关系方面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

生产和分配”，⑦“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⑧可见，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着精神生产关系的性质。精神生产也制约着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精神产品，是为维系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服务的，为物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3）在生产状况上两种生产相互影响。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状况，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小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是个体的（思想家、匠人、艺人、家庭教师）。与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是社会化的（研究所、实验中心、学校等）。马克思说：“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⑨反过来，精神生产的发展也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劳动结构的不断变化：渔猎——农业——工业；手工劳动——机械化——自动化；体力劳动为主——脑力体力劳动分离——脑力劳动为主。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取代劳动、资本、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脑力劳动者人数已超过了体力劳动者。这个变化趋势，反映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正确的反映了两种生产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规律。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必将促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恩格斯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种矛盾运动是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结合起来，两种文明建设一起抓。

其次，精神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社会生产系统三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中，物质生产是基础，它决定和制约着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规律。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自身生产发展的条件。精神生产不仅为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提供科学技术和思想武器，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生产又制约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它既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提出目的和需求；又为这两项生产提供生产者。没有相应数量和质量的人口，物质生产就不能进行和发展。人类自身生产不仅要与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也要与精神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人口增长过快，必然影响文化教育的发展。总之，精神生产是在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交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三种生产的交互作用，相互适应、协调发展，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精神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

### 三、精神生产发展的国际条件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生产的发展，不仅要受本国的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制约，而且要受世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是因为，不仅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是个系

统,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使世界生产成为一个整体,构成一个总的世界生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社会生产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世界的生产”,是全球的“全面生产”。<sup>⑩</sup>

在世界各国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中,尤以精神生产最为突出。这是由精神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表现在:第一,与物质产品不同,精神产品如马克思所说,是各民族的公共的财产。它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特别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精神财富本身是无形的东西。人才是精神财富的主要载体和精神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而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谁获得了人才,谁就获得了精神财富和精神生产力。所以世界各国争夺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国家实行重金礼聘“人才进口”的政策。美国从1952年到1975年间就引进各种人才达二十多万人。从1901年到1979年间美国得诺贝尔奖金的有一百一十八名,占整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35.1%,其中有四十三名不是美国人。第二,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向国际范围扩张,国际分工的发展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如此。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向纵深和综合的方向发展,科学实验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往往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第三,精神财富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现在据统计世界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怎样强大怎样先进,它对世界科学的贡献都未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己发明创造。必须利用有关的外国的先进资料、经验和手段。马克思说,精神生产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所以,一些国家不仅实行“人才进口”,而且实行“知识进口”的政策。第四,一个国家的精神生产,不仅要吸收世界上精神生产的先进成果,而且也要面向世界的物质生产。要吸取世界物质生产提供的经验、技术手段和提出的研究课题。这样才能迎头赶上。比如我国的精神生产就要适应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形势,这是一个很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机会。由于世界生产特别是精神生产,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所以一个国家精神生产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条件,而且取决于国际条件。善于学习和吸取世界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就可以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这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中心频繁转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日本就是后来居上的典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就拿日本的钢铁生产技术来说,能跃居世界前列,是由奥地利引进氧气顶吹炼钢技术,由西德引进炼钢脱氧技术,由美国引进带钢轧制技术,由瑞士引进连续铸钢技术,从美国和苏联引进高炉高温高压技术,从法国引进高炉吹重油技术。把上述先进技术加以综合改良,创造出所谓“转炉未燃气回收技术”。转过来又向德、

法、美、英等国输出。1960—1975年间，日本一共向全世界买了两万五千七百项专利。据日本估计，如果不引进，关起门来自己摸索，会多花十倍的钱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经济起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世界各国生产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开放、引进，吸取外国先进经验和成果，不仅是发展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更是发展精神生产的重要条件。这也可以说是生产发展的规律。

列宁在苏联建国的最初年代里，就十分重视吸取外国科学文化和技术，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强调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提得对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推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同志这一正确方针没有得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发展精神生产的客观要求。有人只看到对外开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带来消极的影响，怕影响精神文明建设，而没看到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由于开放，人们才大开眼界，破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观念，才能不断在新的视野和观念下去吸取新的知识和技术。只要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的原则，抵制消极的东西，吸取世界各国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就会促进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加速两种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不仅是教育的指导方针，也为整个精神生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三个面向”正确的反映了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现代化同世界范围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揭示了精神生产发展的规律。

---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②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4页，第5卷第46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第25卷第97页。

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42页，第270页、第42页。

#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逻辑”

李 秀 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十五年的曲折前进的战斗历程。当前，全国人民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历史压在我们哲学工作者肩上的一副重担是，对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工程进行哲学的思考，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

## （一）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教条主义学风，尖锐地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sup>①</sup>这是中肯的批评，也是庄严的号召。他热切地希望哲学工作者一定要以身作则地引导人们去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里，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就应当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去研究、去探索“中国建设的逻辑”。

据我体会，“中国革命的逻辑”或“中国建设的逻辑”中的“逻辑”一词，至少有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在客观逻辑即客观必然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例如他说：“帝国主义者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sup>②</sup>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逻辑”，指的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体现的，人们必须遵从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或定律。这是用在这里的“逻辑”一词的最基本的涵义。

第二，客观规律的有机体系。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科学，都以客观世界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客观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通常人们很少有把物理

运动规律、生物进化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称为物理逻辑、生物逻辑、经济逻辑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提出哲学应当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以同经济学应当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政治学应当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军事学应当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sup>③</sup>等等相并提，是因为在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不同于具体科学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革命或建设规律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特定的领域，而是应着重从整体的联系中对不同规律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进行综合的把握，并从中概括出一般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客观规律不是彼此孤立、互不干扰、“各行其是”的“平行线”，而是纵横相联、错综交织的“立体结构”，是相互耦合的有机系统。就是说，哲学所研究的不只是对象、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或内在逻辑，而且是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内在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就要致力于整体地把握体现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规律体系。

第三，反映客观逻辑的思维逻辑。革命的和建设的“逻辑”，既包括客观的方面，又包括主观的方面。哲学的任务在于，既要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也要研究如何在逻辑上概括、思维中再现这一客观规律和规律体系的认识规律。思维逻辑或主观逻辑是客观逻辑的凝结，认识规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和规律体系的认识规律，必定会反过来成为指导我们研究工作和实践活动的科学方法。

总之，对于“中国建设的逻辑”的研究，要求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规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从而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进行哲学的思考，其基本要旨也正在于此。

## (二)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④</sup>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创造性的科学结论，凝聚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包含着广博深邃的理论容量。而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中的核心内容。

列宁曾经写道：“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sup>⑤</sup>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大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sup>⑥</sup>据此，完全有理由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鲜明、突出地体现了共性个性的辩证法，不懂得共性个性的道理，就根本无法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共性个性的辩证法的角度进行哲学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研究：

第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中，社会主义是一般，中国特色是个别。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有机的、血肉般的。它们只能从概念中分别地来把握，在客观现实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它必须同社会主义的本性相一致，必须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遵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符合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中国特色这个个别，如列宁所说，“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sup>⑦</sup>如果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却违背了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即脱离了社会主义这个一般，它就必定会同另外的一般（例如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相联系，那是必须努力防止和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有各国特色的个别中而存在。真理都是具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是脱离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而孤立存在的抽象模式，它只有通过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才能体现出来。列宁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sup>⑧</sup>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一条中国式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一般就无从体现，硬要把它当作固定的模式来套用，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它的各个局部上，在经济、政治、思想等一切基本方面，都体现了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经济上，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这个多种经济形式的有机结构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共性。同时，在多种经济形式的比例关系、结合方式和变化情况，以及具体的管理体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又表现出中国的特色。政治上，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它在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和基本职能等方面，都体现了一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国家政权的构成成分、具体制度和实际设施等方面，又有中国的特色。思想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是一切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具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同时，在精神文明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因素上，在精神文明中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具体构成上，以及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摆法和具体道路上，又带着中国的特色。总之，有中国特色的个性，由于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获



得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社会主义的共性，由于它带有中国的特色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性和个性就是这样相互渗透、相得益彰、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多层次的结构。任何比较复杂的事物和实践活动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层次结构，从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区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或三个环节。

毛泽东同志曾经运用这种“三分法”分析过中国革命战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sup>⑥</sup>这里，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就是一般、特殊、个别三个层次或三个环节。采取这种方法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就不但要研究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更要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特殊的规律。这里，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一般、特殊、个别三个层次或三个环节。推而广之，从全局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其一般的规律；从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不同战线来看，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再从每一战线（例如经济建设）的不同部门（例如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来看，又有其更加特殊的规律。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实行较内地其他地区还要开放些、还要灵活些的政策和措施；在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则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更加灵活的措施。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

一般、特殊、个别的“三分法”和共性、个性的“二分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三分法”中作为中间环节的特殊，同一般相对应它是个别，同个别相对应它又是一般。“三分法”可以还原、简化为“二分法”；反过来，“二分法”可以展开，引伸为“三分法”。不过，把“二分法”扩张为“三分法”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加精确地把握共性和个性区分的相对性，如实地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结合看作为开放的系统。按照“三分法”，从特定的角度把需要考察的对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取出来进行分析，例如，仅仅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式的特殊道路二者的关系来看，共性就是共性，个性就是个性，它们的区分是确定的，它们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但是，把考察的对象放回到普遍联系中来把握时，共性和个性的区分就成为不确定的、相互过渡的了。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助于使我们的认识从个别、特殊、一般……一步步提高起来，又从一般、特殊、个别……一层层深入下去，从而把宏观的考察和微观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一个整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基础、出发点；“走自

己的道路”是途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目标、归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由起点、中介、归宿三个环节构成的完整的发展链条，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则是贯穿始终的指导线索。

这三个环节是相互区别的。出发点不等于目标，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出发点当作目标，那就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躺在“实际”上不“出发”了。途径也不等于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经济手段、允许其存在的经济形式并不能全部归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如果把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有其存在理由和积极作用的一切，包括可以利用的外资等，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范畴，那就会混淆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界限。

出发点、道路和目标又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实际国情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和达到预定目标的基础，不从这个基础出发，道路就无从开辟，目标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不仅如此。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从零开始，我国人民早已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奋斗了几十年。我们当前由以出发的现实，既是过去一段路程的终点，又是继续前进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中凝结了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并以萌芽的、不成熟的形态包含着我们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当然，我们取得的成果还很不够，我们的起点还很低，我们由以出发的阵地还不够牢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盲目自满，故步自封。但是，如果把起点同道路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现实的主流和趋向，看不到道路已经打开，看不到现实中的理想的曙光，一味地哀叹道路茫茫、前途无望，那是完全错误和极端有害的。

由此可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由已有的阵地出发，开拓前进，使理想一步步地变为现实的实践过程，对于坚定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的毅力，是大有裨益的。

### (三)

唯物辩证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既然我们所研究和把握的客观对象本身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那么只有把这一客观辩证法化为主观辩证法，当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论，遵循“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秩序，才有可能做到主观同客观相一致，正确地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个领域的具体业务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认识论上，就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个别与一般是相互联结的，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只有深入地认识个别，才能更好地把握一般；而在认识了一般之后，还必须继续深入地去认识个别。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这种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认为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精髓，

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一个重要准则。”<sup>⑩</sup>

我们牢记这个准则，就要十分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维护和提高劳动群众（包括脑力劳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为此，必须批评和纠正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轨道的言论和行动。同时，也应当十分明确，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通过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推向前进。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只在空洞抽象的思辨王国中遨游，就不仅会使一般理论失去用武之地，而且这本身就是违背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也做不到真正的坚持。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同生产力状况（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合的规律性认识，是纵贯古今、横跨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须严格地加以遵守。正面经验、反面教训也反复证明了坚持它的必要性和违背它的危害性。但是，在运用这一科学规律来观察与思考问题时，又应当看到种种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就现实的生产关系来说，在构成要素上，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方面；在再生产过程中，要经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在经济成分上，又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多样的形式。再就现实的生产力来说，在构成要素上，包括“人”和“物”的不同比例、不同方式的结合；在发展程度上，有从手工工具到自控系统的不同社会化程度和物质技术水平的同时并存；在生产布局上，存在着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情况。总之，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都是一个多层次的、多极的有机结构。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要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同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继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开拓前进。这样做才是真正地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基本原理，才能使它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把这一原理概念化、公式化，只把它当作套语去进行抽象的演绎，那是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共性个性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准则还要求我们，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经过实践考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当坚信不疑，全国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要贯彻执行，在大政方针上不能各行其是。同时，我们又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结合各自特殊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而不能只当照抄照转的“收发员”和“传令兵”。

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辩证认识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是在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它对于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几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其中有些基本的经验，如通过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关系，实现责、权、利的紧密结合，让一部分生产经营好、劳动成果多的人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等等，就表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共性，在城市经济改革中一定要认真学习、消化和汲取。但是，同农村相比，城市又有很大的特殊性和差别性。城市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城市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农村只承担一小部分；城市主要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农村大量的的是以户为主的手工劳动；城市经济改革所涉及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领域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农村在这些领域和方面的问题，则相对地比较简单和单一。因此，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就应当也必须不同于农村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例如，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促进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再如，在处理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时，既要解决当前最迫急的问题，更要考虑如何应对世界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的挑战，等等。

---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P756

② 同①书，P1375、1376

③ 参见同①书P756

④ 《邓小平文选》P371—372

⑤、⑦ 《列宁选集》第2卷，P713

⑥ 同①书P295

⑧ 《列宁全集》第23卷，P64—65

⑨ 同①书P155

⑩ 1983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的两个问题

李江涛

### (一)

要考虑事物的量变过程，首先需要对事物的量进行分析，而量同时具有内涵量和外延量两种内容。黑格尔认为，外延量是指“广量”，内涵量指“深量”或“程度”。（参见《小逻辑》第22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这样运用这两个概念。他把“工作日的延长”称为“外延量”，把“劳动强度”称为“内含量”。（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49页）内涵量直接决定事物的性质，是与质直接相关的量。而这种量一般又很难用精确的数字来表示。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国家的法制水平，上层建筑的完善程度，以及精神文明的水平，等等。这些就都属于内涵量。由于它不能用数字表示，因而，它的变化是不明显的，而且也比较缓慢。所谓“循序渐进”，就是指这种量变。外延量一般不与事物的质直接相关，通常说明事物的范围、大小，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表示。它包括社会拥有的产品量，国民经济总产值，社会平均文化程度，国际贸易和对外交往的数量等等。外延量的变化，有些是在短时期内不太显著的，但大部分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建设速度问题就是这样。1978年至1982年，我国城镇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共投资于住宅建设515.1亿元，建成面积达3.65亿平方米，约占建国33年来建房总量的40%（不含私人建房数字）。当然，内涵量的变化与外延量的变化不是互不相关的，二者互为条件。内涵量的变化有赖于外延量的变化。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都需要社会总产品和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而外延量的变化，又必须以内涵量的变化为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内涵量的变化，是在指导思想、经济体制、经营方式以及分配办法等方面的改革和进步，由此才能引起生产和经济的全面高涨。

这两种量变在不同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量与外延量的变化总是不一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程度愈高，它对于外延量的增长（如产品量、产值量）束缚得就愈严重；另一方面，它的外延量愈是增长，就愈是要冲破内涵量的限制。当然，其外延量受内涵量的影响，也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有限扩展，或者呈滞退状态。但无论如何，两种量变的方向、程度、速度都是不协调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协调，才使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加剧，从而为它的灭亡准备了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内涵

量与外延量的变化则不同，两者可以同步发展，协调增长。社会的劳动产品和经济产值等外延量的上升，可以促使公有化程度等内涵量的提高；而公有制的完善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又会极大地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使国民经济产生大幅度的跃进。

此外，在社会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增长或消亡，一种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一种是落后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因素的变化同样具有不同的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因而，它同时兼有旧的遗迹的消亡和新的萌芽的增长。在量变中，代表新生事物的共产主义因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断战胜陈腐的东西，把社会推向前进。但是，旧事物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要在自身灭亡的过程中与新事物相抗衡：一方面，拼命抵抗新事物的进攻，以求避免自己的灭亡；另一方面，则瓦解新事物，抑止新的因素的迅速增长。这就使新与旧即进步与落后的矛盾贯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始终。

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在量的方面的消长，虽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是“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298页）但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代表落后因素的量暂时占上风的情况可能会发生。这或是由于进步因素相对弱小，还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对手，或是由于进步因素在发展中自身的失误，被对方钻了空子。十年动乱期间，我国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存在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坏人专权、好人受气的反常现象，就是这个问题的注解。

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有些是在旧社会形成的，如生产力的积累，物质文明的进步；有些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才开始自己的发展行程的，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等。与此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都形成于封建社会的胎胞。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与自己脱胎而来的社会制度属于同类范畴，都是性质相同的私有制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与以往任何私有制度都有本质的区别。这样，量变的两种不同因素，就表现为极复杂的情形：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步因素和落后因素同时增长。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进步，往往同时意味着一种退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第3卷，第179—180页）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以消灭大量的生产力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以另一部分人的饥寒交迫为代价。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排除了这种现象。第二，社会主义社会量的变化已从盲目状态中解放出来，可以在统一计划下，自觉地运用规律，控制两种不同因素的变化，加速旧事物的灭亡，为新事物的产生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因素的变化是缺乏控制的，正因为如此，它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第三，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在进步因素增长时产生一些“副作用”现象，比如在发展生产时破坏生态平衡，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或工作上的失误，不具有必然的性质。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落后因素的量变与进步因素的量变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第四，社

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把握两种不同因素的量变比例，而且对进步因素的量变也可以控制在最佳适度。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注意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注意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生产关系上，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经常变化和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另一方面注意不超越阶段，不盲目提高公有化程度。对于道德要求，也从社会经济结构的现状出发，提出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比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共产主义道德，则属于整个道德体系中的最高层次。

## （二）

事物的结构性和层次性，也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过程中呈现出来。

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等多方面的质，这是事物的横断结构。在质变的过程中，它们并不一定是齐头并进、共同变化的，而是呈锯齿状态。也可能公有化的程度变化快些，也可能道德水平、思想意识变化快些。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也与此相类似，但与社会主义相比较，还是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任其自然、缺乏主动性的，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改革既存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则可以通过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部分，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其次，资产阶级害怕质变的不平衡，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迟滞质变的步伐。生产力的发展既使他们精神振奋，又使他们惊慌失措，最后不得不大量地破坏生产力，以求达到与生产关系变化的平衡；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各个质的变化，是以使自身完善的形式走向灭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部分质则是以自身灭亡的形式使社会走向完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初期的专政到法西斯专政，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质的完善过程，也是该社会的灭亡过程。社会主义从多种成份的所有制结构向单一结构的所有制过渡，消亡的是旧质，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高低不同的质层。在既存的生产力水平中，有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机器生产，有与小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手工操作，还有从后者向前者过渡的中间状态。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有全民所有制，有集体所有制，还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个体所有制。其他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以及哲学思潮等等，无不表现为高低不等、性质有别的质的差异。这是事物的纵向结构。事物的发展，总是从低层次的质跃迁到高层次的质，使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阶段性展现出来。这里涉及到质的相对性问题。对于整个事物来说，其质的差别是与另一个完整的事物相对待而言的。比如，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相比较，性质上就有根本的区别，这是从社会的最根本的质来考察的。因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不仅存在着质变，而且存在着本质的变化。而社会主义社会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则属于本质相同的不同事物。虽然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质的横断结构和纵向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在所有制和生产力方

面，就有质的飞跃。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质变。私有制社会不同形态之间也有相类似的问题。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页）这段话起码说明了两点：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它把商品原则贯穿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且作了某些改良；第二，它与封建社会同属于私有制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虽然在某些部分和层次上存在着质的差异，但作为剥削制度和私有制社会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质变，（见《学术研究》1982年第六期《社会主义时期的质量互变问题》一文）只存在部分质变，根据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公有制社会，二者只存在公有化程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仅仅是由于生产力低造成的。这实际上是把不同问题混淆了。恩格斯说过：“存在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体。两种不同的物体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质是在程度上不同的，还有一些质可能是这两种物体之一所完全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8页）质变指的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转变，即一事物变为它事物。变化后的事物保存了原来事物的较多的质，只能说明二者的性质接近，而不能认为是没有产生质变。有没有质的变化是一回事，有没有质的延续则是另一回事。判断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否存在质变的标准是什么？即“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否认了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就等于否认了新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否认了世界的前进运动，也就否认了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着转化过程和飞跃过程。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到底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同一事物？毛泽东同志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页）那么，在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矛盾时，是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当然，经典作家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限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同的。比如，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等等，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些。然而，现在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就不能从本本出发，或者从某一特定的概念出发，而应该根据实践提出来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理论上的说明。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实行公有制等方面，是有共同的质的，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因素才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长起来。但如果以此来否认二者质的差异，那么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回事了，因为它们在阶级压迫、实行私有制等方面恰恰是具有一样的质。实际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所有制、阶级结构等方面，有着质的区别。能说有阶级差别



的社会与无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同一事物吗？能说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质是一样的吗？更不用说在旧式分工、三大差别、生产力水平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别了。不在二者之间作这样的质的区分，就会混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在政策的执行上也容易产生“左”的倾向。过去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不无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注意的。



##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惠州举行

全国苏轼研究学会第三次年会，由省社联、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惠州地委宣传部联合筹办，于九月八日至十四日在惠州举行。杨应彬同志代表省委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词祝贺。与会者共一百余人，会长杨明照、顾问王起均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苏轼晚年寓居岭南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儒家思想为主，还是佛道思想为主？一种观点认为，苏轼早年以儒家思想为主，晚年则以佛道思想为主，尤其寓惠诗所表现出来的总倾向，较黄州时期更接近了佛道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轼晚年仍以儒家思想为主。他以主要精力研究儒家经典，所著《论语说》、《书传》和《志林》都是偏重儒家观点的。较多的人不同意对苏轼晚年思想作或儒或佛道的“一刀切”，认为苏轼思想是驳杂多变，是儒、佛、道思想的不断交替；任职时期以儒家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为主。不同时期，这三种思想对他发生不同的影响。还有人提出“苏轼思想”之说，认为它是儒、佛、道思想的有机“化合”，对它们既有继承也有批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二）是积极乐观，还是消极低沉？有人认为，苏轼到岭南以后，更热衷于谈禅论道，极力以此解脱自己，对险恶的环境作消极的反抗。不能笼统地把这种“随缘自适”、“置荣辱于度外”的表现说成就是乐观，更不应把它的积极意义夸大。也有人指出，不能以韩愈等人跟苏轼相比而得出苏晚年积极向上的结论，应将苏轼自己前后相比，这样就必须承认他晚年是相对消沉的。有人则认为，苏晚年的相对消沉是事实，但并非主要方面。他热情讴歌祖国河山、随处关心民生疾苦，这些对一个消极厌世为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还有人提出“野性说”，认为苏轼屡遭贬谪，产生了与仕途相反的理想，即“野性”的理想。其特点是放逸、旷达、天真。这种理想较之渊明的“桃源”更为现实可求。

（三）是平淡，还是豪放？有人以平淡与豪放分期，认为苏前期诗风豪放粗犷，后期则平淡古朴。在艺术观上，苏轼是以“枯澹”为审美兴趣的中心，这突出表现在其《和陶诗》中。但是，苏轼才高气豪，不宜枯澹，故他的和陶诸诗，不仅现实性减退，艺术上也基本是失败的。有人则认为苏轼岭南诗的风格是多样化的，认为苏诗的平淡是含激情于冲淡之中，是一种绚烂之极的平淡。由豪俊、旷放而进入平淡之境，是苏轼岭南诗的一大特点。

另外，这次会议对苏轼的文学理论、晚期作品的艺术风格，以及研究苏轼的方法等也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惠文联）

# 海瑞哲学思想述评

李 锦 全

海瑞（公元1514—1587，明武宗正德九年—神宗万历十五年）号刚峰，是我国明朝有名的清官。他是海南岛琼山人，世居西郭外下田村。由于他出仕做官后替人民办过一些好事，所以有关他平反冤狱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在我们广东省他也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

不过，海瑞在历史上一一般都把他作为政治实干家，在思想史上从来没有占过什么地位，更没有人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固然，在海瑞的一生中，并没有写过哲学专著，甚至连讨论学术思想的论文，也很少见。但我觉得，海瑞作为一个政治实干家，总会形成他的世界观，在一生行事中有他的指导思想。虽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搜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思想脉络和特点，其中也有牵涉到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相互转化问题；还有人们主观上认识与客观上反映的思想矛盾。我认为对海瑞这些思想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 一 ）

海瑞的哲学思想，很明显是受到儒家孟子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他认为“君子之于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为之？心为之，心自知之。若得失，心自致之。虽天下之理无微不彰。”又说：“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古今共之，圣愚同之，得此而先，尧、舜、禹有‘危微精一，允执厥中’之传；得此而后，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论。未有舍去本心，别求之外，而曰圣人之道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持有赤子之心，故虽出之千百载之前，其事千百载之下，可以一言而定。”（《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3页）（以后凡引《海瑞集》的引文只注页数）他认为人们的立身行事，以至是非得失，都由本心在起作

用。这是古今圣愚相同的地方。因此对所谓尧、舜十六字心传和孟子讲的“赤子之心”大加赞赏，认为虽天下之理均具于此心，而其事则虽在千百载之前或之下，有此赤子之心则一言可定。这种观点，正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和陆、王心学“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的继承和发挥，是道地的主观唯心论。

海瑞既认为人心已具有万事万理，因此为学当然也不用外求。他写过几篇四书讲义，对孟子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特别作了讲解。他认为“天之生此人也，赋之仁德具于心。”这是说，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天赋的仁德，但“既生之后蔽于物欲”，“心放而仁非己有矣”。由于后天物欲的蒙蔽，使先天的仁心因而丧失。于是此“既放之心，操存舍亡”，“君子尽其在我而已”。即是说，这个已经放失的人心，能否保存住或让它丧失，就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了。据此，他就发挥孟子说的，学问之道无他，只是要求恢复这个放失之心罢了。“学也者，学吾之心也。先圣人得心所同然于古，是以有古之学。学非外也。问也者，问吾之心也。贤人君子得心所同然于今，是以有今之问，问非外也。学问之功，为求放心而设。”这就是海瑞宣扬的“学问人心，合一之道。”（引文均见第502页）为学内求于心还是外求于物，从认识论上一般来说，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分水岭。主观唯心论者，如孟子就讲学问之道，求其放心。陆九渊也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语录》）王阳明则说“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传习录下》）并认为“心自然会知”，而“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当然不必“外心以求理”。（《答顾东桥书》）海瑞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点，所以他以陆九渊与朱熹相比较时，很明显是抑朱而扬陆。他并为此专门写了《朱陆》一文，这是《海瑞集》中几乎是

唯一的讨论哲学的专论。

海瑞在《朱陆》一文中，对朱熹曾提出多次批评。他说：“朱子笃信《大学》，平生欲读尽天下之书，议尽天下之事，……天下之书可得而尽读之乎？事可得而尽议之乎？韩退之《原道》言诚正不及格致，朱子指为无头学问，是以格物、致知为《大学》头一事矣。入门一差，……无得于心，所知反限。”（第323页）又说：朱子以“读书为先，求心反为后”，“圣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离”，“使人繁于枝叶，昧厥本原，其过为大”。（第324页）对于陆九渊，海瑞则加以肯定，认为陆学“得之孟子，则精一执中之旨，陆子得之矣。”（第323页）文中还称赞陆氏，“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为教。”（第324页）虽然他也提到，“然陆子不免应举子业”，“自传心之法视之，犹俗学也。”（第323页）但陆氏大本既立，其余只能算是小疵。至于朱熹批评陆学为禅，海瑞对此也力加辩解。他说：“儒学禅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国家之用。禅学废弃百应，徒为空虚寂灭之养。朱子指陆为禅，然则将不讲其心，就外为天下国家之用。呻吟其占毕，而曰某章句如此，某章句如彼，然后为能学欤？”（第324页）对王阳明与朱熹的比较，他基本上也是肯定王学，谓“大凡人言语文字，皆心为之，阳明致良知，其什经不取朱子之说者，多说在心性上。朱子什经全说在博学而识上。阳明鹤突其说诚有之，然犹不失为本原之养也。犹第一义也。朱子则落而下之，离而去之矣。”（第325页）海瑞这里之所以反复肯定陆、王，就是称赞他们将心作为本原，认为这是第一义。而对朱熹则谓其“平生误在认格物为入门，而不知《大学》之道，诚正仍其实地。”（第325页）所以与陆、王相比，只能落到等而下之的地位了。

至于朱熹是否只讲格物致知，并不懂得正心诚意的重要？或者说他就是个外求于物的唯物论者呢？其实不然。朱熹是个客观唯心论者，与陆、王认为“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不同，他认为天理原来是在人心之外，是理得诸天而具于心。所以穷理需要有个过程，即从格物致知入手，在认识路线上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是朱熹所谓穷理，最终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身之理，而是通过众物去认识“一理分殊”。这个最高的理就是天理，就象天上月亮一样普照万川，人们从江河湖海中看到的月光，无非是天上月亮的倒影；而世

界上的万事万物之理，也无非是天理的分殊。按照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和陆、王心学最终并无不同，只是中间多了格物致知这个环节，给人先来一个外求于物的假象；而陆九渊则认为心就是理，“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语录》）那就当然为学不用外求了。据此，陆氏自夸其学说是能“先立乎其大者”，是“易简功夫悠久大”；而斥朱熹的格物穷理为舍本逐末，是支离破碎的方法。这就是朱、陆在认识方法上的分歧所在。海瑞也知道，朱熹并非不要“求之心”，只是误把“格物致知”作为入门，因此走了弯路，也因此海瑞在朱、陆两种唯心论中间，还是选择了陆学的主观唯心论。

## （二）

从上述材料看，海瑞的哲学思想似乎是个道地的主观唯心论者。但颇令人奇怪的是，他在训诫子弟、教诲生徒以至作词自警时，讲的又是另一种腔调。他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无惑，故从其先得者而问焉。”（第3页）这就承认并无“生而知之”的人，知识要靠后天得来，所以要向“先得者”的师友求教。又说：“若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义友耶？”君子能做到“纤毫不苟，浩然之气塞乎苍冥。果何至是，得力于师友者良多也。”最后并归结说：“夫人外无师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协于道，亦难矣。”（第1页）在这里，海瑞十分强调师友之助，与上面说的学问“非外也”，只是“学吾之心”与“问吾之心”的观点正相矛盾。

关于读书问题，海瑞在《教约》中训诲生徒说：“学以知为先。读书所以致知也。”他还引述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六条：“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再加上“博学、审问数事”，认为“读书之法无越此矣。”（第15页）他这里肯定为学是要求知，而读书却可以致知，并承认读书之法不能超过朱熹的六条，这一点对朱熹是肯定的。但在《朱陆》一文中，海瑞却认为朱熹要人读书讲说，未见能“收功一原”；反而引起“好胜之私心”，违背了圣人之道，这是对读书的基本否定，与前面鼓励为学求知而读书，态度上也前后矛盾。

上一部分说过，海瑞是个主观唯心论者，但

他在《使毕战问井地》一文中却说：“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无是理也。人必衣食有所资，然后为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后淫侈之念不作。”（第312页）这里承认“为善之心”与“淫侈之念”不是先验天赋的东西，而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和行事所决定的。先秦《管子》书中说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篇》）是带有唯物史观的萌芽思想。海瑞也在肯定衣食足然后生善心，这就与他所谓有天赋仁德之心相矛盾。正因为这样，海瑞平时虽极端推崇孟子，但对管仲的评价却与孟子不同。孟子声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而海瑞却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与之。岂若‘匹夫匹妇之谅，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之为大也。夫子取其功，略其陋，是一道也。”（第328页）海瑞同意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价管仲，就是看到他对人民立下的功劳。海瑞肯定功利，承认物质生活对人们的思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与他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当然也是矛盾的。正因为海瑞有承认人们思想有受后天影响的一面，所以也不完全同意孟子的先验性善论。他是比较倾向于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他主张理、气是“无离合，无后先。性即在气质中，非二物也。”而“孟子论性，区区然执一性善之说”，“然理气不相离而离之，知为性善谋，不能使人信吾性善之说，是则孟子之过也。”（第316—317页）海瑞虽然也承认孟子有倡性善说之功，但又看到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所以对此也有所非议。

由于海瑞有时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摆在第一位，对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原理初步有朴素、朦胧的认识。所以他提出“养民于先，教民于后，有养而后教行焉”（第315页）的主张。即先要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然后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才能收到效果。海瑞是主张复井田、抑兼并的。他认为土地“人人得以自买自卖”时，就会产生“厚田宅、丰衣食、美妻妾”的意念。如果行井田制不容许兼并土地，那么“富者欲过，贫者欲企，虽有其心而盖无其由也。无其由而过企之心灭矣。”这是说，要是社会制度上能解决土地问题，即使富者想过分兼并，贫者也有要求，但虽有其心而客观条件不许可，那么这种“过企之心”就会消灭了。所以他把“治井田”摆在第一位，认为“学校不过辅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于始，学校不过成教于终。”他甚至还承认经济制度

的妙用：“井田未尝教民而域民于教，教道之妙有若此。”据此并进一步提出：“与其竭力为庠序为教约，百端鼓舞，民志不定，迄无成功，不若竭力为一井田以复唐虞三代之治。”（引文均见第316页）上述海瑞反复提出行井田问题，在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为抑制土地兼并，也有人发过这种议论。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就以海瑞这位实干家来说，他在应天巡抚任内，利用他掌握的部分权力，对豪绅地主所侵占的大量土地，也曾下令要他们“退田”，这虽然局部收效于一时，但海瑞很快就受到攻击而去位，至于什么复井田更是行不通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海瑞通过这个事例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承认社会存在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对人们的思想，可以起到不教而教的妙用。他认为学校教育，只能起到“辅翼”作用，如果经济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使竭力办学，制订出各种“教约”，也是“迄无成功”。这种观点，具有唯物论思想的萌芽，也与他平日所推重的，所谓立人本、求放心的唯心论先验论思想相矛盾。

### （三）

既然海瑞在哲学上是个主观唯心论者，又有一些唯物论的思想观点，这就必须找出它思想上矛盾的原因并寻求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这与海瑞毕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实干家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宋明时期有一些专会言心言性的所谓道家，并不关心国计民生，也没有什么实际本事，是不学无术的废物。对此南宋的陈亮就曾作过尖锐的批评。但陈亮批评的这种现象，到晚明时更是变本加厉，所以顾炎武对此痛下针砭。他叹息“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是“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与友人论学书》）海瑞生当这个时代，虽然也在宣扬陆、王的心学，但他并不是那种空谈心性的人。海瑞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但与明末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人又有区别。他平生最反对空谈，而是主张言行一致，体用一原和学以致用。他把所强调的人的本心解释为真心，就是要作事认真，并且能够一干到底，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斗争性。

海瑞在青年读书时期，曾经写过一篇《自警词》，里面提出许多质问，为的是提高自己的警惕，是属于类似座右铭的东西。其中自问：“将有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第2页）这是问：你将来会有说过的话而不能做到，白天看自己的影子，晚上对着床上的被褥都感到惭愧，徒然对人空口说白话而自鸣得意吗？海瑞当然不会这样，他的回答是：“瑞有一于此，不如速死。”以后几十年，他的工作行事和私人生活，确是按照自己立下的庄严誓言去做的。根据梁云龙所写的《行状》，谓海瑞青年时稍有知识，就要“学做圣贤，而纷纷世态，皆无当于心”，表示对世俗风气的不满。他认为“以圣贤教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识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卓然不牵于俗者，圣贤也。昧其真而馁其浩然之气，不免与俗相为浮沉者，乡原也。”“故其平生所学，惟务识真，必为圣贤，不为乡原。”“乃若居室之间，人所忽易，公独谓：‘于此不谨，性命之理即为之壅阏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谓何？’”（第534—535页）这里梁云龙的描述，大概可以看出海瑞一生的精神风貌。作为他思想的起点虽然是属于唯心主义，但他要人“识其真心”，不搞弄虚作假，这是他一生的立足点。他所谓真心，就是要真诚待人，认真作事，并且要“明目张胆终身行之”，就是毕生要做到言行一致。他最讨厌那些随俗浮沉，遇事调和而不敢进行斗争的“乡原”。所以他后来出任后，“处群奸嫉恶之时，矢百折不回之节，故任一官，治一事，痛除蠹弊，雷厉风行，严锄豪强，敢犯权贵而有所不畏。”（第603页）他不只是不畏权贵，还给嘉靖皇帝上治安疏，直言天下第一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海瑞骂皇帝故事。当时他随时可能被处死，人人都为他骇怕，而他却“谈笑自若”，与同乡王忠铭对酒论文。当时宰相徐阶，由于处世圆滑，所以海瑞说他“以调停国手自许。然调停处得者少，失者多。”（第560页）而海瑞生平是不搞调和的，他任应天巡抚时，就与豪绅权贵展开坚决斗争。在被攻击罢职时，仍然给皇帝上疏，提出要“不求合俗，事必认真。”还说“九分之真，一分放过，不谓之真。”（第242页）后来王国宪在所辑《年谱》中，称赞他生平“居家而宗族乡党，居官而君民上下，一以至诚行之，不使稍有歉于心。三代直道而行，惟公有之。”（第602页）

从上所述，海瑞的一生行事及其显示出的精神风貌，确是不同于一般的唯心论者。这些人或是无视现实，不管四海穷困以至家国危亡，还是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终日讲论危微精一之说。或自以为己“先立乎其大”，“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以掩盖其空虚，对“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其实是“全无伎俩”。这些人思想的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海瑞却不是这样，他讲的正心诚意，就是要待人诚实，做事认真，并主张一言一行，都是要经受过实践的检验。海瑞这种求真求实的思想，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心学的藩篱，从而向唯物论方面转化。

关于读书，前面说到海瑞似乎有过反对与赞成的矛盾态度。其实海瑞也主张读书，但是要求能学以致用。他任南平教谕时在所订《教约》中就明确指出：“夫朝廷养士，盖欲异日为天下用。诸士日逐营营，必小有裨补后可。乃今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无毫毛补益，谓之何哉！”据此他要求学生读书作文，有“不流之胸中而取之他人者，纵极词华，亦加扑戒。”（第15页）他这里说得很清楚，读书为的是日后能干事，如果自己毫无心得，只是会抄他人的东西，虽然词藻写得很华丽，也要加以惩戒。海瑞学以致用的思想，还用体用一原的理论来加以概括，他说：“体用原无二道。明经体也，以之商榷世务，必有道矣。第经术概言其理，世务非一一自其事而讲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尽事情者。”（第16页）他认为经书只是讲道理，但要通晓世务和多适世用，就要联系实际行事一一讲求。他批评当时“朝有多士而世务无赖者”，即朝廷大臣多不懂世务，并且还有对世务加以非议，海瑞则直斥“其谬多矣”。据此他规定“诸生如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然后由他“就中命策考试”。（第16页）海瑞这里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过去称为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与师心自用的唯心论观点相违背的。黄秉石为海瑞作传，称“其学无不规，而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旨，事事求之于实用。以是直养其至大至刚之气，而历万境之至变，盖终其身无变塞焉。”（第549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宋明理学家多唱这种调子，但事事求之于实用，并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终身不变，这确是海瑞思想的特点，也是他所以能够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的思想契机。

本文上面说过，海瑞的哲学思想曾深受孟子的影响，即使在他事事求之于实用时，仍带有这种痕迹。如他任淳安县知县后，在编写的《淳安县政事序》中有一段话：“天生一物，即所以生万物之理。故一人之身，万物之理无不备焉。万物之理备于一人。故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第37页）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而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这种思想在哲学上是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但是海瑞这套理论从何印证，就是说他是怎样求之于实的呢？事实是从淳安得来的。“瑞自滨海入中州知淳安县事，初阅册籍，民之逃亡者过半，问之则曰惫困不能堪赋役，朴直不能胜奸强使之。而予之心恻然痛矣。剥民以媚人，多科而厚费使之。可为民忿、可为民慨之事日临于目，日闻于耳，而予不平之气愤

然生矣。”（第37—38页）由于他先看到册籍，再经过访问，了解到人民不堪赋役的重剥和奸强的凌虐，种种使人忿慨的事实，日日耳闻目见，才使他恻然心痛和不平之气愤然而生。由此可见，海瑞在淳安所以为人民作过一些好事，并非因为他天生就身备万物之理，也非他是具有先验的恻隐和是非之心；而是剥民残民的事实日日使他耳闻目见，才令到他哀之忿之，情不能已。我们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海瑞本人自认为唯心论的先验论在起作用，但其实却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因此我认为：海瑞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只是来自圣贤经传，但他在实际行事中对此却进行了不自觉的改造，因而形成他思想上的矛盾。这是海瑞在哲学世界观上既已师承儒家的心学传统，但在实际行事上却又闪耀着不少唯物主义思想的认识论亮光。



## “屯，难也”辨

张桂光

“屯”字的初形和本义，自来多据《说文》的“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作说解。但考诸甲骨文，则屯字的形与义，都不是《说文》所说的那么回事。

屯字甲骨文作夕，最常见的辞例是作“△示○屯”形式，屯只用为一对卜骨之称。“一屯即一对”（董作宾说，见《殷虚文字乙编·序》），甲骨学界基本已无异议。

从聚合在一起的一对卜骨这一形构中，引出“一对”“配对”“聚合”等意思都不难，若联系《周易》乾、坤、屯、蒙……这一卦序看，“蒙者，萌也，物之稚也”，蒙所指的就是事物的萌芽状态，乾坤相交而万物萌生，乾坤相交配对了，才能孕育出万物的萌芽，处于乾、坤与蒙之间的“屯”，解作相交配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说文》曾引《周易·彖传》的“屯，刚柔始交而难生”作为“屯，难也”的依据，而对这句话细加分析，我认为，刚柔相交是最重要的，“难生”仅指相交以后、产生以前所经历的痛苦阶段。是刚柔相交配对产生萌芽，而不是“难”产生萌芽，《周易·彖传》的这句话，实不能作为“屯，难也”的依据。

屯字的初形是聚合在一起的一对卜骨，本义是“一对”，《说文》“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的解释，是误据亨这一讹变了的小篆形体作分析，并错误地理解了《周易·彖传》中的“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这句话得来的，因此，是不能成立的。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于社会科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一个课题。我们开辟了 this 专栏，对科学方法和有关的应用问题作一些简要的介绍。欢迎来稿。对这个专栏中文章的不同看法，也希望提出意见，进行讨论。

——编者

##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

颜 泽 贤

七十年前，列宁所预言的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巨大潮流，①今天正猛烈地冲击着社会科学的大门。一些清醒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已感受到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的压力，他们或发微探幽，或“越人藩篱”，开始了新的探索。

这股潮流的第一个浪头，便是科学方法论的冲击。随着一系列新兴学科，尤其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诞生和发展，首先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渗透到其他几乎一切学科领域，其中当然也冲击到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究竟能不能移植和借鉴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方法？目前国内尚有不同看法。本文仅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对科学方法论移植和渗透的历史、机制及现状作点粗略的介绍、分析，以期引起广泛讨论。

### (一)

人脱离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从学会使用工具开始的。工具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中介。科学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也有自己的工具，这就是认识手段，方法是认识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质言之，科学方法乃是用于获得新知识的已经证明了的理论。因此，方法不是人为的、先验

的假定，而是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积累的。因此每一门学科都是特定的内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方法是该学科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方法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标志着科学自身的每一次重大飞跃。

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的移植和渗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决非人们的主观想象和臆造。纵观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每一次质的进步几乎都伴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的某种巨大冲击。

在古代，由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尚处于混然一体之中，所以那时的自然科学方法也就是社会科学方法，二者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自然哲学方法。人们凭直觉，以其自发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来笼统地描述整个世界，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古代人就是以这种统一的方法论，涉猎了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从而显示出他们的独创性和天才。

至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一次次冲击，列宁作过高度概括，他说：“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弟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

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②

近代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和方法，冲击和影响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古典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那种机械的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方法，在绝对时空中寻求决定因果律的抽象方法，以及一些观察、类比、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广泛地渗透和被移植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故人称十八世纪为“力学世纪”。那时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以机械力学的内容和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和理论。从霍布士、洛克的哲学思想，到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及至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的哲学无不带有浓厚的机械力学色彩。从配弟到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功地采用了自然科学中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方法，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在价值论、工资论、地租论等方面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配弟于1690年发表的《政治算术》一书，第一次将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学研究。此外，如孔德、斯宾塞、汤因比等一批重要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自然科学方法。

马克思时代，由于自然科学中一系列重大成就，如康德的星云假说、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元素周期律等，一方面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另一方面又为辩证方法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尤其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充分揭示了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固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才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奠定了最高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列宁时代，他及时的总结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出现的现代物理学的革命，使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大变革，随之就是向社会科学的冲击、渗透和移植，这可以说是人类整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 （二）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的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中，一组新兴的横断学科—系统科学（其中包括系统论、信息

论、控制论等）相继崛起，应运而生。系统科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科学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同样带来了科学方法论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系统科学以系统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它是一组科学群，其基础理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等，其应用学科主要有系统工程等，近年来又发展了系统自组织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和泛系理论等更为一般的系统理论。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其基本内容包括有：

（1）基本概念：如系统、结构、要素、功能、信息、反馈、控制、协调、熵、行为、状态、同构、同态等；（2）基本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相关性原则、目的性原则、稳定性原则、有序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定量化原则等；（3）基本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符号化方法、形式化方法、模型方法、最优化方法以及功能模拟法等。可见系统科学从不同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新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所以国外有人认为，系统论和控制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③因而，它一经诞生，便迅速的渗透和运用到其他的科学领域，以致六、七十年代在有些国家形成了一股“系统热”。然而，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目前对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意义、作用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等，还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

我们认为，象历史上任何一次潮流一样，在这次更为巨大的潮流中，系统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和移植，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的客观性。

首先，由于现代科学的触觉广泛地深入到物质世界的各个领域，揭示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信息过程和控制运动规律的复杂系统。凡举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生物体、人、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总星系、社会、国家、政党、学校、工厂、雷达、电子计算机等一切事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宇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从人类社会到人的思维，一切都自成系统，又互为系统。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纵横交错、信息畅通的复杂系统。

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决定了科学认识（包括自然科学认识和社会科学认识）的系统性，因为



科学无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恩格斯曾指出：“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是一致的。”<sup>④</sup>这种一致性一方面揭示出系统科学是系统世界的客观反映，而系统世界本来就应是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说明系统科学方法其功能的特殊性和普遍有效性。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式，正是这种作为它们对象的物质的统一性和系统性，才决定了这两门知识及其方法的统一性。这是系统科学方法能够渗透和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本体论机制。

其次，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其原有方法必然发展的内在需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引进新的科学方法。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无疑是整个社会大系统，这一系统具有极其复杂的特征。第一，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以自然实体作为自己的体现者，另一方面又以人创造出来的所谓“第二自然”的一系列特殊的质作为自己的表征；第二，因此社会现象比起自然现象来，就更为复杂。象“社会历史”、“社会进化”、“社会规律”这样一些概念，就其范围来说，都包含着极其广泛而复杂的现象群，并且反映着作为系统的这些现象群的发展。同时，社会现象与决定这种现象的社会大系统（如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等）的关系，比自然界中也更为多种多样，瞬息万变；第三，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本身的、文化的、道德的、社会心理的、美学的、艺术的等等，这些现象又纵横交错，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构成一种犬牙交错的立体网络结构；第四，各种社会现象是客观与主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总之，与以往相比，现代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更为复杂了。这种复杂性首先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才能有效地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的真实过程。

必须承认，对上述情况和方法，我们过去是重视不够的。如：把客观世界仅仅看作一种机械决定的因果关系，单纯用静止的、孤立的方法把动态的复杂的系统硬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简单系统，而去作纯粹状态的抽象研究；忽视必要的定量分析，而仅满足于一般的定性描述；否认随机因素的客观作用及其运动规律，把它们作为非本

质的东西一概加以舍象；社会科学领域内各学科门类彼此孤立、互不沟通的现象等等。这就不能把一个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真正全面地反映出来，对许多现象往往解释不了或解释不透。学术上有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是方法上片面的问题。因此，方法论的变革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系统科学方法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以往的某些不足。系统科学方法，作为整个方法论的一个中间层次，一端与哲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直接衔接，它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丰富和发展，另一端又与其他具体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它不是以自然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而是以自然界及社会中所有事物的共同属性及普遍联系的系统为研究对象，因而其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完全可以被有效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来。更主要的是，它可以为人们研究问题时提供一套新的认识程序和新的思维方式。系统论的创始人贝特朗菲在谈到新的认识程序同以往认识程序的区别时，认为“古典科学的程序是把观察到的现象分解为孤立的诸因素，然后再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或理论上）综合起来，表现观察到的现象”，而在新的认识程序中，“相互作用代替了线性因果关系；有组织的复杂事态代替了无方向的总和和统计事件。”<sup>⑤</sup>可见以往的认识程序是一种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程序，而系统科学的认识程序则是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程序。系统思维方式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如把结构分析同功能分析相结合；元素成份分析同系统整体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同动态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同横向分析相结合；单向分析同多向分析相结合；历史的逻辑的分析同系统层次分析相结合等等。这是系统方法的核心所在。这种认识程序和思维方式，再借助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有助于人们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认识。而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 （三）

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使得当今科学方法论的移植和渗透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屏障。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分化，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只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纵向开拓的学术

道路,使得不少人钻进了象牙之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是专家权威,而在该领域之外却孤陋寡闻,造成隔行如隔山之势。同时,这种狭窄的专业化,使得某些学者仅习惯于使用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对其他一切科学方法均不闻不问甚至冷漠排斥。这完全是几百年来割裂的研究和分工的限制所造成的一种历史偏见。

然而,科学的自身发展,终归打破一切社会屏障和心理屏障,而趋于一体化。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含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⑥</sup>因此,经典作家总是十分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并力图更多的研究自然科学,把它当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变革的主要力量。经典作家在考虑自己的思维方法与科研方法是否正确时,总是先考虑“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sup>⑦</sup>他们善于从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中总结和汲取新的研究方法,移植和推广到哲学社会科学。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都是光辉的范例。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封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相反它最善于汲取一切科学成果,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历史已经证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日益加强的历史趋势。事实也已表明,系统科学方法是当今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派出的第一批援军。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情报学、管理科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初步得到成功的运

用,展示了系统科学方法的特殊功能和强大生命力。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完善总得有个过程。科学方法的移植和运用同样如此。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目前在某些探索性的研究中,两者结合的水平尚低,运用得不太好,甚至出现某些错误,就因噎废食、止步不前,甚至指手划脚、求全责备。或讥讽为“赶时髦”,或斥之曰“翻版论”。苏联以往对摩尔根遗传学、化学键共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等的批判,我国“四人帮”对相对论的批判,这些历史教训,我们应当汲取。要知道,对于追求真理而不倦不懈者,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sup>⑧</sup>当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和渗透,决不是一门科学方法与另一门科学对象的简单结合。要把一门科学方法真正移植过来,并将其改造为本学科的有机内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决非生搬硬套,贴贴标签所能奏效。只有广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广泛的联盟,经过共同的努力,才能在科学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这种方法论的移植工作,从而把社会科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①、②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③见《哲学译丛》1979年第一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68页。

⑤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1年第三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⑦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6页。

⑧《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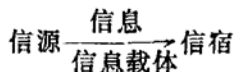
# 谈谈信息论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梁 桂 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信息”这个概念，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接着，它又漫步于社会科学。

信息是什么？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信息确实给哲学的头脑带来“痛苦”。它是隐身人，看不见，摸不着，却感觉到它的存在。让我们从一些熟悉的情况说起吧。甲向乙传递一封书信，信上有文字符号：“我明天去你家。”信息是什么呢？信息不是书信，也不是文字符号，更不是甲或乙本身。信息是由书信文字等材料、符号、信号载荷，在甲与乙之间传递的“我明天去你家”这一消息内容。因此，所谓信息，就是物质世界中，物质之间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中传递或交换的消息内容。那么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物体自身的性质、状态、运动等等各种特性的集合，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某种有序的结构。所以，维纳说：“模式就是消息，也可以作为消息传递。”不过，内容本身并不直接等于信息，它只有在物质之间被传递，使物质之间建立某种关系或者相互作用，才是信息。因此，信息在特征上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动态关系中的内容。

从信息论看，上述例子中的甲称为信源，乙称为信宿，书信文字称为信息载体，信息载体通过的空间称为信息通道，在这个联系中被传递的内容称为信息，这是构成信息过程的基本要素；



信息具有组织、联系、控制的功能，一切系统都是借助于信息流，才建立起组织性，有序性，稳定性，并取得一定的系统功能的。

信息并非人类的特有现象，而是物质世界的普遍现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运动的，运动只能存在于普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物质之间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必然发生信息交换。

因此，信息与运动一样，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信息和信息过程的概念，揭示了物质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建立的一般结构、一般形式和一般过程。

信息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因此，它的客观存在与物质一样源远流长。例如天体演变中无机物质的反应现象，有机物质的感应现象，生物界中的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人类诞生后，从思维、语言、文字到烽火台、邮驿，从电报、电话到无线电通讯、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无不是信息现象。与物质世界的进化相并行，也有一个信息或信息关系的进化史。只是人类一直没有发现物质之间的反应联系，感应关系，反射现象，通讯现象的共同的一般的本质，没有作出“信息”这一范畴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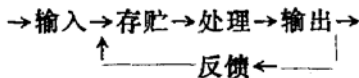
人类最初是从人——人通讯和人——机通讯中，作出“信息”的范畴概括的。这是19世纪中、下叶特别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情。对通讯中信息问题的研究导致狭义信息论的形成。狭义信息论主要是研究信息量的计算、信道容量、消息编码、噪声、信号滤波与预测、信息调制与处理等通讯中的技术性问题。五十年代起，信息论向各门学科渗透，解剖学、生物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经济学、哲学、政治理论、统计学等等一切与信息有关的学科，都是信息论涉足的领域。信息论向各门学科的渗透，形成了广义信息论。

信息论的发展，推动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信息科学是以信息论和控制论为理论基础，与电子学、计算机科学、自动化技术、仿生学等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科学。它着重于研究机器、生物和人类的各种信息的获取、存贮、变换、处理、传

递和控制的规律，设计和制造各种智能信息处理机器和设备，实现人类智能的客体化。二百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人类效应器官（如手、脚等）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今天，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人脑从繁琐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脑更多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信息社会》等著作，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剧烈震动。

信息论和信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现代科学方法——信息方法。由于信息的普遍性和综合性，信息方法也就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性质。

所谓信息方法，就是运用信息的观点，把系统看作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得、加工、处理、传递、转换而实现的有目的的运动，揭示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组织性建立的手段、形式和规律，以及实现有效控制的基本形式和过程的一种科学方法。信息方法的基本特征是撇开对象的具体物质形态和具体的运动形态，把系统运动过程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



信息方法不同于那种把复杂系统分解为简单系统，用简单系统来说明复杂系统的传统的经验方法，它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在信息流层次上有机地把握系统整体。正如我们通过神经系统来把握人体的有机的整体性一样。

信息方法摒弃那种把运动着的活的动态系统看成静止的死的的东西的习惯，它通过揭示信息的转换、传递，处理的运动过程，把握系统的动态性质。

信息方法特别强调信息反馈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它正是通过信息反馈原理，揭示了系统自调节、自平衡、自稳定、自增殖、自修复功能的机制过程。例如人类握笔疾书，导弹击中目标，商品经济市场调节，政治中的民意测验等等，毫不例外地包含着信息反馈的原理。

正因为如此，信息方法在科学上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信息方法揭示了自然界，有机体、社会、机器等不同物质运动形态之间的信息联系。这种联系填平了生命物质与无机界物质，人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恩

格斯说过：“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36至37页）信息方法揭示了这种联系的现实前景。正如各种性质不同的使用价值在价值关系中取得一种等同性、通约性一样，具体物质形态、具体运动形态各不相同的各个系统，在信息世界中，取得了共通的一般形式。因此，信息方法为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整个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手段，而表明世界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实践成果——机器人，电脑，人工智能已经问世。第二，信息方法促使科学整体化。一方面，它与控制论、系统论共生，形成了一个现代的横断学科。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般方法论，渗入各个学科，成了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综合发展走向整体化的媒介层。第三，信息方法可以揭示过去常规方法无法理解的现象。例如，生物进化史上，为什么每一物种总是生产出、复制出与父代一样的子代，现在我们已知道，秘密在于子代的细胞里携带着父代遗传给子代的遗传信息。这些遗传信息控制着子代生育和发育的进程。

有人认为，信息论和控制论、系统论这三个共生横断科学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它适应了科学研究由分析到综合，由实际实物水平上升到复杂的系统水平的客观需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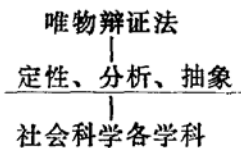
不言而喻，信息论、信息科学和信息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不给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信息的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有力地拍打着人类社会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坝，人们都逐渐感觉到这个冲击所产生的震动。

第一，信息问题已成了社会科学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继工业革命之后，又一次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发生剧烈膨胀，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图景。“信息”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正日益明显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无人工厂、无人车间、办公室自动化、家用电脑、机器人、电子货币，卫星通讯……解

育着一系列社会变革。因此，社会科学如果回避信息问题，必定成为历史的落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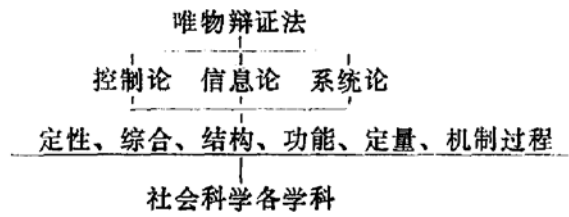
第二，信息从三个基本方面向哲学提出挑战。一是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信息跻身于物质、运动这些哲学范畴的序列中，丰富了本体论的客观图景。二是信息概念与信息方法，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意识的本质，认识过程、结构和规律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特别是信息科学与人脑科学、神经精神学的结合，为揭示人脑思维的生理机制过程开拓了光明的前景。三是信息方法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各种物质之间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但是唯物辩证法没有进一步揭示物质之间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一般结构，一般形式和一般的动态机制过程。信息论与控制论一样，提供了一个介于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学科之间的一般方法论工具。信息方法揭示了物质之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结构，揭示了任何事物系统整体性、组织性、有序性建立的一般机制过程。因此，信息方法为我们分析和把握物质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理论模型。

第三，信息方法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 가 方法论结构。有人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粗放静态的定性分析法。（结构如图一）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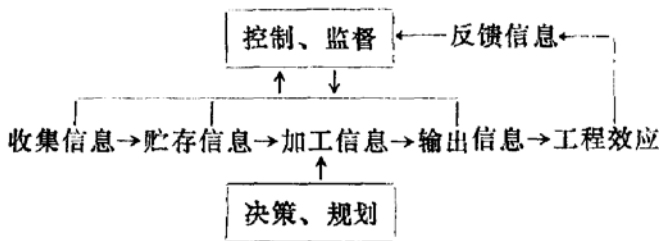
现在信息方法和控制论、系统论共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 가 方法论结构。（如图二）



（图二）

不管这种表述是否完善，但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它意味着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些研究者正开始从粗放的静态的分析水平上升到精密的动态的系统水平。

第四，信息科学和信息方法为各类社会系统工程提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手段方法。社会系统工程就是改造和组织社会的计划、行为。例如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行政管理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在各类社会系统工程中，包括决策、规划、组织管理，控制、监督、实施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的运动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都必须借助于信息的获取、传输、加工处理、贮存等等。例如，没有获取足够的信息，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决策和规划。没有信息的传递，就不可能进行组织、管理。不借助信息流，就谈不上控制。没有信息反馈，也就不可能调节监督。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系统工程简化为一个信息过程：



可见，不掌握信息流，就谈不上社会系统工程。平时人们常说：“情况明，决心大”，就是指获得足够的信息，就会有坚定的决策。但是，过去我们有些工作在作决策、订规划时，却靠“拍

胸口，胆子大。”在没有获取足够的准确的信息时，靠经验和胆子作规划，是不免要造成工作中的巨大失误的。

# 清顺治年间的吏治

蒋祖缘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些有所作为的君主和政治家都是重视吏治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的统治能否相对稳定的根本问题。清朝顺治年间，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顺治帝福临吸取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懂得要统一中国，“君临天下”，其中一个重要的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极力改革明末弊政，注重吏治。他们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来整顿吏治，曾给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一)

清统治者把“定国安民”、“乱中求治”，作为首要的政务。但是，满族贵族集团毕竟只有统治中国局部地区的经验，而缺乏统治疆域辽阔的整个中国的经验，加上明末腐败的官场习气所表现出来的因循守旧、浮泛空言，以及明统治者所造成的视言路为畏途，又成为他们向汉族官僚取得统治经验和实现“乱中求治”的严重障碍。多尔衮有见于此，着眼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广开言路，冀图引导臣下与君主共同关心国计民生的大政，成为清初整顿吏治的根本前提。

当清兵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就宣传“满汉一家”，借以缓和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倚重明朝降官降将和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屡次向他们“博求除弊兴利长策”，<sup>①</sup>和“乱中求治”的“整顿之方”。<sup>②</sup>还改变那种只重形式的浮华文风，提倡“辞尚政要”<sup>③</sup>的文风。规定在章奏方面，“勿得拘牵文义，摭拾浮词”，只将时宜事务，“明切敷陈”即可。凡有切于时务的奏议，有一条就随时上奏一条，不必等到提出“多款”之后再具章上奏。认为这可以使那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奏议，能够早施行一日，就使“国家”早受一日之“福”。之后，清统治者又规定凡参加殿试的人，要在试策里对时政“毋畏，毋隐”，敢于直陈。为了能“各出己见，逐条献策”，还规定文章不用四六句，不限长短，不用歌颂套词，拘束旧式。在顺治四年三月的制策中更明确提出：“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应该怎样才能“痛革”？减税与军饷，应该怎样才不顾此失彼而能“两善”？体现了科举考试的经世致用和求治之切。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又召集各部院大臣，询问近数年来，为什么百姓“甘心为乱”？要这些“多读圣贤书，达治国平天下之本”的大臣们，“各尽所言”。<sup>④</sup>顺治亲政之后，坚持了多尔衮的做法，屡次传谕各部，“凡职掌之内，向来积弊所在，见今

整顿之方，详切敷陈，以资采用”，“毋得浮泛空言，雷同塞责”。<sup>⑤</sup>

由于清统治者颇为注重言路和经世致用，而汉族官僚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也认识到明末弊政必须有所厘革，才能使满汉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巩固下去，以便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从顺治元年以来，汉族文武官吏不断向清统治者提出一些建议。顺治元年五月，保定副将王应登等陈七事，其中有“任贤良”，“重农务”，“惩贪婪”。<sup>⑥</sup>六月，给事中刘昌陈十事，有“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sup>⑦</sup>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有“禁革加派弊政”和“广罗贤才”。<sup>⑧</sup>特别是指出明末加派，“明征之外有暗征，公派之外有私派，民困已极”。七月，户科给事中郝杰陈四事，一是“劝农桑以植根本”，二是“抚逃亡以实户口”，三是“禁贱货以除苛政”，四是“严奢侈以正风俗”。<sup>⑨</sup>十月，工科给事中朱鼎瀚奏言：“至于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务俾人沾实惠，无托空言”。<sup>⑩</sup>上述这些建议，多尔袞都给予肯定，认为“有裨新政”，且次第付诸实行。于是，汉族官僚进言的也就日渐多了起来。

清统治者在提倡直陈“兴利除弊”之策的同时，还意识到如果不把臣下的建言引向对统治者的规谏，既不容易使臣下敢于涉及他们的错误和决策的偏颇，也不容易使他们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因此，多尔袞和顺治都鼓励臣下对他们的规谏。多尔袞曾对大臣们说：我见到你们有过失，就马上告诫；但是，我自摄政以来，一直没有听到过你们的规谏，难道我的所作所为都符合于“道”吗？“虽圣主行政，亦不能尽善”。你们要敢于“抗颜陈说”。<sup>⑪</sup>顺治亲政后也颁布谕旨：“凡有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上”，“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sup>⑫</sup>又说：“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愆者不罪。”<sup>⑬</sup>

顺治从“人孰无过”出发，承认皇帝也会有过失，要臣下“直言无隐”，而他自己则对建言者采取“当者必旌，愆者不罪”，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比较开明的对待建言的态度。当然，“当者必旌”，倒是较易做到，“愆者不罪”，则未必就能如此。顺治六年曾有一道上谕：“言官论事不失者，廷臣集议，毋辄下刑部。”不多久，言官就有下刑部的，并且“一经惩创，则流徙永固”。巡按江南御史李森先就曾为此陈言：“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官之罚”。否则，“相率以言为戒耳”。<sup>⑭</sup>这的确说出了要害。在大臣的谏诤下，顺治毕竟对自己没有做到“愆者不罪”，有所反省，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过这类错误。

顺治十七年，他命吏部呈送因“建言得罪”的名单，由他重新审查，并在六个人的名单中，纠正了对三个人的处分。少詹事李呈祥于顺治十年“条谏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顺治认为“此奏甚不当”，曾将他“流徙盛京”。至此，李呈祥获释。<sup>⑮</sup>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于顺治十二年，曾“上疏极谏”顺治派内监“往扬州买女子”之事。顺治认为此言系“肆诬沽直”。于是“下刑部杖赎，流尚阳堡”，寻死于戍所。至此，顺治认为季开生的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决定“准复官归葬”。<sup>⑯</sup>顺治还公开承认他不单是以往有过失，“即今岂能尽无”！

多尔袞与顺治之所以能够有些开明的风度，除了如《谏闻续笔》的作者张怡所说的

“丸王性宽大”之类的个人性格之外，更主要的与他们“孜孜图治”，息息相关。当时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是：生产凋敝，百姓流亡，战火未息，百废待举。不听取臣下意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他们的统治就很难稳定。正如顺治勉励臣下做好工作所说的：“国家大定，其乐方永。不然，乐亦暂耳！”<sup>①</sup>

基于此，在顺治十一年（1654）的诏书里，顺治说他即位以来，政教没有搞好，生产没有恢复，而内外章奏，都称他为“圣”，这是加重了他的“不德”。规定今后所有章奏文稿，都不得称他为“圣”。之后，又以同样原因，规定“元旦、冬至及朕寿令节庆贺表章，俱行停止”。<sup>②</sup>这除了表现出顺治的精明和勤于政务，还表现出对官场习气的一大刷新。

多尔衮和顺治所采取的上述各种措施和实际行动，尽管有的是出于巩固满族贵族统治的权宜之计，和兑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它毕竟把臣下引向务实和直言，或多或少地有利于下情上达，和有助于君臣们协力去解决当时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 （二）

多尔衮认为“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贿，树党与，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伪为得计”，<sup>③</sup>是明末吏治腐败的又一重要特点；而崇祯“用人行政，颠倒混淆”，<sup>④</sup>更使吏治一蹶不可收拾。但是，怎样才能满清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中不袭“故套”，重蹈明末的复辙呢？清统治者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第一，注重选拔贤吏。清统治者强调和重视贤吏在治国方面的作用。认为“得贤则治理雍熙，不得贤则民生憔悴”。<sup>⑤</sup>从而把选拔贤吏放在“系国家要务”的重要位置上，注重“察吏用人”。

多尔衮和顺治都大力笼络和重用汉族的各类人物，不论是明朝的降官降将，还是“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只要是“真才”，就一概加以录用，并且把他们的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和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以便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地方，特别重视总督、巡抚和知府的选拔。因为“总督、巡抚，任大责重”，“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顺治在全国百余个府治中，更注重那些“或政事殷繁，或地方扼要”的府治。顺治十三年，规定直隶之真、保、河间，江南之江宁、淮、扬、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绍，山东之济南、青、兖，山西之太原、平阳，河南之开封、彰德，陕西之西安、延安，江西之南昌、吉安，湖广之武昌、荆、襄，福建之福州、泉州等三十府（当时湖南、四川、两广等部分地区尚在用兵）为重要府治。对于这些府治，“知府之任尤宜得人”。<sup>⑥</sup>至于州县亦分上中下三等，并据此而委任州县官。不使“精明强干者”，“置于简僻”之地，“无可展布”；不使“剧要地方”，“付衰弱之人”，“务使州县各官人地相称”。<sup>⑦</sup>反映出清统治者不仅重视“贤吏”，且重视“择其年力精强，才气超群”的贤吏担任地方府、州、县各级官吏。

第二，重视举荐。由于举荐是当时选拔官吏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清统治者强调举荐人必须出于“公”心。认为“举主果公则所荐必贤，社稷苍生并受其福；举主不公，则



结党与引进亲朋，或私受贿赂，或转相嘱托，混淆名实，标榜虚声，误国妨贤，莫此为甚。”<sup>②</sup>因而规定，“无论贵贱远近隐显升沉，果有灼见真知，悉行举荐”，并“内勿避亲，外勿避仇”。<sup>③</sup>除督抚负责举荐之外，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举荐才德兼优之人。都察院还根据顺治上谕精神，要求巡按御史在举荐方面，不要单凭道府的开报，不要偏听差役的抑扬，可以从谒见及从文稿中发现人才，还可以听取“闾阎之公论”，“务使举荐者悉孚人望”。<sup>④</sup>凡所举得人，就给予进贤的奖赏，如果营私舞弊，任意滥举，就要绳之以法。

第三，实行定期考核。为了便于了解和掌握各级官吏的政绩，和提高办事效率，顺治年间在察吏方面，实行定期考课。“考任内之实绩，去纸上之虚文”，讲求实际。对京官的考察，曰京察。规定三品以上的官自己陈述，其他由吏部、都察院考察议奏。考核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列一等者，加级记名，则加考引见备外用。纠以六法，不谨、罢软者革职，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调，年老、有疾者休致。”<sup>⑤</sup>京察定为六年一次。

地方官的考察，曰大计，始于顺治二年。考察的内容，开始是从总结明末官吏贪污枉法，残酷地剥削百姓，引起农民起义的经验而提出“守己端洁，实心爱民”。顺治四年规定大计三年一举。在考课中，地方官“才守俱优者，举以卓异。劣者，劾以六法。不入举劾者为平等”。“六法处分如京察，贪酷者特参”。<sup>⑥</sup>顺治八年又进一步规定府县官吏必须“精通文义”，并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地方督抚在顺治十年以前似无考成，从顺治十年起，吏部提出以“消弭盗贼，开垦荒田，清理钱粮，纠除贪悍四则”<sup>⑦</sup>为考核内容。官吏中“碌碌无所短长之人”，即使没有什么劣迹也被降职或免职者，在清世祖实录中颇不乏其例。

第四，严惩贪污。早在多尔衮进入北京时，他一方面对原明朝各衙门官员仍照旧录用；另一方面又告诫他们要“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腹民自利”。他说：“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循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属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宜治以国法，不贷。”<sup>⑧</sup>以后在顺治的上谕中，一再强调“官吏犯赃，审实论斩”；<sup>⑨</sup>“有枉法受赃，俱计赃论罪，重者处死”；<sup>⑩</sup>“贪官必诛”；<sup>⑪</sup>并规定“犯赃十两以上籍没”。<sup>⑫</sup>

当顺治元年刚开始实行严惩贪污时，汉族官僚中有人不同意这种做法，说什么“开国之初，宜从宽大”。这样的奏议，遭到清统治者的批驳，并指出各官“用心砥砺，朝廷自有优礼”。

多尔衮和顺治之所以对贪官污吏采取严惩的政策，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明末吏治极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上到下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是百姓脂髓，搜刮殆尽，“驱之使乱”。清统治者有鉴于此，所以在顺治即位诏里就明确提出：“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倖进，无功冒赏，巨蠹得以漏网，良善必致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

基于此，清政府除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厉制裁之外，还禁止官吏贺生辰、贺到任的习

俗。认为这种庆贺所花费的“小送大送，名为交际，实则贿赂。”规定如有收属下官一物者，抚按察实之后，“即以纳贿参劾”。至于抚按一级，同样不许“迎送往来，交际馈遗。”<sup>⑤</sup> 顺治十七年，又“照例再行严禁大小官员私交私宴及庆贺馈送”。

顺治年间，还禁止官吏向最高统治集团“馈遗礼物”。浙江总督张存仁送多尔袞缎二匹、茶叶百斤，就遭到多尔袞的斥责。多尔袞说：各官赴任时，“曾屡诫以尽忠勤职，毋得谄谀本王，馈遗礼物。尔为封疆大吏，正宜表率僚属，恪遵训旨。”<sup>⑥</sup> 顺治亦曾“诏行幸所过，有司不得进献。”<sup>⑦</sup>

第五，严厉禁止朋党和宦官干预朝政。多尔袞和顺治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朋党与宦官干政，是明末政治上危害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所以，顺治年间，严禁文人聚众订盟结社，严禁考生投拜考试官为师，就是决不允许明末的党争在清初重现和复萌。在严禁朋党的同时，对宦官可能造成的政治上的危害，也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顺治十二年规定，宦官犯法干政，窃权纳贿，结交满汉官员，擅奏外事，私上言官吏之贤否者，予以凌迟处死。借以杜绝官僚与宦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第六，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多尔袞和顺治接受以往的经验，加强和改进了监察制度，注重发挥监察机关整肃吏治的作用。

在中央，清初仍如明代设立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都察院设左都御史掌院事，右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六科给事中自成独立的监察机构，监察六部。在地方，各道设监察御史，另由中央派出巡按御史、巡盐御史、巡漕御史。

都察院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它除了有参与朝廷大议和参与司法之权外，多尔袞还强调要发挥都察院和六科十三道衙门“为朝廷耳目之官”的作用。“凡贪污枉法，暴戾殃民者”，随时纠参，而有政绩的官吏则随时举荐，并要求做到“直言无隐”，“勿循私情，勿畏权势。”<sup>⑧</sup>

鉴于明末监察机关弊端百出和当时在举劾方面出现的问题，都察院还根据顺治上谕作出了有关巡按出巡的若干规定，其中主要有：1.出巡前，不会客，不收书信，不参加宴会饯送，以杜绝都中人士的贿赂和嘱托，而在途中和入境之后，同样不接受私书私馈，以便巡按在实际工作中能秉公处理各种问题。2.专门立册考察巡按御史出巡期间的工作成效，看“民生疾苦，地方利弊有无条陈，果否详明妥当”；看是否不避权势，对果系“大贪大恶”者是否参劾？3.如果巡按御史在“察吏安民”方面，确属“声望大著”，都察院就请旨嘉奖；如果“不遵宪约，怠玩谩职”，就请旨撤回，另派员赴代。<sup>⑨</sup>

清统治者既给监察机关以很大的权力，但也防止其滥用权力，严禁“挟私言事，紊乱纲纪”。凡属诬告和滥举的都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处罚包括革职，反坐，甚至判处极刑。

清初统治者采取上述措施，使顺治年间的吏治与明末腐败的吏治比较起来，的确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生气。但是，满汉官员办事互相推诿和工作效率低，以及执法犯法，徇私舞弊仍是层出不穷。在察吏用人方面，尽管对举荐和考核规定得颇为具体，而执行起

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离不开以“馈遗之厚薄，情面之大小”来决定取舍和升降。所以顺治十二年的“上谕”就指出存在着“循良不得上达、奸婪反叨优考”的严重弊端。

### (三)

清统治者还把整肃吏治与贯彻执行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结合起来，以推动各级官吏忠于职守和“上紧办事”，使清政府的政策得以较有成效地付诸实现。

清顺治年间最重要的一项大政是蠲免明末的“三饷”。多尔袞把明末的“三饷”斥为“弊政”，把官吏的敲榨勒索斥为“糶政”，并明令革除明末“三饷”及一切加派，只按万历正额征收赋税，以实现清王朝的所谓“轻徭薄赋”。

清统治者虽以万历时的赋税作为征收的准则，但明末以来，户口、土地册籍基本上荡然无存，以致征收赋税缺乏根据。这既使清政府很难确切掌握各省的赋额，又极容易在征收赋税方面造成官吏的贪污中饱。于是，清统治者派出大学士冯銓与户部大臣一起察核田土，明了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sup>④</sup>但是，赋役全书直到顺治十一年才次第订正，直到顺治十四年才予以颁布。

早在赋役全书颁行之前，清政府就逐渐推行“易知由单”。顺治元年，山东巡抚方大猷首先在德州施行“由单”，“凡应裁应减者订为一册，其应征者订为一册，合州统算熟地、现丁若干，今应每亩每丁纳银若干，米若干”，使“小民一见了然”，而“积蠹不得售其奸欺。”<sup>⑤</sup>顺治八年，秦世祯巡按江南，先在苏州实行“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民以为便。”<sup>⑥</sup>顺治十年，户部进一步阐明使用“易知由单”的好处，认为“天下有司剥民之术，大要应征钱粮数目不使民知，任其明加暗派，敲朴侵肥，无凭申诉，惟有颁给易知由单一法，足制其弊”，<sup>⑦</sup>决定在各省使用“易知由单”，如“有单外多征者，许诸色人等告发。”

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杜绝官吏贪污中饱之弊，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贪污者的手脚，使之不敢毫无顾忌地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或多或少地起了限制地方官吏在赋税征收方面敲榨勒索的积极作用。

清政府另一个重要政绩是奖励垦荒。清初，耕地大量抛荒，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一现实，清统治者把垦荒作为“与民休养生息”和增加赋税收入的当务之急，除采取措施调动垦荒者的积极性之外，还把垦荒与官吏的升降结合起来，以调动官吏重视垦政。顺治六年，规定“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岁终，抚按考核以闻。”<sup>⑧</sup>顺治十年，又规定以开垦荒田多少，作为地方督抚的考核内容之一。顺治十四年，再规定督、抚、道、府、州、县各级官吏一年内应招垦荒地若干顷。完成了规定指标的，加升一级；如果开垦不实，或开垦后又重新抛荒，则新任和前任官吏分别治罪。<sup>⑨</sup>

上述这些奖惩办法，直接关系到各级官吏的切身利益，促使他们更注重垦政，加快

了垦荒速度。顺治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二百九十万零九千顷，到顺治十八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六万五千顷。

#### (四)

明朝末年整个官僚机构和缙绅地主的极端腐朽，使明朝的积弊已经到了积重不能返的地步。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缙绅地主已一蹶不振，崇祯统治集团土崩瓦解，这就为顺治年间整顿吏治提供了条件；而清朝在入关之前吏治较为清明，入关之后，虽然建立的是满汉地主阶级的专政，但满洲贵族多尔衮和顺治是政权的主宰者。他们与汉族官僚地主的瓜葛还不多，特别是他们有一定的进取心，且精明干练。他们看到明末痼疾之害，下功夫去研究解决的办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吏治的措施。

虽然，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官官相护，办事效率低，……这是封建制度的顽症。顺治年间许多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可能切实做到，甚至有的还是纸上空文，但是，在多尔衮和顺治统治期间，毕竟对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敷衍塞责，腐败无能等方面有所厘革，并且在网罗一批清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和禁止朋党与宦官干政等方面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使顺治年间的吏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良，从而加快了垦荒的速度，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社会逐渐趋向安定，也为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了奠基作用。吴伟业说：“世祖……大修吏治。”<sup>①</sup>昭槠说：“世祖亲政后，任法严肃，……故人知畏惧，夙弊尽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sup>②</sup>《清史稿·世祖本纪》说：顺治“清赋税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虽景命不融，丕基已固。”应该说这些不全是套词。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761页。

②、⑤、⑬《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79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七。

④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4页。

⑥、⑦、⑧、⑪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

⑨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

⑩ 《清世祖实录》卷十。

⑪、⑳ 《清世祖实录》卷五。

⑫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41页。

⑬ 《清史稿·范文程传》。

⑭ 《清史稿·李森先传》。

⑮ 《清史稿·李森先传李呈祥附传》。

⑯ 《清史稿·季开生传》。

⑰ 《清史稿·范文程传》。

⑱ 《清史稿·世祖本纪二》。

⑲ ⑳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 ②1、②4、②5、③8《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21页。  
 ②2、②3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68页。  
 ②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27页。  
 ②7、②8 《清史稿·选举六》。  
 ②9 《清史稿·成克巩传》。  
 ③2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③3 《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③4 《清史稿·王命岳传》。  
 ③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62页。  
 ③6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③7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  
 ③9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9页。  
 ④0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④1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237页。  
 ④2 《清史稿·秦世祯传》。  
 ④4 《清史稿·世祖本纪一》。  
 ④5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九。  
 ④6 《梅村家藏稿》卷三十三，文集十一。  
 ④7 （清）昭槁《啸亭杂录》。



## 《商颂》难句试释

晁福林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是研史诸家经常称引来说明早商历史的诗句，其中的“宅殷土芒芒”，历来被解释为殷人所居土地之广大。然而，究其实际，疑恐未然。在这句诗里，“古”读故，原因之谓，意思是天生下了殷人，由于他们能够“宅殷土芒芒”，所以天帝才让武汤征服了四方。“宅殷土芒芒”是殷能够征服四方的原因，若以土地广大释之，显然与诗意不合。解释这句诗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宅”和“土”的意思。这里的“宅”，同砮，读磔。《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砮死于社。”索隐：“砮音宅，与磔同，古今字异耳。磔谓裂其支体而杀之。”“宅”是殷代习见的祭祀用牲方法，甲文作𠄎、砮、𠄎等，都读磔（参见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释林》170页）。卜辞中受到磔祭的除了殷先王之外，还有“宗”（续存下876）、“寝”（前4.15.1）、“门”（乙8896）“社”（甲1640）等。“宅殷土芒芒”这句话，《史记·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芒芒”。卜辞中“社”均作“土”，可见《三代世表》引作“殷社”是有根据的。“社”多用血祭，《公羊传》僖公十九年，“以血祭社稷”，甲文“社”有作“𠄎”（前下36.1）“𠄎”（铁236.4）等形者，乃是以血衅社之义。卜辞云“癸丑卜，其又亳土（社）𠄎禘”（甲1640），与“宅殷土（社）”十分相近。磔祭时割裂牲体，鲜血淋漓，就是“宅殷土芒芒”的“芒芒”之义。芒，通茫，原指水盛貌，这里借来形容血祭之盛大。“社”的古文作“𠄎”，犹存以血衅淋神主之古义。总之，“宅殷土芒芒”意谓以芒芒之牲血来磔祭殷社。正由于殷人对神灵如此虔诚，所以天帝才保佑武汤征服了四方。这样解释，诗句通畅，庶几近乎《玄鸟》的原义。

# 中法战争期间的广东防务

唐上意

在一八八四年开始的、为期一年多的中法战争中，法军以越南为基地，分海陆两路大举侵略中国，海战发生在福建、台湾沿海，陆战发生在广西、云南边境，唯独处于这两个作战地带之间，并与越南毗邻的广东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为何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笔者认为，情况复杂，因素很多，既与法国的侵略目标和侵略部署有关，尤与广东布防严密，使法国的侵略阴谋较难得逞有关。本文拟就当时广东的防务情况作一分析。

## (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将越南蚕食鲸吞成为其殖民地之后，继之以“征服”中国为侵略目标，欲占据中国的西南和东南一带。时任清廷驻法公使曾纪泽就曾指出：“法人夙志，非徒并越，而特以越为脚根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为证。”<sup>①</sup>在侵略战争部署上，法国一方面以越南为脚根，侵犯广西、云南，占领战略要地，达到开通红河流域，攫取在云南和广西通商、开矿、筑路等权益；另一方面，突袭福建水师基地马尾港，破坏中国的海军力量，封锁、围攻、企图占据台湾，以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这两个侵略目标和部署，在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军均已付之实施。此外，法军还有一个具体侵略目标，就是企图进犯与越南毗邻的广东钦、廉、雷、琼地区（钦、廉今属广西），占据北海港，进而插入广西腹地——南宁一带，以切断桂边抗法军队后路，达到侵占粤、桂边境的目的。但在广东严密的布防面前，这个目标却没有实现。

当时，广东防务的加强，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显而易见，对之筹画和部署是否严密得当，首先取决于清廷中枢对抗法的态度和战争指导，尤与两广总督任者对抗法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两广毗邻越南，“地大物博，控驭岭海，岩疆重寄，镇抚期于得人。”<sup>②</sup>清政府于1882—1884年这三年间，对广东曾两派钦差，三易总督，不是没有考虑的。

1882年4月，法军攻占越南河内，覬觎两广、云南边境。广东选派记名提督黄德胜招募劲勇二营，前往钦州驻防，并派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所部及福建调拨的轮船二艘，驶往北部湾海面操防。是年夏，清廷命曾国荃署理两广总督，并谕令曾抵任后，“将该省

水陆边防事宜，悉心规画，通筹全局，彼此联络声势，会商妥办。”<sup>⑤</sup>曾国荃任职期间，虽与广东巡抚裕宽对广东防务“详细讲求”，但以“广东库款尤为支绌异常”为由，其讲求事宜多属纸上谈兵。

1883年4月，法军攻陷越南南定，边事日危。清廷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速赴广东，节制两广、云贵军务，统筹抗法事宜。但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sup>④</sup>力主对法妥协退让，委曲求全。并谓“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sup>⑤</sup>因此，李鸿章以在沪统筹与法会谈事宜为由，拖宕推托，不肯赴任。清廷旋命张树声复任两广总督。张于是年8月抵任后，致函李鸿章，对前任曾国荃颇多指责：“乃闻比年以来，自虎门至省城各要隘，不独当道诸公从未亲出履勘，并未遣一员一将查视；……凡昔年竭蹶所布署者，已渐就废弛，而纸上谈兵，铺陈不遗余力，甚可怪也。……而库空如洗，事机纷歧，凡有措注，率多牵制”。<sup>⑥</sup>张树声这番抨击，不过是为了压低前任，抬高自己而已。他一贯秉承其师李鸿章对法妥协退让的主张，复任后，对广东防务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多数敷衍了事。

法军进逼中国边境，扬言将攻广东，进犯琼州（今海南岛），清廷乃命主张抵抗法国侵略的兵部尚书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办理广东军务。他在由湘入粤至湖南郴州途次，即派员至广州向张树声递送咨函，以其所拟劝办团练、晓示洋商、严禁盗贼告示稿三件，囑张印刷，俟其到时张贴，并函囑势在必行。但张树声深恐“粤中遍地教堂，睚眦之愤，所在多有，剽轻浮动之民气，有触即发，朝发告示，夕必燎原。”<sup>⑦</sup>拒将彭示付印。彭于11月抵粤后，以张“阻其出示，意颇不平”。此后，驻粤的两个权臣——钦、督之间，时多齟齬，主张歧异，对广东防务影响甚大。例如，从珠江口至广州一线的防务，关系着广州和全省的安危。彭玉麟抵粤后，力主加强沙角、大角一带的防务。但张树声不以为然，表面虽勉强附和，但阴下掣肘，他在复清廷驻德公使李凤苞的信中，于此多有流露：“惟鄙人初意，原以虎门口外大角、沙角等山虽系第一重门户，而海面深阔，势较散漫，且迤西蕉门、横门等口，敌船均可绕出虎门之后，以长洲总扼诸路，两岸犄角设守，较有把握，是以拟先全力布置此处，以次再及虎门口外。迨雪琴宫保（彭玉麟——引者注）奉命来粤办防，锐意派所部出扎大角、沙角两山，遂不得不分后路之力。”<sup>⑧</sup>张树声极力排斥彭玉麟，曾多次致函总署和李鸿章，以“分责任”为名，要求清廷将彭调驻琼州或派驻中越边境视师。后因驻防广州的将军长善电奏清廷留彭驻省，此议未果。

中法战争爆发后，抵抗法国侵略，保卫国家安全，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政府由和战不决，逐渐转向主战。而张树声对敌畏葸，对防务敷衍塞责，对彭玉麟掣肘排斥，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和弹劾。被时人称为“清流党”的主要人物之一，山西巡抚张之洞，曾就粤防和张树声之所为致函诘问李鸿章，并多方进行抨击。他指出：“粤之官绅不和，钦督不和，大是坏证。”他反对遣彭玉麟率四营驻防琼州，谓此举，“无益于琼而有损于广”。<sup>⑨</sup>他对张树声和总署等阻挠彭玉麟发布有关抗法的三项告示，愤愤不平，

说：“此示尚不敢出，何论交锋乎？”<sup>⑩</sup>他多次上奏清廷，陈述战守事宜，沥陈不可罢兵，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张树声的劣迹，众口交讥。他见处境不利，遂致函李鸿章：“不才衰病侵寻，加以厄运届临，动辄得咎，再事迟迥，必重为师门之辱。”<sup>⑪</sup>以病乞休，期于摆脱。清廷准张去任，但暂留广东会办海防。

## (二)

1884年5月，清廷命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同年8月实授），这既可调和钦、督矛盾，又可加强两广防务。7月，张之洞抵广州接篆视事。是时，法规纵横中国南部沿海，警报狎至，而广东台疏械缺，形势转急。张之洞会同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等文武大员，乘船巡查各海口数日，“熟议海防诸务，意见悉符。”<sup>⑫</sup>根据张之洞原已提出的“援台必先急越”的战略思想和“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的战守原则，对广东防务，决定采取加强省防，以保重心；西固廉琼，策应桂军；东固潮防，援助台、闽的战守部署。

加强省防，以保重心，是粤防之首务。他们一反张树声之所为，决定从珠江口至省城广州，水陆两路，四层设防，钦、督、抚、将分路督战。

其一，增强虎门口内外防卫，以固省城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在虎门之外，最关紧要，故饬记名提督娄云庆于沙角添置两营。大角与沙角对峙海口，原驻两营，兵力过于单薄，饬记名提督王永章于大角亦添两营。虎门内的威远炮台，由水师提督派部驻守，但炮台后山空虚，增派三营兵力驻防，以为威远炮台接应。虎门以西的厓门、横门、虎跳、磨刀等六门，其水虽浅，而小轮船可直达佛山镇，拊省城广州之背。张之洞委水师提督方耀派员雇募拖船二十号，配足水勇，分守陈头、五斗口一带河面，以顾省垣后路，并调集小轮船十号，红单船十号，驻泊横档左右，以为沙角、虎门各炮台应援。彭玉麟驻南石头，有敌警则亲督虎门一路。

其二，加强黄埔防务，以固省城第二重门户。长洲新修炮台，设有水雷，有巡雷舢板二十船，巡勇三百名。张之洞令新招炮勇三百名，在沙路炮台前构筑土台，增设炮位，加强防护。又令由长洲至沙路、至鱼珠各派二十船，并新增红单船十号和扒船十号，共备足船只七十号，以为长洲、沙路、鱼珠各炮台应援，使三台联为一气，随敌所趋，首尾相应。张树声驻长洲，有敌警则亲督黄埔一路。是年10月张树声病死后，由张之洞统督长洲、沙路、鱼珠一带。

其三，扼守鱼珠，以固省城陆路总要。鱼珠与长洲、沙路唇齿相依，为入省城陆路总要。除加强水路防守外，饬署广州副将记名总兵邓安邦添派两营固守。有敌警则张之洞亲督鱼珠一路。

其四，四郊设防，以固省垣。广州城郊各炮台和战略要地，派重兵驻防。河南防务空虚，饬署陆路提督郑绍忠新添两营防守，随机策应。各路要冲构筑土台守御，以防敌人旁抄分扰。沿江筑堤为障，名曰地营。又雇募沙艇于江中沙道狭窄处设法拦截。由倪



文蔚和将军长善分任广州城守。

经过张、彭、倪等几个月的大力部署，筹饷备械，调兵遣将，布点设防，从珠江口至省城四郊，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据统计，当时驻防珠江口内外至省城广州四郊各据点的营勇，有陆军六十二营（按营名统计），三万多人；钦、督、抚亲兵，巡防绥靖营，开花炮队，缉捕勇营，巡防勇，壮勇等，约数千人。水师则包括轮船，红单船，扒船和巡雷舢板船等兵种。以上水、陆、炮营和团勇合计约四五万人，兵力相当雄厚。沿江四层设防，城厢四郊据守，比较坚固。练军、防军为主力，团勇配合防守，相得益彰。水、陆、炮、雷联合布防，多兵种配合作战，比较严密。

1884年8月，法军侵袭台湾基隆炮台被击退后，法舰袭击马尾港，福建水师和船厂损失惨重。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9月粤省奉旨，有法舰侵粤之说。张之洞等飭各军加强防守，令广州府堵塞各口港汊，以防敌舰入侵。颁布《商船带水章程》，派镇涛轮驻泊虎门江口执行带水、侦探和报警任务，规定：各国商帆轮船，不准夜晚进口，仍由镇涛轮上充当翻译的外国雇员过船查询明白，确系商船，即派一带水人在船俟天明放行入口；各国商船日间升旗，镇涛轮翻译见旗即过船查询，给带入口；日间远探敌船，镇涛轮即升报敌旗，放号炮，各炮台早作准备；夜间上灯之时，镇涛轮翻译即驶小轮船出巡，令丁瞭望，密切监视珠江口动静。这一措施，既保证外国商船照常入口来穗贸易，又加强了对敌船的侦探和报警，加强了省河沿线的防卫。

### （三）

广东带海为疆，沿海防线袤延四百余里。广、廉、琼、潮四海口首当其冲。省城广州居中，东、西、北三江于此汇合，为全省根本重地。西翼廉、琼毗邻越南，法舰游弋，侵扰频繁。东翼潮州接近台、闽，战事孔亟。张之洞等在筹办省防的同时，大力加强两翼防务，以保全省安全。

潮防方面：张之洞责成镇道联团集饷，严密布防，由潮州镇总兵戴朝佐统领潮普勇营和巡防营。潮州除固守外，还负有增援台、闽的任务。因潮勇对台、闽风土较习，粤省援助台、闽的大批军饷、枪械多由汕头起运，曾有二营潮勇随船抵闽。另有五营潮勇准备援台，因法舰封锁台湾海峡，渡兵尤难，未能成行。

琼防方面：1888年初，当法军进犯越南北圻，威胁琼州时，粤省即派水师提督吴全美统率由粤、闽调拨的兵轮八艘驻泊琼州，游奕北部湾海面，加强警戒。是年底，粤增派王之春率湘军二营驻琼，旋命王之春署雷琼道，统领当地粤、湘水陆军。此后，驻琼水陆军日渐增强，计有春字营，毅字营，安东营，全字营和安勇新营等营勇，水陆军共达十二营（按营兵统计），六千人左右；将官中即有补道一人，记名提督一人，记名总兵一人，补用副将二人，候补副将二人，参将一人，游击一人，候补都司一人。

廉防方面：展设电线直达钦、廉、雷、琼，以便驻省督、抚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加强指挥调度。钦州一带，令统带劲勇营参将莫善喜与奏办团练之前广西提督冯子材酌增

数营，严密防守。

冯子材因受徐延旭之流排挤而解甲还乡后，清廷给他一个高、雷、廉、琼四府团练督办的虚衔。冯子材虽年近古稀，但壮志未衰，数月内即在九个州县办起团练，钦州团有练勇五百，是为主干。张之洞督粤后，即致函冯子材，支持和激励他发展和精练民团：“战局纷纭，必须有后路攻击之师，庶几敌人有所顾忌，不致尽起陆兵肆扰各口。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凉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sup>⑧</sup>冯子材筹建的这支团练，以农民为主体，在抗击法国侵略、维护祖国安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如1884年9月，法国传教士唆使涠洲、西场一带教民三百多人骤集北海，阴谋暴乱，以为法军内应，即被当地团练驱散。张之洞关于“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的战略计划确定后，11月即饬冯子材以当地团练为基础，募勇十营（后增八营），组成萃军，会同王孝祺统领的勤军，开赴广西龙州，直趋前敌，成为桂边抗击法军的中流砥柱。

北海一口，以高州镇总兵张德禄与奏办团练之总兵李起高任防务。1884年9月，法舰至竹山口一带窥探，又复延接教民，企图里应外合，侵占北海。张之洞饬张德禄等“宜多发侦探，激励所部，联络民团，严密守御。如遇窜扰，奋勇攻击。”<sup>⑨</sup>1885年1月底，法军大举侵犯越桂边境，法舰时向廉州北海窥探，测量水势，居心叵测。张之洞即调兵遣将增援北海，将原拟援台后因故无需赴台的，由游击方沿统率的五营兵力调往钦廉一带，与张德禄等互为联络，力挫敌焰。

在战略思想上，张之洞对钦、廉、雷、琼的防务，以守为主，但不囿于消极防守，而是审时度势，相机进攻。1884年底至1885年初，中法战争处于陆路大决战阶段，张之洞深谋远虑，从抗法全局出发，计划以粤军为东路，从钦州攻击法军后路，开辟陆路抗法的第三战线（西路滇边，中路桂边为第一、二战线），以支援滇、桂的抗法斗争。为此，他饬钦、廉与雷、琼两地防军协同作战。1885年初，张之洞令解去饷银三万两，交钦州库存备用，令署钦州营参将莫善喜速募健勇一千五百人，分为三营，加上旧部二营，共五营，会同管带安东营、署海门营参将陈荣辉率领的琼军三营，从钦州进军。琼军于1885年2月8日抵龙门会合。但当莫、陈从钦州准备拔队袭击法军后路时，广西巡抚潘鼎新畏怯避战，2月12日退入镇南关（今友谊关）内，致使张之洞从东路与桂军配合进攻法军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到了三月，以粤省援桂的冯子材萃军为主力，却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使中国在军事上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广东曾三次罹其祸害。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琦善、奕山和叶名琛等镇守广东的清朝官僚腐败无能，防务废弛，对敌妥协，畏葸避战，致使英、法侵略军未受多少阻截，即兵临广州城下，掠地攻城，强迫清朝驻粤官僚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夺了大批赔款和侵略

权益，使广东人民惨遭其害。而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军频扰广东沿海，伺机入侵广州，但由于主持广东防务的张之洞和彭玉麟力主抵抗法国侵略，支持人民的抗法斗争，对广东防务作了周密的部署，结果却出现了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迥然不同的局面，使法国侵略军未敢贸然入侵广东，从而保卫了广东的安全，广大人民免遭涂炭。这种有备无患的历史教训，发人深思，值得牢记。

① 《曾侯致李中堂》，胡传钊：《盾墨留芳》卷三，第42页。

② 《屠光禄疏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第549页（以下简称《中法战争》）。

③ 曾国荃：《遵旨通筹边防事宜疏》，《中法战争》（四），第271页。

④ 《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中法战争》（四），第45页。

⑤ 《李文忠公全集·复张蕡斋署副宪》，《中法战争》（四），第8页。

⑥ 《张靖达公杂著》，《中法战争》（四），第334页。

⑦ 《张树声来往函牍》，《中法战争》（二），第542页。

⑧ 《张靖达公杂著》，《中法战争》（四），第339页。

⑨ 张之洞：《与张幼樵书》，《张文襄公全集·书札》。

⑩⑪ 《中法战争》（四），第518、340页。

⑫ 彭玉麟：《遵旨覆奏并陈今昔情形不同折》，《中法战争》（四），第429页。

⑬ 《张文襄公全集·书札》。

⑭ 《批高州镇禀法船窥探海口情形》，《张文襄公全集》卷114。



# 丘逢甲爱国思想的发展

刘 圣 宜

丘逢甲（1864—1912）一生四十九年。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成年开始，到甲午战后内渡为止，即从1884年到1895年。这时他的爱国思想集中体现为保乡守土的反侵略思想。第二阶段从1896年到1904年。他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为兴新学、开民智的教育救国思想。第三阶段是从1905年到1912年。他的爱国思想突破了政治改良的樊篱，赞同、支持反清民主革命。虽然他的爱国思想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并显示了他在爱国主义推动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总趋势。

第一阶段：以保乡守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思想的产生及爱国热情的初次爆发。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丘逢甲刚满二十岁。帝国主义的野蛮凶残和中华民族的积弱不振，给这个青年人以深刻的刺激和强烈的震撼。他“闻变，忧心忡忡，于是知国事之多艰”，“乃益留心中外事故及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sup>①</sup>

看起来似乎是外患突然掀动了丘逢甲的爱国之心，探究下去却发现丘逢甲的爱国思想是深深地植根于祖国的沃土上的。有一次，他和朋友打赌赛诗，在三天之内一口气便写下了一百首台湾竹枝词，描述台湾的历史、政教、山川、风俗、民情，首首新艳，绝无雷同，当时便倾倒了不少人。但当人们为“东宁才子”的华美辞藻叫绝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青年人对乡土的激情。他熟悉和热爱台湾的程度，超乎一般人之上！正如他在竹枝词中所写的那样：“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sup>②</sup>因此，当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伸进来时，他的痛恨是可以想见的。

当时，唐景崧任台湾兵备道，因爱逢甲之才，招他入幕佐治，逢甲则“毅然以天下为已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sup>③</sup>当时，他主要著有《中国学西法得失利弊论》、《何以安置余勇》、《穷经致用赋》等文章，初步显露了他具有一副关心国事、注重实际、眼光开阔、见识新颖的头脑。1889年，丘逢甲科举成名后，归乡以教书为业。他注重实学，“又常劝勉学生多阅报章以广见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增长了西方民主政体知识及爱国主义思想。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打响。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一个跟着一个传来。对时局

素为关注的丘逢甲十分担忧台湾前途，他毅然投笔而起，以守土拒倭号召乡里，倾家资以为兵饷，着手组织义军。丘逢甲一家“子弟能干戈者，尽令从戎，兄弟子侄成年者，皆入营伍”。丘逢甲不但洞察了日本人对台湾的野心，而且对清政府的懦弱无能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强调只有依靠台湾本土人民奋起自救，才是出路。所以他大力倡导群众“人自为战，家自为守”，并向来台帮办防务的中央官员表示：“如当国者真有弃台之意，窃愿举所有义旅共保危疆。”<sup>④</sup>为了团结人民一致对外，他致书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对义军的态度应“以宽御众，结以恩义”。他带领义军协助官军防守各关隘，一改平日名士作风，誓与士卒同甘苦。

1895年4月，中日签定割台之马关条约。丘逢甲闻讯悲愤异常，率领各界绅民向唐景崧呈文，并电奏朝廷，力争废约。呈文写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被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然而，“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不论电争，还是电骂，卒不能挽。

清廷弃台，把台湾人民的抗日战争推向更为艰难的阶段，台湾各阶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投降派十分害怕日本人，认为“一拂其情，势必全力并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台抚唐景崧对于抗日护台也缺乏信心，觉得“坐困绝地，兵少难防”，“久支强敌，难操胜算”。一批贪生怕死的官僚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跑。官一离任，民变立生，抢劫四起，各处大乱，面对这种情况，丘逢甲气愤地说：“余早知有今日矣！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sup>⑤</sup>于是，他发表自主保台文告，庄严宣告：“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以图固守，以待转机。”对祖国的依恋；对朝廷的抱怨，对敌人的仇恨；对命运的抗争；各种复杂的感情，都掺和在这字字血泪之中。

丘逢甲带领义军与日寇血战至七月下旬，终因弹尽饷绝，挥泪离开台湾。行前悲愤交集，感赋七绝六首。其中有一首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sup>⑥</sup>表达了他对李鸿章卖国行为的切齿痛恨和护台失败后万分悲痛的心情。

第二阶段：以兴新学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如果说前一段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是保卫乡土的意念，那么，内渡后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切；如果说前一段他的爱国热情在反侵略战争中爆发出闪电一样的火花，那么，内渡后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在教育 and 创作中燃烧得更为炽热了。

丘逢甲离台内渡，定居于广东顺德县定山村，在深深的悲痛和失望中度过了归粤的头两年。但对台湾的怀念和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又使他很快振作起来。1896年他送谢道隆归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

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愧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sup>⑦</sup>

甲午战争引起了丘逢甲深深的思索。他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所标榜的富国强兵的虚妄，在《海军衙门歌》一诗中，他记录了洋务派“经营惨淡之十年”的海防一举而败坏，致使“百万冤魂海中葬”的历史悲剧，对李鸿章吹嘘的海防优势作了辛辣的讽刺，对卖国外交作了愤怒的谴责。如何才能战胜外国侵略者？如何才能使国家摆脱深重的民族危机？丘逢甲痛定思痛，过去比较朦胧的维新变法思想迅速变得明朗起来。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举起维新救国的旗帜时，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具体行动中，他认为自己长于教育，“故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sup>⑧</sup>

丘逢甲抱着“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的信念，在广东首倡新学，作出了不少成绩。丘逢甲很早就留心西方文化，在台湾执教时已“深感括帖之无用，在教授应试文艺之外，兼授中外史实及世局新知等。”<sup>⑨</sup>在韩山书院，更因摒弃八股试帖而与书院守旧势力不合。1899年，他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汕头筹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1904年，他又在家乡镇平县创办了初级师范传习所、镇平县立中学堂及东山、员山“创兆学堂”。他在员山创兆学堂自撰一联表达自己的志向是“创新学界，兆大人文”。他还派出宗人子弟往福建的武平、上杭及邻近的平远、嘉应州、兴宁等地，为同宗及异姓筹办族学，“先后共劝办学校以百数”，韩江上游小学教育因之发达。丘逢甲的办学目的十分明确。他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一文中，把教育与救亡紧密联系起来，反复申述中国“鄙夷西学不屑道，以驯致于贫弱而危亡”的沉痛教训，明确地指出：“国以何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以何弱？其民之愚弱之也。”并大声疾呼“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号召青年“振刷精神，破釜沉舟”，勇敢地担负起救亡的责任。丘逢甲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一方面抓好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岭东同文学堂采用新式教科书和西欧新法教学，开设格致、生化、经史、算学等课程，并特地聘请日本学者为教授，介绍日本维新学术。由于此校时时“灌输革命及维新之说鼓舞士气”，有志者趋之若鹜。办校十多年，“岭东民气蓬勃奋发”，<sup>⑩</sup>确实起了启民智、育人才的作用。

在办学过程中，丘逢甲与各方面爱国人士的联系加强，眼界开阔了，思想也开朗了。在立志维新救国的同时，渐有同情革命的倾向。1900年，他到南洋筹募办学经费，在香港会晤了正在倾尽全力组织武装勤王运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与他们合照了持刀并立的照片。据丁文江先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载，三月初十，梁启超致书乃兄君力，言各地运动情形，其中有“丘仙根进士倡率屋闹”之语，透露了当时丘逢甲的思想与立场。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康有为提倡的维新改良同时并起，兴中会已策动过广州起义，正在酝酿惠州起义。丘逢甲对孙中山的活动也表示了赞许。有一天，他与唐才常纵谈时局，认为“孙某所倡排满革命，名义甚正。”<sup>⑪</sup>

1908年，中国知识界中兴起了革命思潮。上海爱国学社鼓吹种族革命，岭东同文学堂学生争相起应，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十分理解青年学生的救国抱负，对此不加干涉，还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当时丘逢甲有古诗一首赠谢逸桥，诗

中对这个青年惊世骇俗的激烈言论拍手叫好，反映了丘逢甲思想的开放。诗云：“人言谢生颠，吾未敢从众。与言世界事，谈言动微中。即令能颠亦复奇，终胜老生了无用。神州大陆殊可哀，纷纷老朽无人才。眼中突兀少年在，令我郁郁心颜开。即今时事须放手，安得人尽颠如雷？谢生言论自由耳，已令世人骇俗死。丈夫何止用口舌，治世界事从今始。时哉时哉不可失，东南风吹大海水。”<sup>⑩</sup>丘逢甲的门生子弟不少是坚决反清的志士，可以说与他的鼓励赞许不无关系。如所周知的辛亥时活跃人物邹鲁、姚雨平、陈炯明等均出其门下。

### 三

#### 第三阶段：支持民主革命，爱国思想谱新篇。

丘逢甲因为办学成绩显著，开广东新学之先河，受到当政者的重视。两广总督岑春煊于1906年聘请丘逢甲担任两广学务公所参议。不久，又改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和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教育界同人又推他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在广东学务公所时，“凡有拟议，胥为岑春煊及公所总办张鸣岐所深信用，几于言听计从。”<sup>⑪</sup>随着丘逢甲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高，他与粤省大吏的往来密切了。这给丘逢甲思想的转化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一方面，他同情革命，对康有为所持的保皇立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在他的诗作中，与封建官僚的唱和之作增多了，褒扬节妇，提倡尊孔的诗作也出现了，甚至对革命党人发动民变兵变深表疑虑。总之，这一阶段的头几年，丘逢甲的思想呈现出徘徊不定，新旧交错的状态。

丘逢甲思想的根本转变是在1909年。这一年，广东省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副议长。他热心为地方兴利除弊，又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为书记长，邹鲁、陈炯明为书记，倚仗他们兴学禁赌，颇有成效。但在谘议局争取立宪的运动中，他越来越看清了清廷顽固保守，失尽人心，终于产生了背弃清廷的念头。这年秋天，他写了《秋怀八首》，中有一首云：“满目洪流治已迟，谁教天展九年期？元黄大化无今古，风雨神山有合离。四海毕消蛟蜃气，九天同拜虎龙姿。书生自作华胥梦，千载何妨此一时？”<sup>⑫</sup>在诗里他预言清廷气数已尽，正在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一个新的政权将会出现，他希望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他收复台湾的梦想。这首诗可以说是他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标志。此后，他支持民主革命的政治态度日渐明确，行动上也愈为坚定。

1910年，三民主义腾播于全国，丘逢甲十分高兴地说：“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内地，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无所恨也。”<sup>⑬</sup>不过他仍担心革命将招致列强干涉，所以又说：“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坏屠杀，亦不可过当。盖我国今日大患，不在满清，乃在东西列强。若因破坏屠杀而毁伤国脉元气，将益启列强侵略。”<sup>⑭</sup>这几年革命风雷激荡，革命党人不顾危险，多次举行起义、暗杀。丘逢甲每遇失陷者，如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的革命党人，辄以其社会、政治地位力为调护、保全。他因此而渐遭当局疑忌。清朝大员胡湘林、王秉恩等明访暗查，无

所不至，甚至公然以革命党魁之名列诸公牍，登诸报章。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向朝廷密奏广东革命士绅，就以丘名为首，但丘逢甲我行我素，夷然不稍动。

武昌起义前，丘逢甲曾策动水师提督李准归向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广东咨议局召开各界大会，共同议决独立，迫张鸣岐反正。丘逢甲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广东和平光复。广东光复后，丘逢甲被推为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并作为本省代表派赴上海参加组织临时政府，后又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央参议院议员。参加组织政府后，丘逢甲精神振奋，力任艰巨。他对于革命成功，十分欢欣，激动地说：“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又伸手示人以护台战争留下的伤疤，说：“吾未尝一日忘此痛也。”在南京，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冒雪游孝陵，写下了“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的诗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不幸，此时丘逢甲突然发病，不得已告假回乡。他在南归途中仍忧念国事，经过厦门时，得知福建省独立后还未召开省议会，便应绅民之请，致电福建都督孙道仁，请速行召开省议会。电文大意为：革命目的在扫除满清秕政，若一切仍旧，安用铁血为？并说：“民国新造，断非一二人专制可以成功。”<sup>⑩</sup>这表明丘逢甲的思想没有停留在排满的民族革命上面，而是继续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努力。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退位，丘逢甲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露出笑容。但当听到袁世凯代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又怅然若失，不安地说：“前途未可乐观也。”2月25日，丘逢甲在家乡逝世，临死时嘱咐亲人葬须南向，最后一次表达了他至死不渝的收复台湾的心愿。

①、⑨ 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②、④、⑪、⑬、⑮、⑰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

③、⑤ 江山洲：《丘仓海传》。

⑥、⑦、⑫、⑭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⑧、⑯ 丘琮：《姑怀录》。

⑩ 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





##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何 维 鼎

岭南各部越人很早就同中原华夏族政权建立了关系。不过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落后了一大截，直到战国末期还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各有“君长”的“种姓”（氏族）彼此攻杀不休，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长期依附于楚国。

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的秦军开始逾岭南进。由任嚣和赵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两个尉官率领的秦军，胜利开赴“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个郡。两位秦军将领随后在南海郡任职：任嚣为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而后者则成为岭南古代史上叱咤风云的第一人。

赵佗去龙川上任，在原来十分荒凉的鳌山、泷水之间筑起城池，实施较为有效的治理，受到郡尉任嚣的赞赏。当地至今还保留着有关这位首任县长的若干传说。

事过五年，秦始皇死去，二世继位。陈胜、吴广和项梁、刘邦相继起兵反抗暴秦。任嚣正要在岭南有所行动，可是病势转危，看看不济，只好火速召见赵佗，商议后事，并讲述了自己的意向：“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即中原，下同）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末了交给他一份遗书，让他代行郡尉职务。

赵佗凭着这份遗书，以新任郡尉的名义，命令横浦（大庾岭）、阳山（今阳山以西）、湟谿（今英德以南）三关将士扩建城墙，增兵设防，封锁前些时筑成的“新道”；向秦朝申请“女无夫家者三万人”，结果拨来一万五千，许配给南来多

年的士兵；以种种借口排斥秦朝原任各级官吏，安插自己的亲信；接着又把原日的任嚣城加以扩充，筑成后来所说的赵佗城（在今仓边路、北京路一带）。

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攻进帝都咸阳，秦朝灭亡了。不久，赵佗也不失时机地用武力合并了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这就是存在九十五年、定都番禺的南越国之始。

汉高祖刘邦对赵佗治越评价很高：“南海尉它（同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指境内的中原人民）以故不耗减，粤（同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他顶住朝中主战派的压力，“释佗不诛”，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方针。公元前一九六年（高祖十一年），刘邦派出客卿陆贾，携带赐给赵佗的绿绶金玺（王印）去番禺作友好访问，这是南北两地中断十二年之后的首次接触。

汉使陆贾从长安出发，转水路经灵渠下番禺，从西郊坭城（今广州东风一路西端）登岸，在城西的馆舍住宿。南越王赵佗出于慎重，拖了很久才接见这位使者。

汉使进王府拜会时，但见赵佗不戴王冠，不束官带，头上理个圆锥形发髻，两脚跷起，面露轻蔑的神色。陆贾有见于此，决意来个硬攻，先声夺人：“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

接着，他简单介绍了汉帝刘邦灭秦诛楚的功绩，又适时地回到本题上来：“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使一偏将十

万众临越，即（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接着，陆贾进一步指出，“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疆（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继而对汉越双方力量作了恰如其份的对比，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南越“譬如汉一郡”，反问他“王何乃比于汉！”经过反复权衡得失利弊，赵佗到底接受了陆贾送来的南越王印，算是臣服了汉皇朝。这样，汉朝对岭南地区也就实现了初步统一。

可是这个刚开了头的和平局面随后被继起当权的吕雉糟蹋了。吕氏反刘邦之道而行之，对南越实行禁运政策：禁止输出开发荒芜的岭南必不可少的“金铁田器”，对马牛羊也诸多限制，“予牡，毋予牝”，使之无法繁殖。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守约称臣的赵佗三次派大员上书“谢过”，请求收回禁令，可是连人也回不来。于是他于公元前一八三年（高后五年）自立为南武帝，来个“黄屋左纁”，发兵攻打长沙王封地（他认定事情是由长沙王进谗引起的），掠几个县。吕雉大怒，着即削除赵佗南越王籍，遣将来讨，双方在阳山关严阵以待。碰到天时暑湿，士卒多病倒，汉军后退布防……。吕雉尝到的苦果正是检验刘邦政策的有力反证。

公元前一七九年，汉文帝刘恒登位。他根据赵佗前不久提出的要求，撤回驻在长沙的一路汉军。又主动派人去真定修葺赵氏祖坟，岁时致祭，对赵佗的族兄弟也给予适当的安排。然后，他委任太中大夫陆贾为特使，带着皇帝的信件（著名的《赐南越王赵佗书》）重访番禺。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在承认“服领（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除去帝号，“通使如故”。其实赵佗也自知没有问鼎中原的力量，当他重见陆贾，知道汉朝政局归于稳定，又看了《赐南越王赵佗书》后，便表示愿意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

随后，赵佗发布文告，盛赞“汉皇帝贤天子”，下令国中“去帝制黄屋左纁”。他又复信给刘恒，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以示他是南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汉朝的臣子），检讨过去的越汉关系，重申他“不敢背先人”、“北面而臣事汉”的初衷，表示“改号不敢为帝矣”，并且开列礼单，献上白璧、翠鸟、犀牛角、紫贝、孔雀等一批珍品。

往后，虽然南越国还保持着半独立状态，但是赵佗毕生确实以越汉友好为首务。经历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他都没有忘记“遣使入朝请”，并且不定期地送去一些驯象、能言鸟（鸚鵡）、珊瑚树一类贡品；当然，中原的铁器农具、耕牛等也通过关市运到岭南。晚年，赵佗在番禺筑起一个“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晦（亩），复道回环，逶迤曲折”的“朝汉台”，每逢朔望（初一、十五）登临朝北遥拜，表示忠于汉室。

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国也长期坚持了秦汉的多项制度，例如郡县制、与郡县并存的同姓（赵）王侯制以及王国官制等等。推行这些制度，使岭南人民告别了无数君长各自为政的原始时期。

赵佗“和辑越众”的手段也相当高明。他击灭地方诸王，必按当地社会习惯进行治理，他“弃冠带”，穿越装，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善意吸收越族固有文化的表现……。由于处置得当，境内各族“相攻击之俗益止”。岭南地区也就日渐成为继楚而后的又一个民族大熔炉了。

赵佗在位六十九年，他的文治武功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而且有利于岭南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公元前一三七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赵佗逝世，岭南人民对他十分怀念。清代还散见于粤东各地的侯王庙、三君祠和大夫祠，寄托着后世岭南人民对这位立了殊勋的开拓者赵佗以及作出过贡献的首任郡尉任嚣、汉使陆贾的绵绵情意。

# 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

杨应彬

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也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正直官员。他的宦途坎坷，一生都很失意。他曾自题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差不多一辈子都在贬谪中过日子，其中两次最大的打击是被贬到广东，这就是八百九十年前，也就是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一〇九四年，他受到政治诬陷，贬谪到惠州；在惠州住了两年多以后，又被贬到海南儋州；一直到元符三年，即公元一一〇〇年才离开，在岭南先后居住了七个年头。

苏东坡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岭南的，但是这种打击并没有使他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思想，和长期养成的旷达乐观的性格，加上岭南人民出于对他文章道德的敬仰而给予他的关怀和照顾，使他克服了悲观沮丧的情绪。尽管处境困难，他晚年的生命并没有虚度，仍然发出了光辉，对岭南的开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苏东坡在岭南，有许多方面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在传播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他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热爱岭南的土地和人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和当地的官员、百姓相处得很好。他刚到惠州，就受到父老们成群结队的欢迎。惠州太守詹范，循州太守彦质，以及一些下级官吏，都对他很尊重，时常和他来往，并在经济上加以周济。他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就是生动的写照。有一次游博罗白水山回来，经过荔枝浦，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拿出了酒来款待他，邀请他在荔枝熟时再来作客，品尝佳果。他在白鹤峰居住的时候，和邻居翟逢亨秀才来往密切，还常常到附近林婆的小酒店中喝酒。有时没带钱，就赊个帐，大家相熟得已经完全成为和睦友好的邻里了。

到了海南，儋州军使张中起初安排他在官舍居住，不料被政敌章惇的爪牙知道了，派人把他赶了出去，他只好在城南低洼的地方买了块地来建造房子。儋州的十几个读书人得知这个消息，都来帮助他挑土运砖，很快把房子盖了起来。海南人民还在生活上给他帮助，经常给他送来一些吃的东西；一位黎族老人送给他一块用木棉纺织的吉贝布御寒。在海南，他除了和诸生、父老们交游外，还常到田间和农夫、农妇们谈心。这些人很多是黎族同胞。所谓“东行策杖寻黎老”，“半醒半醉问诸黎”，反映了他和黎胞交游的广泛。他和他们“醉笑一欢同”，亲切地打成一片；甚至说“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把海南作为他的第一故乡，而且表示要“化为黎母民”，成为黎族人民的一员。这种思想，对当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是很难得的。

苏轼对岭南的山川也非常热爱。他“不辞长作岭南人”，认为“海南万里真吾乡”，“兹游奇绝冠平生”，写了不少诗词来歌颂岭南山川的秀美。罗浮朝日，博罗白水山胜迹，琼州海峡风光，以至曲江的南华寺、清远的峡山寺、广州白云山的蒲涧寺等，都被他写得非常可爱。如果没有一腔热爱祖国、热爱岭南山河的深情是写不出来的。

第二，为人民做好事。苏东坡本来就有关心人民的思想，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他修水利，筑堤防，减免赋税，赈灾济民，推广先进农具，奖励农业生产，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来到岭南，他已经被罢了官，无职无权了，但岭南人民对他的关怀，却使他感奋起来，更加努力地给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路过广州，见到居民食用咸水，就给太守王敏仲写信，建议用竹筒引白云山蒲涧水入城，以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减少饮水不卫生所带来的疾病传染。他游博罗香积寺，看到寺旁溪水长流，就建议县令林抃在那里安装水力碓磨来舂米磨面。他捐出自己的犀带，又发动弟妇把朝廷赏赐的金钱捐献出来，帮助惠州人民修建了东、西两座新桥。大桥落成的时候，他看到人们扶老携幼、痛饮狂欢的样子，心里也十分高兴，还提醒太守对大桥要注意经常维修，以免损坏。

苏轼在海南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也尽可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主要是传播知识文化。苏东坡是一代文豪，他的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不论对惠州还是儋州以致影响所及对整个广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的海南，文化更为落后。苏东坡到达儋州不久，曾出游城东的学舍，见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因为发不出薪水，老师都不来上课了。他十分感慨，感到自己有责任给这里的文化教育出一点力。凭着他的声誉，很快就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求学。其中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黎子明、符林、王霄等。对这些求学者，苏东坡都悉心指点，使他们在学问上日益增进。有一次，苏东坡和军使张中一起去城东南访问黎子云兄弟，见到那里环境优美，但茅房却破旧了，大家商量出钱为苏东坡建屋，他也欣然同意，并取名为“载酒堂”。从此，这个地方就成为苏东坡经常出入，和朋友、后学们聚会、论学的地方。在他的指点下，黎子云等人后来都成了饱学之士。姜唐佐在苏东坡北归三年后便举了乡贡，王霄等人也分别举了明经和文学。又过了几年（大观三年，公元一一〇九年），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其后历代应举登科的人接踵而出，还产生了邱濬、海瑞这样的名人。这同苏轼对当地文化的促进是有关的。《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就是指这些事实而言。

第三，创作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苏轼一生以文字惹祸，到了岭南，他本来决心“不著一行书”，“扫除习气不吟诗”了，但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激情使他又提起笔来。岭南七年，他写了三百多首诗词和一批散文，还完成了《书传》、《易传》和《论语说》三部学术著作，一部史料笔记《志林》，创作数量是相当丰富的。他晚年的诗歌，自有其特殊的风格和造诣，应该如何评价，专家们可以讨论，但是，可以肯定在东

坡一生最艰苦的日子里写出的东西，至少大部分是有思想内容、艺术价值的。例如他的《荔枝叹》，便是他少数有高度思想性的诗篇之一；其他一些歌颂岭南山川，歌颂人民特别是黎族人民的诗篇，也是脍炙人口的。

岭南七年，仅仅是苏轼生命的一小部分，但是研究苏轼这段历史，看看他在垂老投荒、处境艰危情况下的思想和实践，这对于全面评价苏轼，全面总结他的一生及其思想和创作特点，更好地批判继承这位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古典作家的精神财富，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要同苏轼其他时期的生活和思想，同他在不同时期所作的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作品，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是我们党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的历史，产生了许多灿烂的古代文化，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去研究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总结古代杰出人物的历史贡献及其经验教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研究古代作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繁荣和加快今天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象苏轼这样一位有卓越才华、又具有一定民主性的作家，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我们必须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他在彼时彼地的一切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都应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对其有积极作用的部分都应加以继承和发扬。我们对于历史人物所作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播、祖国统一的努力，都必须给予正确的评价，肯定其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积极作用。当然，苏东坡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他的生平行事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消极思想，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分析。但是指出其局限性是为了阐述其不足或失误的因由，而不是用今天的政治标准或艺术标准苛求于前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的广东是历史的广东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广东是由原来居住在岭南的各族人民和中原移居来的人民共同努力开发出来的。这种并肩战斗的感人事迹，直到今天还到处存在。苏轼就是为岭南开发特别是传播中原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之一。对这样的人物及他们的历史地位，应成为我们研究、宣传的课题，以教育子孙后代。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苏轼研究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刊载时个别地方有改动）

# 如何评价苏轼

王季思

学术界对苏轼晚年在岭南的思想倾向问题，争论较多。他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还是道、佛？是消极出世，还是积极入世？对个人前途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想这是否存在一个问题，即关于苏轼世界观的属性以及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的问题。不论儒、释、道，它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为维护这个社会的封建秩序起作用的，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的似乎积极入世，有的好象消极出世，但如果看不到它们的共同性质，看不到它们的可以互相转化，就把问题片面化了。

明末清初，五台山有个老法师，顺治皇帝请他的徒弟去讲经。这徒弟回来对他说，我这次讲得连皇帝都想出家了，下一次再讲，我可以劝化他到这里来做和尚。”老法师一听，痛骂他一顿说：“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我们佛门是多一个做和尚的皇帝好，还是多一个做皇帝的护法神好？”我们看看，这个老法师对政治的看法多么高明，他的这番话，究竟是入世法还是出世法？很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道士、和尚，后来做了大官，在政治上起很大的作用。唐代的魏征、李泌，原来都是道士，后来成为一代名臣。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道衍，原来都是和尚，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至于原来在朝廷做大官在政治形势转变时出家做和尚，做道士的，那就更多了。我们能因为他们做过道士、和尚，就说他们的主导思想是道、佛，因为他们做过大官，就说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吗？实际上，这三种思想体系，都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们的表现虽有不同，归根到底是指导人们处理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君、民就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苏轼在朝时要写一些有补于国的文章，在野时要做一些有利于民的好事，这国、民也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国家和人民。苏轼死时，他的学生写了一篇祭文，说：“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这忠义就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诚、正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也决不相信有什么玉皇大帝、土地爷爷能看到我们的心事。我们的科学世界观——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才有可能产生并继续发展的，它不是任何封建历史时期所可能出现，也不是任何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所可能掌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分清楚，才不致混淆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世界观的界限，才不致把某些历史人物的进步作用夸大到超越他们历史阶段的地步，引人向后看。

至于他们在生活中文艺创作中的表现，有些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有效经验加以处理的，例如，苏轼在惠州看到香积寺外的溪水，建议在这里利用水力，制造水磨水碓，以有利于生产；看到那些向皇帝溜须拍马的人，把荔枝用快马送到京师，向皇帝“争新买宠”，害民害国，发出慨叹、谴责，这是属于朴素性质的唯物史观，局部地突破了他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唯心史观，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才不致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把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积极作用都看得一无是处。

现在再谈谈苏轼的生活态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苏轼在贬官岭南时，曾在雷州碰到他弟弟子由，他们在路边买了两碗馄饨之类的面食吃。苏轼两三筷就吃光了，子由吃了一筷，老半天吞咽不下去。苏轼笑着对他说：“子由啊，你还要品品它的滋味吗？”这故事传到苏轼的学生那里，他们说：“这是先生‘饮酒但饮湿’的法子。”“饮酒但饮湿”，是苏轼在黄州写的一句诗，意思是，只要有水份的，就可以当酒喝。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比较随和的。可苏轼对自己的诗文创作，也有一句话，是要“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不论写诗或写文，要达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就必须认真对待，毫不马虎。对生活的随和和对创作的认真，说明苏轼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他在生活上千方百计要求达到自己的意愿，而在创作上却随便应付，任意掺水份，他就不可能在一生里留给我们那么多光辉的诗篇和散文。但是，苏轼在生活上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随和的，东坡在定州，在惠州，都造过好酒，吃的东坡肉、戴的东坡巾，在北宋流行一时，有的还流传到今天。可见在条件许可时，他也讲究点吃和穿的。这样理解，才不至把苏轼对生活的态度片面化，绝对化。对创作，他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求“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他晚年说自己写文章“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就是另外一种写作态度。这态度更多地表现在他晚年的书札、杂文里。如果只看到一方面，同样会把问题片面化、绝对化。至于他在岭南对人生的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是乐观还是悲观，我同意一位海南同志的发言，即苏轼初到岭南，尤其是到海南的时候，对生活是很不适应的，因此产生过悲观的情绪，消极的态度。后来，生活上慢慢适应了，他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也跟着转变了。也就是说它的变化发展有一个过程，在生活上是由不适应到适应，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是由消极到积极，由悲观到乐观。苏轼贬官以前，在京师做大官，过的是华堂玉食的生活。到了惠州，还有人帮助他盖新房，到了海南就只能住自己搭盖的草棚子了。在惠州，还可以五天十天吃到一餐黄鸡粥、花猪肉，到海南，就只能餐餐啃芋头，喝白开水，在生活上自然要有个适应过程。然而，他到岭南以前，在人生道路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尝过了贬谪的滋味，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顺应自然，佛家的随缘自足，早就在他的生活中有所表现。因此，他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我看了美国朋友唐凯林女士介绍国外研究苏轼情况的资料，比较明显地看出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一般说，他们比较重视作家的生活和作品的风格，我们比较偏重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对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是应该重视的，但作家的创作总是

他自己的生括以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反映，不深入研究他的个人生括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很难判断他的创作成就的。用我国传统的说法就是“知人论世”。苏轼在北宋时期所以特别受到我们的重视，是因为他在诗词、散文以及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不谈他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对后来人的影响，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今天要讨论苏轼的创作成就，既不能离开他的思想内容谈艺术，也不能离开他的艺术成就谈思想。这里有三种情况想提供同志们参考。苏轼到岭南后的作品，有些是思想艺术结合得很好，超过了他过去的成就的，象《荔枝叹》、《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诗，以及他过岭后写的给参寥子、谢民师的书札。有些表现了他新的思想认识，艺术上表达得并不好，如他的部分和陶诗。他过岭后，很少写词，写得好的更少，可以说，从思想艺术两方面看，都比他以前的词作退步了。这样结合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从思想、艺术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这对我们今天的诗词创作怎样力求思想境界的清新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最后想谈谈深入浅出的问题。研究苏轼，要从他的具体作品，一篇篇、一首首，深入钻研入手，弄清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其中有些影响深远的作品更要反复深入地钻研。有些前人校勘、考证的方法，我们也要会运用，才能弄清真相，还它本来的历史面目。但我们的深入，决不能越钻越深，入而不出，因此，还必须找出他作品里一些表现他共同的思想倾向、艺术特征，以及体现他的创作方法、创作道路的地方，提到我们今天的理论高度，加以概括说明，经过这样深入分析的高度概括，才不至流于一般化的空谈。

（本文是作者在广东惠州市“苏轼讨论会”上的发言）

書海酌蠡

## 关于《碧梧苍石图》题词

官桂铨

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中，据明注硃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八，收入元人题《碧梧苍石图》“清平调”词十六首。1983年11月，我在故宫见到《碧梧苍石图》真迹，录下画中可见之题词。今将其中可资补正的材料略述于下：

（一）此图为元人陆行直作，水墨立轴，画两株梧桐与一块顽石，故名《碧梧苍石图》。

（二）图上方有明代刘櫓（綬轩）跋语：“……《碧梧苍石》一幅，姑苏汾湖天居士陆行直甫之作。行直有家妓名卿卿者，以才色见称，友人张叔夏为作古词赠之。所谓多情，因为卿卿是也。后二十一载，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归作《碧梧苍石》。复与其姪人冶仙话旧。因记忆叔夏之赠，则张公、卿卿皆杳隔尘世矣。故弁书张词于卷端，当时诸公仍踵而和之，其辞旨抑扬凄惋，似离乎悼惜无涯之意，然自至泮到今又百有余年矣……”说明作画的经过颇详。

（三）由图中题词得知：陆留字冶仙，曹方父字仲达，郝贞字元卿。



#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吴定宇

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上，我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内地影响到香港，香港的文艺界也就此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年来一些专题论文中，关于这两次论争，只提到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对香港文艺界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为了反映出当年论争的全貌，本文打算就香港地区的讨论略加介绍和评述。

## 一、讨论的经过

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文艺阵地》上进行的。《文艺阵地》是茅盾到香港后主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艺半月刊，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创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茅盾编完第二卷六期之后，动身去新疆，便由楼适夷接编。这个刊物一直出到第三卷四期，编辑工作才转移到上海。《文艺阵地》创刊号发表了周行的《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的文章，指出：“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并提出“为大众的抗战文艺的创造而斗争”的口号。从创刊号到第三卷四期，《文艺阵地》陆续刊登了二十一篇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专论或部分内容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文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论新阶段》（即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提出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给正在进行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实践，指明了方向。继延安和重庆文艺界之后，香港文艺界也在翌年对民族形式问题展开学习和讨论。从一

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起，肖乾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了齐同从内地寄来的《大众文谈》。这是目前所知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同年九月肖乾赴欧，杨刚接编《文艺副刊》。十月十九日，《文艺副刊》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邀请香港文艺界许地山、刘思慕、宗珏、林焕平、黄鼎、黄文俞、林蒲、郁风等二十一人开座谈会，发起讨论“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袁水拍因事未到会，送来了书面发言稿。十月二十五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座谈会记录全文。接着，从十一月一日起，该报连续四天刊登启事，公开征求参与讨论的文章。征稿的范围是：“其一：文艺之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其二：新文艺外来影响的评价和清算。”①

经过一番酝酿集稿，从十二月十日开始，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整版篇幅，一连发了五次专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相继发表了黄药眠、杜埃、文俞、宗珏、黄绳等人所写的八篇论文。十二月十五日，编者刊出《结束讨论启事》。从此，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没再刊登这方面的文章了。

一九四〇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华石峰在香港唯一大型文学月刊《时代文学》（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创刊号上发表论文《论中国文学运动的新现实和新任务》。作者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具体的阐发，对亟待解决的民族形式问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至此，香港文艺界才真正结束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二、对实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探讨

文艺大众化讨论和民族形式讨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同点，但它们探讨的问题，却不尽相同。香港文艺界对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的：

首先是对文艺大众化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穆木天认为，“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工作，是我们的整个的民族革命工作中的一环”，通过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去完成起来抗战建国中的民众教育。”<sup>②</sup>对此，劳难也有同感：“文艺能为大众所接受，那才算是尽了文艺的武器的作用。”<sup>③</sup>正因为这样，所以茅盾才强调，“大众化是当前最大的任务。”<sup>④</sup>在这个问题上，讨论者的看法比较统一。

其次是怎样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许多讨论者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途径有三条：第一，作家应当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周行说，要使文艺真正成为大众的东西，“必须文艺真正生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而“作家们深入到各阶层的社会当中，”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sup>⑤</sup>以群批评了作家对生活的旁观态度，指出作家只有放弃“参观者”或“访问者”的身份，才能“和广大的群众溶合成一片；在作品里，能更进一层，把握住大众生活底核心。”<sup>⑥</sup>第二，展开广泛的通讯员运动。周行认为“这一工作，与创造大众的抗战文艺的工作有不可分的联系。”<sup>⑦</sup>第三，利用旧形式，表现抗战生活的新内容。所谓旧形式，并不是指一切的旧有文学形式，穆木天把旧形式分成两种：一种是“现在散在民间的，而且还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的，民间的口碑式的文艺形式”，包括鼓词、说书、道情、大鼓书、花鼓戏、花灯戏、蹦蹦戏、京戏、民谣、秧歌等等；另一种是“庙堂上边的文艺，是士大夫所专有的。”他主张运用前一种旧形式去“旧瓶装新酒”，反对“作回文诗，对对子，填词作赋。”<sup>⑧</sup>大多数讨论者认为，利用旧形式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杜埃批驳了对利用旧形式来表现抗战新内容的种种糊涂观点，肯定地说，“旧形式载新内容这课题，也就是我国自九·一八后所指出的大众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发展。”<sup>⑨</sup>但是，对这个问题，周文却有不同的看法。周文觉得“单单是‘旧形式的利用’这口号，是很容易引起偏颇、误解”，而且“文学大众化这口号已提出多年了，但实际能够做到的实在有限

得很”，因此“我看只有方言文学，地方文学的提出，才能实际得到解决。”<sup>⑩</sup>两种看法各有一定的道理，却又都带有几分片面性。在这个问题上，茅盾的见解最深刻，最全面。茅盾赞成利用旧形式，“要完成大众化，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题一脚踢开完全不理！”<sup>⑪</sup>接着茅盾又透辟地指出，“‘旧瓶装新酒’并不是‘利用’旧形式的全部意义”。所谓“利用”包含了对旧形式“翻旧出新”和“牵新合旧”两方面的内容，其最高目标，乃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民族的新的文艺形式。”<sup>⑫</sup>这些观点，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再次是如何利用和改革旧形式的问题。茅盾提出了总的原则“应该是研究旧形式究竟可以被利用到如何程度，应该是研究并实验如何翻旧出新，应该是站在赞成的立场上来批评那些试验的成绩”。<sup>⑬</sup>黄绳批评“新文艺”在语言上脱离大众的倾向，强调“批判地采纳着大众的词汇，语调，韵律，语句的组织等等”，塑造“时代英雄”和注意“故事的趣味性”，<sup>⑭</sup>点出了实现文艺大众化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对于旧形式的具体利用和改革，不少讨论者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丁玲根据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改革“比较一切地方戏都不大众化，却普遍化”的平剧（京剧）的实践，写出《略谈改良平剧》，对京剧剧本的创作、服装、脸谱、布景、音乐、动作等方面的革新，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以“发扬其优良，扬弃其缺点。”<sup>⑮</sup>周文在考察川戏、故事唱本等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以及说白等表演特点之后，倡导编演以反映救亡活动的“新戏”来改良川戏；“大量的但决不苟且的制作唱本”<sup>⑯</sup>来创建与民众密切的新的文学样式。这些探索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深入，是极为有益的。

## 三、对建立新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香港文艺界是从建立什么样的民族文艺的议题而展开的。杨刚、宗珏、刘思慕、袁水拍等人就民族文艺的性质，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民族文艺，既不同于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御用文人提出的“民族主义文艺”，也与法西斯国家为了向外侵略而标榜的“民族文艺”有根本的区别。宗珏指出，民族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然产生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民族文学。

而在抗战的阶段上，以抗日为内容的民族形式，也必然成为这一文学运动的主流。”<sup>①</sup>杜埃强调民族文学必须以民族生活为创作源泉，作家应当“注意到民族新性格的描写”，<sup>②</sup>这并不意味着割断与国际主义文学的联系。杜埃说得好：“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内容，是反侵略反历史黑暗的民族革命内容，它不限于一个民族，它是代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因此它是国际主义的内容，而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民族的。”<sup>③</sup>换言之，我们的民族文艺，在形式上具有我们民族习性和作风，在内容上又是国际主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的民族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它与旧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讨论者认为，建立新的民族形式，决不是固囿在传统的旧形式里面，单纯运用旧的民间形式去表达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因此，讨论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向林冰把“旧瓶装新酒”的作法，当成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唯一途径，和把民间形式当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调。他们主张作家必须深入群众，亲近群众，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习惯、举动、态度、感情、心理活动、个性和语言特征等，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民族形式的文艺。但是，他们没有否定“旧瓶装新酒”的合理内核，正如宗珏所说：“旧形式中底某些优秀的传统，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之民族的特性。”<sup>④</sup>文俞也说：“如果忽略了‘旧瓶装新酒’的意义和作用，民族形式的创造至少会数典而忘其祖。”<sup>⑤</sup>

既然明确了改革旧形式对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又怎样去批判地利用它呢？讨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最多，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必须深刻了解传统艺术形式的表现方法特点，以及它的规律性和本质，明白它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坏，改造地吸收其有用成分，使之成为新的民族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扬弃那些陈旧腐朽落后的质素。这样，才能不受旧形式的束缚，而进一步自由创造崭新的民族形式。

第二，处理好民间艺术形式的地方性与共同性的关系。旧形式的民间文艺，如地方戏、大鼓词、说书、道情、秧歌、山歌、民谣，无不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全民族的共通的成分却是不多的。各地的民间艺术，不但在格式上不同，其情调风格也各异。因此，文俞指出：“地方形式的运用，是民族形式创造的一支脉，也是一支柱。”<sup>⑥</sup>

这就是说不能把它当作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主流。适当地把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民间艺术形式运用到作品里来，是必要的，但不能机械地照搬，新的民族形式不会复归到旧有的地方民间文艺形式中去。杜埃对此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民族形式的创造，是找寻各地方特色的东西，在这些各个特色之间抽出其最足以代表的特征，有着全民族共通性的东西，加以艺术的概括和综合，提炼和净化。”<sup>⑦</sup>透彻地阐明了把地方民间艺术形式，转化为全民族的新艺术形式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合理使用方言土语。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齐同为代表。齐同说：“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或利用旧形式的时候，是要把方言看做第一重要的，”强调“山歌、民歌、故事和传说，是真实的民间方言文学，利用旧形式便要吸收多量的方言质素。”齐同的观点不无偏颇之处。新的民族形式，吸收一些经过提炼和加工的方言，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大量的方言土语原封不动地塞进民族文艺作品，就会失去许多不懂得这种方言土语的读者。而且，齐同还认为“旧的文字，几乎是完全失掉生命的文字，那仅有的气息也只是保留在读书人的手里”，<sup>⑧</sup>主张用字母代替汉字。中国文字最后终要改为拼音文字，是毫无疑问的，但马上要用字母来取代汉字，就未免操之过急。另一种则是大多数讨论者的意见。他们也主张向大众学习语言，主张批判地运用方言土语，使作品带有一种地方色彩，使民族特色能从地方色彩里表现出来。不过，恰如老作家许地山所说：“我们学民众口气写东西，要避免专抄他们的话，要把那些话加以提炼，提高，一面使民众懂，一面提高他们的程度。”<sup>⑨</sup>黄绳的看法也颇有见地，他反对“滥用方言土语，不承认会有所谓‘土话文艺’。民族形式中的语言，要是文艺语言，而不是未加工的大众语言。”<sup>⑩</sup>他还反对使用旧形式中如“闭月羞花之貌”之类的死的语言，反对袭用民间文艺中诸如“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杏眼娥眉”、“盈盈秋水”、“豹头环眼”、“燕颌虎须”、“樱桃小口”那一套僵硬的“反创造性的”语言。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在大多数讨论者看来，建立新的民族形式，决不是为了保存国粹，清楚地认识到外国文学形式的借鉴作用。华石峰主张“中华民族新文化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能够表现新内容的外

国形式。”<sup>⑦</sup>黄绳强调吸取欧洲和日本的词汇、语法和句式，加以有机的溶化，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杜埃也指出：“外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学习了却一定要在自己民族的具体环境下融化，灵活的运用起来，才能有助于建设我们这年幼的新文学。”<sup>⑧</sup>他们认为，外来的形式只有经过消化作用，变成构成自己部分的营养，才能克服和纠正“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欧化倾向。

一些讨论者还探讨了民族形式的艺术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许予指出：“大众文艺通俗文艺决不应该是粗糙浅薄的东西。相反，它是同样需要质的提高。”<sup>⑨</sup>要求作家忠实地、严肃地去写作。黄药眠以白居易、柳永的作品为例，说明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也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有力地驳斥了民族形式会降低文学质量的错误论调。

#### 四、讨论的意义

这两次讨论，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观点的学习和宣传的活动。不少讨论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研究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现状。也有一些讨论文章，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进行了具体阐发。有的讨论者，例如宗珏，强调自己的意见“是从毛泽东先生之‘洋八股必须废止’这一提示出发的”，<sup>⑩</sup>多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原话。还有些讨论文章，对延安的文艺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不啻给沉闷的香港，吹进一股来自革命圣地的清新空气。从而扩大了党在香港和海外的影响。

同时，这两次讨论都分别触及到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的实质。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认识，加深了对抗战与文艺大众化运动、生活与创作、内容与形式、新的民族形式与旧形式、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与外来形式、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普遍性与地方性、民众生活与民族形式的创造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明确了艺术家在抗战阶段的新任务和努力的方向，大大推动了我国新文学运动向前发展。

一些讨论文章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对文学创作中的欧化倾向和革命文学脱离群众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不言而喻，实现文艺大众化和创建新的民

族形式，也就是对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抗战的现实服务的途径的有益探索。尽管这两次讨论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引起了艺术家在思想上的重视，显示了香港文艺界一种可贵的努力。过去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民间文艺形式，得到了批判地继承和广泛的采用；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文学与群众的距离。

这两次讨论，既丰富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革命文艺理论，同时对抗战文学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大公报·文化副刊》、《文艺阵地》和《时代文学》等香港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老舍的新编京剧《忠烈图》、丰子恺作词的歌曲《我们四百兆人》、姚雪垠脍炙人口的小说《差半车麦秸》、周文的新童话《长期磕头的故事》和他收集的《四川民歌》、欧阳山的剧本《敌人》、田间的街头诗《小鬼》、臧克家的叙事诗《敲》等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大众化作品和民族文艺作品。杜埃、林焕平、李南棗、黄绳、袁水柏等一批作家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形成了香港文艺界的“核心队伍。”<sup>⑪</sup>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两次讨论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在讨论中虽然谈到了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学遗产、作家的主观动机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但未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评价过低，存在着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些讨论者尽管也强调文艺要为大众服务，但在他们心目中，群众仍然是落后的。有的讨论者坚持文艺大众化运动“主要地，是以落后的工农大众做为对象”<sup>⑫</sup>的观点。还有的讨论者把某些“民族形式”作品一时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现象，归咎于“我们群众大部分是在愚蒙的状态中。”<sup>⑬</sup>这表明，轻视群众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这两次讨论也同内地的讨论一样，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奠定了部分基础。

附记：

本文承蒙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饶鸿竞副教授提供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指导意见，谨在此表示感谢。

①《展开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香港《大公

报>1939年11月1日。

②⑧⑩穆木天：《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  
《文艺阵地》2卷8期。

③劳难：《论“文艺兵”的“战术”》，《文艺阵地》  
1卷9期。

④⑪⑬茅盾：《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文  
艺阵地》1卷4期。

⑤⑦周行：《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  
动》，《文艺阵地》创刊号。

⑥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  
1卷2期。

⑨杜埃：《旧形式运用问题》，《文艺阵地》  
1卷2期。

⑭⑯周文：《唱本·地方文学》，《文艺阵地》  
1卷6期。

⑲茅盾：《利用旧形式的两个意义》，《文艺  
阵地》1卷4期。

⑭黄绳：《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二三意见》，《文  
艺阵地》2卷11期。

⑮丁玲：《略谈改良平剧》，《文艺阵地》2卷

4期。

⑰⑱宗珏：《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  
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3日。

⑲⑳㉑㉒杜埃：《民族形式创造诸问题》，香  
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2日。

㉑㉒㉓文俞：《“旧瓶装新酒”》，香港《大公  
报》1939年12月12日。

㉔齐同：《大众文谈》，香港《大公报》1939年  
5月18日。

㉕㉖《〈文艺〉鲁迅纪念座谈会记录》，香港  
《大公报》1939年10月25日。

㉗黄绳：《民族形式和语言问题》，香港《大公  
报》1939年12月15日。

㉘华石峰：《论中国文学运动的新现实和新  
任务》，《时代文学》1941年1期。

㉙许予：《质的提高》，香港《大公报》1939年  
12月10日。

㉚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新文  
学史料》1984年1期。



# 略论教育投资负担

黄 静 波

## (一)

教育投资负担问题源于把教育的耗费作为一种投资，因此，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须从教育投资的效益进行分析。教育投资的效益可以分为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和教育投资的个人效益，前者是指通过教育活动为社会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及其劳动者劳动力质量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后者是指劳动者因受教育后提高劳动能力而给个人带来的收入增加。既然社会和个人都能从教育投资中获益，那么社会和个人都要分担一定的教育投资。

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负担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原因在于教育投资的个人效益始终存在并且最为直接和明显。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目的在于增强个人的劳动能力及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目标的两个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剥削者不参加实际生产劳动，注重的仅仅是社会地位；而劳动者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改变受剥削的经济状况和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不得不注重劳动能力的增强。但劳动者增强劳动能力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不断地为剥削者占有，他们所进行教育投资而形成的劳动能力提高，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巨大源泉，相比之下，他们自身所获甚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进行教育投资也是为了增强个人的劳动能力，但是，这部分教育投资使劳动力质量提高而带来的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再被少数人占有，而是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成果，依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也相应增加。

劳动者个人负担的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总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95页）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劳动者个人必要的教育投资。因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必须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教育和训练在这里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者必须在其工资收入中，支出相应的教育投资来获得一定的教育。这种个人负担的教育投资占个人所需教育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在不同社会制度所推行的教育政策之下，是不尽相同的，而且还要受个人及家庭经济负担能力的制约。一个人一生所需的教育投资是十分巨大的，并非任何人都能承担，所以，在以个人负担教育投资为主的情况下，就学

者多是富家子弟便不足为怪了。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的出现，部分地将个人负担的教育投资转为政府或社团负担，教育的受益面随之扩大了。虽然现在教育投资已有向以社会负担为主发展的趋势，但在实施中仍不可能完全取代个人进行教育投资，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无任何国家可以完全负担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投资，纵使是在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情况下，个人仍需负担或多或少的家庭教育费用、个人自学费用和正规教育（学校教育）过程中的补充费用，例如花费于文具、书本资料、为就学购置交通工具和租用房屋……等等。这些个人付出的教育投资对于收入不高的人们仍然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常常构成部分人失学或节衣缩食为求学的重要原因。

劳动者个人负担部分教育投资，对教育的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可以聚集起大量分散的财力，扩大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总量，相对减轻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对处于财政困难的国家，个人负担教育投资的作用尤不可忽视。

其次，个人负担部分教育投资有助于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个人支出教育投资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劳动者个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因而个人十分关心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将采取各种措施影响和干预教育投资的使用。同时，个人对于社会上劳动力需求的信息反应十分敏感，自动调节着使个人负担的这些教育投资用于“节骨眼”上。

最后，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是个人学习积极性的表现，它刺激了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增大，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国民智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必须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负担教育投资的作用和地位确是大大下降了，更不可能代表教育投资的未来趋势。然而，它的辅助作用仍不可抹煞。不切实际地撇开这一形式，把过重的教育投资负担统统加在国家财政上面，在现阶段是不可取的。目前，少量自费学校的兴起，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教育投资的积极作用的形式之一。

## （二）

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社会团体）进行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负担形式发展的新阶段。这种负担形式植根于社会分工日渐发达和新兴部门、学科层出不穷的现代生产之中。因为：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所需的教育投资不断增加，个人所能承担的教育投资是有限的，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个人进行教育投资受到生产行业、就业职位的限制，无法适应新兴学科、新技术工艺的发展和推广，尤其是进行科学探索、新技术工艺推广这类“风险投资”，个人无力承担，且无投资兴趣，但却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而必须打破个人的局限，从更大的范围来安排教育投资。

第三，劳动者（及劳动力后备军）总是处于或附属于一定的生产部门或社会组织之中，但无论教育投资的收益归于哪一个生产部门或社会组织，社会都是受益者。社会进行教育投资弥补了个人教育投资的不足，又能取得相应收益，因此这一形式迅速发展起

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个人进行教育投资。

社会负担的教育投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和“第三者”投资。这里的“第三者”，是区别于政府和个人的意义而言，包括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社队）等等。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第三者”（如产业部门）一般宁愿付出一定代价使用已受过相当教育的劳动者，而不愿去从事对劳动者的基础教育。因为，使用受过相当教育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较之使用未受足够教育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之余额，是不费成本或成本很小（如增加若干工资，但不能超过对劳动者进行基础教育的投资）就可以取得的收益；而对劳动者进行基础教育的投资，非但不能获得投资的全部收益，而且劳动力流动将进一步致使应有的教育投资收益无偿转让出去，这是由教育投资收益的间接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决定的。这点，在私有制企业中尤为明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由于两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企业（不论全民还是集体）还必须以商品的形式向全社会交换，独立成本核算仍是调节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杠杆，国家、企业之间的利益仍存在某些差别，因此在教育投资问题上仍存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某些矛盾，处理得不好，仍会成为影响企业教育投资的积极性的因素。鉴于这种状况，一般情况下，“第三者”从部门企业直接利益出发，考虑到增强本部门企业生存、发展、竞争所需具备的条件，往往对职工教育、成人教育、技术培训、进修等基础教育之后的一些教育阶段（或形式）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首先，部门企业需要的是专门人才和专门劳动力，而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往往只具有基本的知识，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专门知识。从学校出来，到能够适应工作，需要相当一段实践时间，这是教育迟效性的表现之一。为使劳动者更快适应工作要求，减轻教育迟效性的影响，需要进行一定的专门训练，使之熟悉所从事的职业。

其次，当今科技发展迅速，生产应用的知识更新快，职业培训、终身教育、进修等方式是使得劳动者不断地适应技术更新，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增加的直接途径。

第三，劳动者在进入就业岗位之前已经受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相当于一种教育的“边际投资”，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当一个技术人员或操作工人对某一部分知识和技术不懂或不熟练，在生产应用上发生困难，那么，解决这一问题——掌握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就成为关键的一环，而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再教育投资。

第四，劳动者就业后，具有相对稳定性，劳动力流动毕竟是少数。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预期大多归于本部门企业。

第五，即使发生劳动力流动，从总体看，部门企业因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增加一般大于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教育投资收益减少，并可以在使用受过相当教育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收益（即上述不费成本或费本很少的收益）中得到适当的补偿，以利弊相权衡，便可见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蓬勃兴起之必然了。

“第三者”投资的积极性，一般情况下，会受某些条件的制约，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国家对人才分配制度、技术更新的快慢、企业收益分配的自主权等均会影响企业对教育投



资的积极性。如一些企业享有大学生分配名额较多，则无须自行投资，一些小企业和社队企业，无法得到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只好自己投资培养；一些企业技术更新缓慢，对劳动者技术知识更新的要求不甚迫切，也影响教育投资积极性。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体制改革的进行，光靠行政命令的手段，指令企业加大教育投资并不是根本办法。只有使企业的教育投资和企业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才是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根本办法。

个人、“第三者”进行教育投资的作用虽然不可低估，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人才培养、劳动力训练也日益社会化了，时至今日，政府已成为教育投资的最主要负担者，并且有着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国外经济学家统计80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其中有90%的国家把发展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许多国家教育投资增长速度已接近或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世界范围看，这一趋势已相当明显，试见下表：

世界教育公共支出估计

	教育公共支出(百万美元)				教育支出 年增长 %	国民产 值年增 长%	教育公共支出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				平均每个居民的 公共教育支出 (美元)			
	1965	1970	1975	1980			1965— 1977	1965— 1977	1965	1970	1975	1980	1965	1970
世界总计①	95,765	159,540	331,759	611,164	12.6	11.1	4.8	5.4	5.7	5.7	38	57	109	183
发达国家	87,993	146,983	294,526	531,271	12.2	10.8	5.1	5.7	6.0	6.1	86	137	263	457
发展中国家②	7,772	12,557	37,233	79,893	16.5	13.2	2.9	3.3	3.9	4.0	5	7	19	37

注：①② 不包括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黎巴嫩、蒙古。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统计年鉴》(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0) 和《1983年统计年鉴》。

如表所示，1965—1977年间，教育公共支出年增长率均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其中又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幅度为最大。从教育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看，1980年与1970年比较，发达国家从5.6%提高到6.1%，而发展中国家从3.3%提高到4%，增长幅度也大于发达国家，呈现出追赶发达国家的趋势。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和进程不一，是它们之间教育投资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既然这种差距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也可以在书写未来历史的过程中加以改变。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比重迅速增加，说明教育投资并非被物质生产死死限制而一成不变，教育投资所占比重的大小，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决于决策者对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

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提高国民智力水平，增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并且进行教育投资的宏观调节，既调节着国民收入在物质生产、教育投资、人民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也调节着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宏观调节中，政府主要致力于对全体社会成员普及一定程度的教育，使之达到社会生产对劳动者要求的最低限度以

上的智力水平。同时，政府为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要培养大批尖端的、专门的人才，要进行一定的教育“风险投资”，这与个人、“第三者”负担教育投资的任务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教育投资结构上往往表现为这样的情况，政府和个人都重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第三者”则重在进行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方面的投资，政府同时又还要负担尖端人才和专门人才培养方面的教育“风险投资”。当然，相互交叉是经常地和大量地存在的。政府投资于教育的另一方面作用，是通过教育来巩固社会制度、强化思想，这种作用始终伴随着教育投资过程而存在的，它包含在教育的双重职能之中，因为教育不只是为了提高人的生产能力，还要提高人的其他方面能力修养。况且，劳动者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思想的进化是有益于劳动者生产能力提高的。

政府负担的教育投资，其来源有多种渠道，并因社会制度不同而各有侧重，如：

一、国民收入中，一部分通过财政预算拨款进行教育投资，这是教育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称之为教育经费或教育公共支出；另一部分是国家对企事业的拨款（包括企事业应缴税利的减免）中，所形成的可变资本（或工资）追加而用于教育培训。

二、部门企业、财团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所得（利润）中，一部分也以可变资本（或工资）追加形式用于教育；另一部分可能以捐款、赠予形式转移到教育部门，捐款、赠予不是投资，但受款者接受后，将其作为教育投资来使用，成为教育部门的自有投资。

三、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主要形式是通过银行对教育部门贷款。对受教育者个人的贷款则形成个人的教育投资。

四、在特殊情形下，对个人所得（工资）进行征募或克扣，由社会用作教育投资。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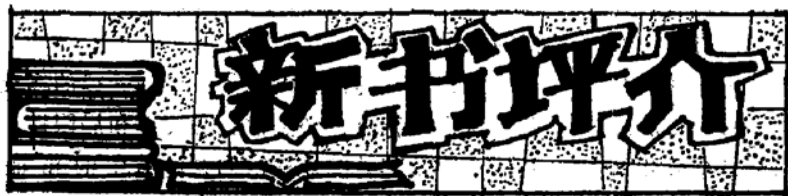
教育投资的筹集和使用，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制约性。一方面，社会制度决定着教育投资的使用性质和筹集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投资的性质是提高劳动力质量以供剥削，增强资本家的“才能”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资本家并不关心工人的全面发展，即使是生产发展所必需的教育投资负担，亦千方百计转嫁到工人身上，追加可变资本往往不能使工人工资增加，就是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提高劳动者劳动力质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一，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从社会剩余产品中拿出相当部分作为教育投资，增加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并且，社会负担越来越多的教育投资，是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负担能力又制约着教育投资的数量，影响着如何合理安排教育投资负担。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在经济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如何合理安排教育投资负担，使它的总量尽可能地扩大，效率尽可能地提高。

我国教育投资少，这已是众所一致的认识。原因主要是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同时不切实际地由国家把教育统起来、包起来，也给教育投资来源的开拓造成一定

限制。事实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财政并不宽裕，国家想包也包不起来，结果只能将有限的教育投资以“撒胡椒面”的方式分配，效果甚微。当然，就扩大教育投资总量上说，国家是受益的“大头”，而且也是最能保证财政来源的方面，因此，无疑是主要的投资者。这点已有不少人进行呼吁，中央和各级政府也已高度重视并尽力追加了一定的资金，今后还须不断追加。但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个人、企业、社团同样有负担教育投资的义务，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必要的补充形式。近年来，随着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实施，调动了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收入逐年增加。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集体和个人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愿意而且有可能进行教育投资，这成为我国迅速增加教育投资的巨大源泉之一。

为了做到合理安排教育投资负担，现行的许多体制都必须加以改革。我们认为，可以作以下改革的初步设想：根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尖端和专门人才培养等各个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分别主要由个人、企业社团、政府来负担教育投资，不能过早地由国家统统包起来。个人、企业社团必须负担与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教育投资。企业社团需要什么人才或劳动力，应由其按照一定的目标投资委托教育机构或自行培训，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出适用的人才，也有助于提高教育的质量，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个人为取得某种职业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需要受教育，也应由个人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教育投资。目前，国家按计划分配给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实质上是国家对企业的教育投资。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一些重点企业很多，一些企业很少，因此，是否可以部分地采取有偿供应的办法，企业在得到一个大学生后，要付出一定的教育补偿资金还给学校。企业付出的这笔投资将由受教育者未来就业期间创造的经济效益得到补偿。教育部门同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取得部分必需的教育投资以维持发展。当然，个人不可能承担其所需花费的所有教育投资，政府可以视实际情况予以资助和扶持，或是设助学金、奖学金，或是对教育机构给予补贴，例如，就基础教育来说，政府应拨出专款来开办有关的教育机构，一旦建成，就须以经营的理念来组织教育活动，以教育养教育。而现在大量支出的所谓“教育事业费”、“办公费”转由教育机构的收入来负担，当然，主要也就是由受教育者或所属的家庭、企业社团来负担。政府节省下来的这些开支，除继续资助一些普通教育机构或新办教育机构外，主要用于教育领域的“风险投资”，尤其是那些个人、企业社团未能预见或无力举办的一些新兴的或大型的教育活动，政府主要培养尖端人才、专门人才。

在改革中，不仅要注意投资的负担，还要注意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合理分配教育投资的收益，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人才和劳动力的使用要坚持量才使用和有偿使用原则。量才使用保证教育投资的效益，有偿使用使教育投资补偿有源。本文不涉及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但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 有益的探索 崭新的见解

——介绍章沛的《思维规律论》

亦 黄

在我国逻辑科学的园地上，辩证逻辑可以算是一朵迟开的鲜花，但是，近几年来，却呈现出百花争艳，竞放芬香的喜人景象。由章沛同志著的《思维规律论》，则是辩证逻辑这个百花园中出现的一朵鲜花。该书在一九八三年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比会上获得好评。该书一九八一年九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今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荐，国家出版总局同意，参加了莫斯科国际图书展览展出。

章沛同志在《思维规律论》中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逻辑理论为经，以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思想）史和逻辑史的具体材料为纬，从思维过程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思维规律作出新的具有启发性的探索。全书以对立同一思维律为核心，以思维怎样从遵循同一律过渡到遵循对立同一律为主线展开论述，包括研究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的指导思想；思维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同异矛盾；同一律及其客观基础和认识论根源；两种规律眼界的相互关系和两种逻辑的相互关系等共六章二十一节，近二十六万字。从而构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思维规律的体系。

章沛同志在《思维规律论》中以创新的精神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

一、提出了研究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的指导思想。

作者认为，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的研究，是建立辩证逻辑体系、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的形式逻辑理论、正确认识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的相互关系的钥匙。他认为，探讨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的基本原理作为前提。这就是，思维是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的原理、思维在实践过程中运动和在实践过程中认识世界的原理，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这些原理正是《思维规律论》进行对思维自身的分析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接着，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的具体的指导思想，即：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它包括：形式逻辑的对象原理；形式逻辑的认识作用和局限性的原理；辩证逻辑的对象原理；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较系统地解决了关于进行思维规律的辩证本性的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

二、揭示了思维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同异矛盾；分析了同异矛盾在整个认识过程、特别是思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表现。

思维过程中的同异矛盾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从逻辑科学的角度看，思维过程有着它自己特殊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有着它自己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也就是对象及其属性的同与异的矛盾在思维中的反映，作者称它为思维过程中的同异矛盾。之所以说它是思维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因为它是思维过程的内部矛盾、内部联系，规定着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

在谈到同异矛盾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时，作者认为，在思维的联系和分化的运动中，同就是联系的桥梁，而异则是分化的界线。同异矛盾推动着思维的联系和分化，而思维的联系和分化又引起了思维中更新更多的同异矛盾。例如，从认识的全过程看，同异矛盾先在感性中起作用，推动着感性认识的矛盾运动、联系、分化和发展；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着思维的矛盾运动、联系、分化和发展；思维自身的分化过程，又和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环节相联系；思维之由初级的抽象阶段上升到高级的具体（辩证）阶段，同异矛盾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书中还具体地阐述了同异矛盾在思维自身的运动、联系、分化、上升过程上的作用，以及一连串的具体表现的环节。

根据上述观点，作者在书中进一步具体阐明了两种不同思维规律——同一律和对立同一思维

律的理论。

三、着重提出和论证了关于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认识论特点，必然性、必要性和局限性，以及同一律及其外围规律所内含的潜在的辩证因素；提出和论证了思维之从遵循同一律，上升到遵循对立同一思维律的过渡；提出和论证了对立同一思维律的内部关系和结构，以及辩证思维存在着核心规律和外围规律所组成的规律体系，等等一连串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作者指出，从同一律的本身具有自我同一的特性、意义和作用来看，它不是辩证逻辑。但由于它本身反映着、体现着思维过程的初级环节的规律，因此，它实质上是思维过程的辩证法的一个特殊环节。

作者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以对立同一思维律为核心的四个基本规律群及其基本范畴、公式和它们的客观原型（如图）：

项 别 次 序	内 容	基 本 规 律	基 本 范 畴	公 式	客 观 原 型
一		个别一般的对立 同一思维律	个别和一般	个别——一般——个别 一般的对立同一	个体和群（一 与多）
二		区分组合的对立同 一思维律	区分与组合	区分——组合——区分 组合的对立同一	个体和群的横 向关系
三		确定和推移的对立 同一思维律	确定和推移	确定——推移——确定 推移的对立同一	个体和群的纵 向关系
四		正项反项的对立同 一思维律	正项和反项	正项——反项——正项 反项的对立同一	辩证发展的无 限性

章沛同志在书中提出的对立同一思维律及其基本规律群，来源于客观（原型），是唯物的，但并不等同于事物自身的对立同一律。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我们逻辑工作者无疑是有启迪的。

四、作者根据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律的认识特点，进一步阐明了恩格斯关于逻辑眼界的观点，从而作出了关于两种逻辑的特点、同异、关系等问题的明确阐述。

作者认为，逻辑眼界的区别是认识作用，认识水平的区别，而不是对象领域和适用范围的区别。逻辑眼界作为区分两种逻辑、两种规律的观点，是对恩格斯“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

眼界”的光辉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它对正确评价形式逻辑的作用和局限性，对正确认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很好的“钥匙”。

辩证逻辑是一门思维科学，是反思的科学。章沛同志经过多年的探索、攀登，以扎实的材料，鲜明的新观点，严谨的结构和细腻而有说服力的论述，写成了这本《思维规律论》。可以预料，该书对创立科学的辩证逻辑体系，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辩证逻辑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处在探索阶段。这样，在该书的内容和表述上难免有欠准确、欠全面、欠完善的地方。这就有待于作者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了。

## 读《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罗 东 升

清代词坛，词人辈出，词作如林，呈现出中兴的局面。其光辉的成就却长期受轻视。就是与朱彝尊、陈维崧齐名的词家佼佼者纳兰性德，涉猎者也寥寥无几。近几年，虽陆续有人著文论述其人其词，但对其作全面深入的著作还没有。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冀天骥同志的新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这是一部深入浅出，立论新颖，较全面评述纳兰性德及其词的专著，它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纳兰词的成就和重要地位的认识，推动对清词的研究。

本书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评价了纳兰性德词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和特色。纳兰词现存三百四十八首。论者一般认为纳兰词的主要内容有四：写爱情、悼亡妻、厌仕宦、歌友谊。本书除用四个专题深入分析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外，还增加两个专题：“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和“惴惴有临履之忧”，剖析纳兰词所反映出来的牢骚和忧愤情绪。前者表现词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后者反映词人对处于崩溃前夕的飘摇不定的社会的隐忧。探讨了前人未曾探讨过的问题，拓展了对纳兰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本书对各个方面的内容的论述，也力求全面深入。如对爱情词的论述，不是泛泛而论，或论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论述。既指出其爱情词在格调上，“那种低回幽怨的意境”，近似宋代的晏几道，又指出由于经历的不同，“其取材又与晏几道大异其趣”；既指出其爱情词充满粉红的玫瑰色彩，又指出它同时夹杂着阴冷的青灰色；既指出其爱情词“集中表现的，多是出于贵族的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又指出词人也以宫怨为题，注视着宫女的苦恼，对失去爱情的少女寄予深切的同情；既谴责制造爱情悲剧的封建时代，又坚信“莫教星替，守取团栾终必遂”，有情者终成眷属；既指出他的爱情词“没有象民歌那样直率”，又指出“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实在不容忽视”。

本书对纳兰词艺术风格的分析也较全面，详

细地论述纳兰词的艺术风格“既有旖旎缠绵的一面，又有苍凉豪宕的一面”，并分析形成不同风格的原因。

本书论词不但顾及全词，而且顾及全人，顾及影响着人的社会状态。本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家世、生平、交游、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把纳兰性德的词放在其所处的特定背景下，结合他的经历进行分析。因此，本书使读者能较清晰地窥见纳兰性德及其词的全貌。

一部学术著作，尽管作了面面俱到的论述，如果没有真知灼见，总是老生常谈，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本书不仅论述全面，而且立论新颖，见解精当，精辟之论，随处可见。

纳兰性德曾被清人况周颐誉为“国初第一词人”，理由是其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近几十年来，又有一些人认为其词情虽真，然“极少接触社会问题”，又“过于哀感”。那么，对纳兰词该怎样评价才算公允呢？本书不囿古见，也不随俗从时。它对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加以深入翔实的探讨，紧紧把握住当时处于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从文学反映生活的观点出发，发掘纳兰词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精辟地指出：“在封建制度临近崩溃的前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不可遏止的苦闷情绪，必然会反映到创作上来。透过纳兰性德哀婉凄厉的词章，我们依稀听到了封建层冰摇曳断裂的声音。”充分肯定纳兰词的时代意义。这是贯串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本书在分析评价其爱情词、悼亡词、厌仕词、友谊词时就都渗透着这个观点，从而能深刻地揭示纳兰词的时代气息和风格特点，肯定纳兰词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分析纳兰性德“临履之忧”和“不知何事萦怀抱”这类好象无端叫苦叫闷的词作时，更见精采。纳兰性德锦衣玉食，仕路亨通，还有一个在当朝炙手可热的父亲。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大可飞黄腾达的幸运儿，应该是乐而无忧

的。然而，在他的词作里，却弥漫着空虚、彷徨、迷惘、苦闷的情绪。纳兰性德这种心神不定，哀感凄厉的情绪是哪里来的呢？词人自己弄不清楚，一些研究者也没能找出正确的答案，论其词只就词论词，或肯定其情真，或斥其过于哀感消沉。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考察，认为“有些诗人，他个人不一定遭遇很多挫折和不幸，但时代的阴影会压抑在他的心头，使他不期然发出了变征之音，莫明其妙地感伤一番”，“诗人特有的敏感，使他看到隐藏在繁华后面的颓唐没落的阶级命运。”他词作的忧苦情绪，是“有病社会、时代，通过诗人泄发出痛苦的呻吟，”从而充分论证纳兰性德哀婉凄厉的词章，在情调上，“其消极面是异常明显的”，“但由于他的诗歌典型地概括了清初地主阶级的没落感，就这个意义上说，纳兰性德是清王朝第一个预感到‘忽喇喇大厦倾’的歌手。”这个答案尽管有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立论新颖，言之成理，发人深思。

本书对反映仕宦苦闷的词作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论者一般都认为词人厌弃仕宦，是由于本性放达不拘，追求隐逸、享乐之故。本书则提出内证外证，论证纳兰性德虽有贵公子气，但他是个有抱负、有理想、有政治才能的贵族青年。他想干一番事业，大展鸿才。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御前侍卫，在别人看来，这是个十分荣耀的肥缺，然而纳兰性德却“不甘心于让生命消磨在尊荣而庸碌的位置上，不甘心充当皇帝御座前后的小摆设”，故而闷闷不乐。这种不乐是“有志不获骋”，壮志难酬的苦闷。后来，由于对时代病态，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的感受越来越深，生性又放达不拘，不慕富贵，向往自由，才有“山泽鱼鸟之想”，萌生远离尘俗，过自由自在生活的念头，厌弃整个仕宦生涯。本书还指出，由于他实际上不可能摆脱红尘，脑子里又充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的封建伦理观念，因此，“他不可能象宝玉那样光头赤脚，飘然出走，反而孜孜不倦地勤于王事，终于夭折在他所痛恨的‘雕笼’里。”

研究古代作家，往往免不了要遇到考证。本书在考证方面也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如纳兰性德悼念前妻卢氏的词，写得凄惋悱恻，令人不堪卒读。但卢氏亡逝的确切时间，却不得而知。对纳

兰性德生平事迹研究甚深的张任政先生在《纳兰性德年谱》中也说，卢氏死年，“无从考得确实年月”。本书却把它考证出来了。本书作者根据纳兰性德的几首诗词和顾贞观的词，论定“卢氏既不可能死于康熙十五年以前，又不可能死于康熙十六年九月以后，唯一可能，就是她死于康熙十六年三、四月间。”这个结论相当确切，又实事求是的留有一点余地，态度审慎。近日读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饮水词》，知此书编校者冯统先生曾于北京文物工作队院内发现纳兰性德的同年生叶舒崇撰写的纳兰性德前妻卢氏墓志铭，铭文明确记载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本书考证的结论与此记载相差仅一、二月，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了。

本书在考证纳兰性德的交游和词作系年方面，花的工夫更多。本书对与交游者交游的情况，交谊的深浅，交情的思想基础，相互的影响都作了严谨的考证。这对于研究纳兰词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于词作系年，本书考证出不少词写作的确切时间。但由于资料缺乏，年代久远，有些不易弄准确，本书则一方面尽可能考证出其年月，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说明“姑系作本年”，不轻率武断。

本书学术性颇强，但读来饶有趣味，毫无繁冗枯燥之感。它把评论、鉴赏、考证揉合在一起，熔学术性、资料性、文学性于一炉，夹叙夹议，语言生动流畅，富有文采，深入浅出，可以雅俗共赏。

本书对纳兰词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本书开宗明义引梁启超的话说：“容若小词，直追李主”，究竟怎么追，追到什么程度，两人的词有何异同，在十几万字的叙述中，却极少接触，不能不说是一遗憾。又如附录的《年谱》说顺治十五年，“吴兆骞被流放到宁古塔”。我认为此说不确。吴兆骞于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在刑部被判流放宁古塔，但，他是于第二年夏才起程去宁古塔的。吴兆骞从宁古塔给好友顾贞观的信札，对此有明确详细的记述。书云：“弟以己亥（顺治十六年）夏出榆关……六月廿一日渡松江……七月十一日抵戍所。”（《秋笈集》卷八）吴兆骞的儿子吴振臣写的《宁古塔记略》，亦作顺治十六年夏谪戍宁古塔。



## 企业将才的素质

郭敬山 徐仲华

《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说的带兵打仗的将才必须具备的条件。按照党中央对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根据社会主义企业的特点，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借鉴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认为，企业中的将才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要有渊博的现代管理知识。一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能够驾驭客观经济规律。二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制度，能够把工业管理学、运筹学、系统学、财政学、贸易学、统计学、会计学以及外贸方面的知识运用到本企业。三要懂得本企业的计划、生产、设备、工艺、质量、供销、物资、财务等专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四要懂得新兴的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影响很大的“预测学”、“决策学”以及电子计算机等自动化管理手段的应用知识。五要懂得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条例、规定。六要懂得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以上这些知识，一个企业的领导当然是越精通越好。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全部精通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要求企业领导是“通才”，而不是“全才”。

第二，要有决策能力。决策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要具备这种综合能力，必须：一要有远见卓识。本行业的国内现状及发展方向，国际现状及发展方向，都应该有所了解，有预见。并要据此提出战略目标和规划。本企业怎样发展？近期、

中期、远期目标是什么？采用什么方法一步一步地达到这些目标？心中要有个清晰的蓝图。这就是逻辑能力。二要根据目标，不断出主意、想办法、提方案、作决定、用干部，组织实施，攻下一个个“山头”，拿下一个个“高地”。这就是组织能力。三要勤于调查研究，吸取各种意见，集中群众智慧。对新鲜事物敏感，善于提出新设想，年年都有新套套。这是创新能力。四，有了逻辑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就可以提高判断能力，情况明，决心大，当机立断，多谋善断，应急应变，敢想敢干。

第三，要有组织指挥能力。组织能力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组织，而对人力的组织最重要。一要尊重人才，发掘人才，重用人才。要把年轻有为、德才兼优的人安排到重要岗位上。要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发挥人才优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比如，应该把善动脑、多思考、经常出点子的人，安排到参谋部门、智囊部门；把勇于创新的人，安排到研究发展部门；把社交能力强的人，安排到供销部门；把头脑冷静、有坚强毅力的人，安排到老大难部门；把表达能力强的人，安排到宣传部门等等。要任人唯贤，根据人的真才实学来铺摊子、搭班子、定机构，形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二要严格实行经济责任制，实行权、责、利统一。要指标分解，分工授权，实行公司、厂、车间、班组分级核算，真正做到“指标到肩上，人人是厂长”，“人人肩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三要协调动作。



既要分工，又要合作，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配合。要克服扯皮、踢球的现象。四要统筹兼顾，把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起来，做到环环相扣，步步衔接，有条不紊。五要善于抓典型，树标兵，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运用典型推动全面工作。六要把表扬与批评、奖励与制裁结合起来。以表扬为主，但该批评的一定要批评；以奖励为主，但该制裁的一定要制裁。这样才能扶正祛邪，令行禁止。

第四，要有将才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一要有胆量，群胆可贵，孤胆更不可少。将才必须勇敢，胆小鬼成不了将才。企业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然会有风险。作为企业领导，必须敢于拍板，敢于承担风险。如果树叶掉了也怕砸破头，那就根本没有资格当企业领导。二要有独立型的性格特征，要有独立工作的要求，善于独立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为次要的因素所干扰。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企业领导，顺从型的性格也应有，那就是要执行上级的指令性的计划。但如果缺乏独立性，芝麻大的小事也请示报告，那决不是将才。三要好胜心强，富于首创，勇于进取，乐于挑战，不断改革，渴望在领导岗位上有所作为。四要有坚强的意志，镇定，果断，顽强，胜不骄，败不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充

满必胜信心，具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搏精神。在当前的改革时期，领导者必须具备以上心理素质尤其显得宝贵。中央指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并且要宏观、微观双管齐下：一方面，经济领导部门要从计划体制、经济政策、经济立法、行业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企业领导也必须率领全体职工，去冲，去创，去杀出一个突破口，去开辟一条新道路。这就必须改变过去官工、官商那一套作法：“上边咋说我咋干，上边咋令我咋行。”必须变过去的“等、靠、要”为“闯、创、干”。有些企业领导不敢碰硬，畏葸不前，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正是缺乏领导者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

第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有高尚的政治品德。一要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有理想，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愿意为党挑重担子，有主动性，有干劲，有为四化献身的精神。三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奉公守法，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群众心目中的表率。四要团结和依靠群众，吸引群众参加管理，特别是能与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合作。五要沉着老练，胸怀开朗，顺利时不得得意忘形，受挫时不沮丧迁怒。

## 普通中学改革的根本点在于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孙喜亭

现代生产要求教育应着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培养，而就中学来说，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是当前的任务。马克思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就是要使儿童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列宁称综合技术教育就是学生（十七岁以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马克思将综合技术教育归属于教育的内容之一，而不归属于劳动的范围，列宁将综合技术

教育归属于普通学校的教育范围内，而不属单一的职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并不是要学生学习所有具体生产部门的技术的综合，如动力、机械、化学、农业、运输、建筑等具体生产部门技术的综合，而是学习现代生产的基础知识。这就要从具体生产中找出最一般的基础，找出典型的、普遍的、可以成为了解任何一种生产的关键的那些知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出基本生产技术知识，技能与技巧。再将这些知识列入普通学科的

教学大纲中，列入劳动课、机械学、电工学、农业等实习的大纲之中。

然而，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在当前教育改革中被遗忘了，或者说并没有引起主管教育的部门以及教育理论界、教学论研究者、教学法专家等应有的重视。人们常常批评普通学校培养的人不中用，试图以农中、农职、职业高中等代替普通中学的办法来解决，而没有从普通教育中的综合技术教育的要求来探讨。普通中学的更重要更根本的改革不在兴起职业高中，而是坚决地在所有的中学实施综合技术教育。马克思从大工业的本性出发，首先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现代教育的组成部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积极的倡导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实施综合技术教

育，并将其列入党的纲领之中，但他考虑到当时的苏联面临的迫切的、糟糕的实际情况，同意有条件地将第二级学校高年级同职业教育合并。所谓条件，就是避免过早专门化，并防止把职业教育看作是培养手艺人的教育；职业学校里必须扩大普通教育的课程；而且应立即采取一系列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的实际步骤，使学生具有综合技术教育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初步知识。这样就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了，将方向性与现实性结合起来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张的实施一种多方面的手艺人的教育，认为那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的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点也是应引起我们注意的。

## 丘逢甲“挟款潜逃”辩讹

徐博东

近代台湾省籍爱国志士丘逢甲，乙未倡导抗日护台失败后，举家内渡大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叙，历来有所谓丘逢甲“挟款潜逃”一说。此说最早见之于连横所著《台湾通史》：“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sup>①</sup>由于连著影响甚大，此后，许多史家都沿用此说，似成定论，直到近年出版的一些专著，仍持是说。<sup>②</sup>这种记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涉及到对丘逢甲的评价问题，很有必要把它搞清楚。笔者经查证认为，此说显系以讹传讹，不足为信。其主要根据如下：

一、众所周知，台湾割让后，清政府借口“台事无从过问”，停止供给一切饷械，并严禁沿海船只物质援台。<sup>③</sup>张之洞原本答应拨银一百万两援助，由于局势的变化，也成了一纸空文。当时虽然台北藩库尚有存银四十余万两，但唐景崧对丘逢甲心存疑忌，不仅限制义军只能在台中一带活动，“并克扣其饷械”，<sup>④</sup>致使台中义军饷械十分缺乏，全靠向各方“借款”和动员缙绅“认捐”勉强度日。<sup>⑤</sup>但由于局势不稳，“借款”和“认捐”也殊非易事，例如“首富林维源认捐饷银一百万两”，而实际上只交付了一小部分，“其他则仰赖各地义

军自筹自用。”<sup>⑥</sup>日军占领台北后，旋即沿铁路线南侵，直抵新竹。丘逢甲于匆忙中指挥义军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卒以饷绝弹尽”，死伤过重而被迫撤退。<sup>⑦</sup>因此，义军新竹溃败后尚有十万两存银，实不足信。

二、退一步说，即使丘逢甲当时手头确有十万两存银没有发放给部队，可据史料记载，义军在新竹战败后，日军出六十万金悬赏购取丘逢甲的首级，丘逢甲是在日军通缉、叛徒告密、道路梗阻的情况下，带着少数亲信在深菁穷谷间四处躲藏，历时达一个多月始才脱险。<sup>⑧</sup>十万两银子，重达六千二百五十斤，当时尚无汽车，只能用人力来挑，假设每人挑一百斤，也需六十名壮夫方够敷用。试问：当时丘逢甲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可不可能带领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队而能平安脱险？何况在那种危险的情势下，恐怕最是爱财如命之人也不会做出这等蠢事来。事实上，当时丘逢甲一行，包括老弱妇孺在内，才不过三、四十人。<sup>⑨</sup>这是不足信之二。

三、据当年曾亲自送丘逢甲上船内渡的一位黄姓老人回忆：“他们三、四十人带的都是随身行

李，并没有什么笨重的箱囊之类的东西。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说他们带有大量白银，那是绝不可能的；要是故意这样讲，则就很对不起这位忠心爱国的读书人了”。<sup>⑩</sup>可见前面的推测不谬。

四、再说，如果丘逢甲果真挟义军饷银十万两内渡，那么，丘家应成为岭东富极一时的暴发户，可事实却不然；（1）据跟随丘逢甲回返大陆的丘氏族人回忆，当年他们由泉州登岸，经厦门，过汕头，转抵故乡镇平（今广东蕉岭县），“沿途都曾居留了个把月，由于三、四十人的开销很大，管理财务的人已感难以支应”。<sup>⑪</sup>（2）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回忆说：返回故乡后，“由于人口众多，耗费浩繁，买些土地，盖些房子，生活费就没有了。居留不过半年，不得不去潮州另谋出路。我的父亲担任教席，三叔树甲经营生意，藉以维持部众生活”。<sup>⑫</sup>“不到一年，鉴于大家生活难继，我的伯父和谢统领也不得已挥泪离粤回台。”<sup>⑬</sup>此后，丘家也不见有多大发迹，直到一九〇〇年，当丘逢甲拟在潮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时，还不得不赴南洋各地筹款。<sup>⑭</sup>

五、丘逢甲“幼负大志”，“毅然以天下为己任”，<sup>⑮</sup>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决非见财忘义的无耻之徒，不存在“挟款潜逃”的思想基础：（1）丘逢甲一向痛恨贪官污吏，他早年就曾写诗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去职离任时，“千箱万篋运脂膏，饱挂归帆意气高，岂是郁林无石载，宦囊已足压波涛。”<sup>⑯</sup>讥讽那些利禄之徒，“年年车马燕山道，不为黄金客不来。”<sup>⑰</sup>（2）己丑年丘逢甲考中进士，钦点虞衡司工部主事。可是丘逢甲无意走升官发财的仕途之路，宁愿弃职返乡，“专意养

士讲学”，<sup>⑱</sup>过较为清苦的教书生活。族人常以厚礼请其主持婚丧喜庆之事，他也“感到十分厌烦，经常避免参加。”<sup>⑲</sup>（3）甲午中日战起，台事危急，丘逢甲“倾家财以为兵饷”，投笔从戎，组织义军抗日护台，以致连台中的柏庄新居也被日本兽兵悉数烧毁。<sup>⑳</sup>（4）丘逢甲内渡抵达泉州后，侵台日军头目桦山资纪曾派人跟踪而来，以金钱和地位为诱饵，企图说服丘逢甲率领部众回台任事。丘逢甲不为所动，不仅严辞拒绝，“就连替日本人做说客之人，也给训了一顿。”<sup>㉑</sup>试问：志在金帛之人，能够有此等作为吗？！

据以上述五点，笔者以为，丘逢甲“挟款潜逃”之说不足为信。

①见该书（下册），卷三十六《丘逢甲传》。

②如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第194页；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第226页。

③《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二，第5—7页。

④同②第192页。

⑤丘逢甲：《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⑥、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丘念台：《我的奋斗史》第59、68、78、40、69页。

⑱、⑲、⑳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㉑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⑳、㉑丘逢甲：《柏庄诗草》（去思词）、《黄金台》，转引自丘晨波等《丘逢甲与〈柏庄诗草〉》一文。

㉒丘琮：《姑怀录》。



## 林则徐与云南少数民族问题

林有能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云南发生汉回互斗案。经总督贺长龄、李星沅处理后，非但未能解决，反而使矛盾更趋激化，并导致回民丁灿庭、杜文秀等先后京控。道光二十七年，清廷改派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受理此案，直至道光二十九年。纵观两年来林则徐在云南少数民族问题上

的所作所为，诚然，由于他镇压了弥渡回民、腾越“野夷”等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起义而应当受到非议，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笔者认为，下列几个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一、“只分良莠、不分汉回”的民族观，是一种较为进步的民族观。林则徐在给清廷的上奏中

摆出了自己的观点：“窃思汉回虽气类区分，而自朝廷视之，皆为赤子，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视为汉为回。”（《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80页）他在受命处理丁杜氏京控案后，也明确提出“只分良莠、不分汉回”的解决办法，主张“执法持平”。在家信中，这种观点表现得更为充分：“从前入手时，原不专指回民为匪，今中外并为一说，滇中有折，注语上无不曰‘回匪’、曰‘回务’，若有回而无汉也者，及奉上谕，无不照折声叙，无怪回民不服。今于折片内略寓微意，然皆未必看出，亦尽我心而已。”（《林则徐书简》第266页）可见他意识到歧视回民是汉回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这里所说的“微意”，其实也就是“只分良莠、不分汉回”之意。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所施行的都是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在他们眼里，汉族与少数民族闹矛盾，当由少数民族担负责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也就是良莠之分。林则徐或多或少地跟这种传统观点有所不同，他没有因回民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诸方面与汉族差异而加以歧视，他把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等看待，视他们为一体，都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说林则徐的民族观较为进步。

二、重调查，不偏信，以事实为据。林则徐一方面认识到“原告无非理直，被告无非理曲”，而“统全案之原委而言，则此造直中有曲，彼造曲中有直”。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先前在事各文武不免意存掩饰，难以确究真情”（《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75页），这是解决问题的障碍。为了掌握案情真相，真正做到区分良莠，他在往滇途中，“轻骑减从，沿路谘諏，穷起衅之根由，辨山川之险易，别将吏之贤否，访首恶之姓名”（《回民起义》I第177页），深入进行细致的调查。

经过细致调查，林则徐澄清了一些问题。如贺长龄曾以搜杀永昌内应回民有功，荐升一批汉族官吏以及练首。实质上，所谓回民内应无非是汉族地主阶级合谋屠杀回民而炮制的一个借口。林则徐经过调查，尽悉此事始末，因而严惩了这些凶犯。又如丁灿庭控案中称回民被杀八千余，经林反复查阅户口底册及与丁对质，核准被害者实为四千余人。总之，经过调查，林则徐基本掌

握案情梗概，从而为他较好地解决汉回矛盾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对制造民族矛盾的杀人凶手，“不分汉回”，均以惩办；对无辜被害者，则“无论汉民回民”，都“设法招复”。以沈聚成、周日岸为首的练哨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是道光二十五年屠杀回民的主要凶手。林则徐一抵云南就“檄道镇赴永昌督府县”提集他们，并先把周日岸等人诱擒解省。练哨恐林则徐“认真究办”，便劫回周日岸等人，并再次拥入永昌城内，对回民大肆屠杀，甚至不惜与官军对抗。面对这种情况，林则徐一方面亲率大兵包围永昌城，另一方面又“明查暗访，且多遣文武员弁确探未获匪踪。”经过一番努力，共获杀回凶犯四百余人，在永平正法者二百人，充军边远者二、三百人。练首沈聚成被杀，前永昌知府恒文的长随、杀回凶手之一黄溃被斩首示众，恒文本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保山回民两次被惨杀后，幸存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林则徐对他们的“受害情形，实堪惻恻”，表示同情。因此，在怎样安置回民的问题上，他不同意前任李星沅等提出的把回民迁到官乃山，与汉族隔离开来的主张，而是主张“招复逃亡回众，仍返故居”，“有产者清产还之，无产者量以绝产给种。”（《林则徐书简》第264页）虽然后来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这个主张与前任相较，无疑是棋高一着。

四、重视用教育方法解决民族矛盾。林则徐抵滇后，目睹“永昌之后，緬宁又起，緬宁之后，云州又起，惩创非不痛切，而仍反复无常。”（《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80页）从而认识到，光靠武力镇压，并非解决民族矛盾唯一有效的方法。他说：“断不可再行用兵，致滥杀而转滋藉口”，唯“清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清源”，其实就是清除对立双方的猜疑和互不信任情绪。怎样清源呢？他强调实施教育，进行“攻心”。他遍贴晓谕，“与汉回相见以心”，晓以互斗对人对自己均不可取。他还要求“汉回中各有绅衿耆宿以及掌教头人，责令于本处同类之中自相约束”，并要双方作出保证，“以回保汉，以汉保回，永禁侵陵，务敦和睦”。这种处理方法，对各族人民当然也是有好处的。

#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郑之洪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是理解康有为“立制度局”主张的一个关键词。《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对这一词的解释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sup>①</sup>我认为，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

在康有为使用的变法术语中，“宪法”一词的特指含义是明确的。他在奏折中曾经提出要求，“特开立法院于内廷……草定章程，酌定宪法”；<sup>②</sup>他在进书中曾经发出警告，“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sup>③</sup>两则史料，前则以“章程”一词与“宪法”一词相区别，后则以波兰的君主立宪制被沙俄扼杀的历史教训与维新派要求“开制度局”而“欲草定宪法”的中国现状相对照，显然，康有为所指的“宪法”，就是特指的君主立宪的宪法，而制度局的根本任务，就是“酌定宪法”，实现君主立宪。

特别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一语出自《日本变政考》的后跋，它是对全书的总结，提纲挈领地揭示出变法条理的要点，阐明变法措施与变法目的的关系。康有为设想的变法，以“立制度局”为起始，而以实行君主立宪为终结；变法完成的标志是，“草定议院之宪法”，“人主与群臣议院，日日讨论，孜孜不已”。把“立制度局以议宪法”一语与此相参照，“宪法”一词即特指君主立宪的宪法，应该是确切无误的。

在戊戌维新时期期的中国，守旧力量十分强大，而维新力量则过于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变法的成功，康有为认为，必须特别强调变法纲领与变法次第之间的相互关系。“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缀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变法的“总纲”是什么？“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人主与群臣议院，日日讨论，孜孜不已，盖新政成矣。”显然，变法的“总纲”就是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法的“次第”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日本变政考》前序中明确地列举出来的从“誓群臣”、“开参议院”，以至“草定议院之宪法”、“人主与群臣议院”的依次进行的“变法先后次序”。既然中国变法的蓝图是仿效日本变法，中国变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君主立宪，“立制度局以议宪法”中的“宪法”一词即特指君主立宪的宪法，难道还会有疑问吗？

变法“总纲”与变法“次第”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立制度局”与“议宪法”的相互关系。只有“立制度局”，才能“议宪法”。因为，“新旧不两立”，“互相水火，有如仇讎”，“守旧之人……出全力以阻挠之，造谣言以摇惑之。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以极多之党……务攻开新之人，务挽维新之政……新政不行，职是故也”。<sup>④</sup>因此，“维新之始，难用旧人”，“由旧必厥……惟有乱败而已”。进行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第一，用人问题；第二，变法布署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制度局”，“立制度局”是变法的手段。只有通过这一必要的手段，才能达到实现变法政治纲领的目的。《日本变政考》后跋中提出的变法条理的“大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纾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均是阐明变法手段与变法目的的关系。综上所述，“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即特指君主立宪的宪法，它的词义确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①房德邻：《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4日第三版。

②宋伯鲁（康有为代拟）：《为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

③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序》（戊戌进呈本），转引自孔祥吉《戊戌奏稿》的篡改及其原因》。

④杨深秀（康有为代拟）：《为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

# 广东经济学界讨论招股集资问题 论点综述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内兴起了不少招股集资的企业。特别是佛山市信托投资公司向全国公开发行股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公司自1984年6月21日正式开张营业，到7月底，要求入股和已经入股者遍及全国27个省市和地区。总计收纳股金2525万元，超过原预计的6倍。佛山市人民政府专门举办了社会集资理论研究会，会议围绕佛山市信托投资公司招股集资的具体做法是否可行，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发行股票和应否开设金融市场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现将我省经济界讨论的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 一、佛山市信托投资公司招股集资的具体做法是否可行

这是讨论中争论的一个焦点。大多数同志肯定佛山市招股集资是在探索一条用活资金的新路子，是解决国家银行投资性贷款不足的重要途径。但对招股集资的做法，却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 1. 是否会冲击国家银行体系及扩大基建规模？

一种观点认为，招股集资成立类似地方银行的企业，将会冲击国家宏观金融体系。盲目扩大基建规模。首先，目前由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管理金融、货币、信贷，是完全必要的。过去资金分配不合理和不讲效益的弊病，可以通过银行体制改革和改变资金投放办法来解决。集资成立地方银行性质的企业，只能造成以中央政府信誉为担保的银行体制和以地方信誉为担保的信托投资公司之间的矛盾。其次，在目前国家基本建设规模仍需严加控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都不受宏观调节、自行集资搞建设，必然造成基建规模失控。第三，在目前消费品“买方市场”趋势加强和基建材料“卖方市场”持续发展的状况下，过多地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把消费基金转化为基建资金，将会加剧基建材料“卖方市场”的发展趋势，引起建材市场的价格上涨，并波及第二部类的价格稳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招股集资不会冲击国家银行，即使“冲击”也是有利无弊。首先，表面看来，招股集资会把银行的部分存款吸引过去，而事实上，股票吸收的不一定就是在银行里的储蓄。根据调查资料，这次佛山集资过万元的投资者的货币，多属窖藏性质；从银行提供的材料看，该公司在招股期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仍在上升。其次，即使抽掉了银行中居民存款的一部分，但这部分资金是用来投资于地方工业、商业、水电、地方交通运输等短期项目的，且投资公司积极做好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大，很快就会使资金回流生息，让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这反会增加银行存款，因而，地方银行与国家银行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会产生扰乱宏观金融体系的后果。第三、目前国家为控制基建规模而采取控制物资分配和基建资金分配的办法，可能造成资金沉淀和物资沉淀。而投资公司将闲置资金和物资动员起来，通过乘数作用，就会促进边际效益的增长，同时，只要集资的数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作好可行性研究，就不会造成基建规模失控。

### 2. 关于“政企合一”、“保本保息”、“退股自由”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投资公司由政府承担经济责任和由行政人员担任公司领导，是走向“政企合一”的道路；“保本保息”、“退股自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违反股票性质。理由是（1）投资公司由政府担保，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行政部门插手企业经营活动的事情。这样做仍然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不利于企业创业和竞争。（2）当企业发生亏损时，国家要保本保息，承担损失，投资者却依然可得高额利息，这是不合理的。由于“旱涝保收”，投资者不必关心企业的经济利益，使企业失股票持有者的监督。（3）股票具有不可逆性（不能退股）、流通性（可买卖或转让）和波动性（价格随公司经营情况而定）。而佛山发行的并不是真正的股票，它兼有地方政府债券、银行定期储蓄和股票的性质，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把一部分社会闲散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和国家银行产生了权力和利益上的矛盾。

第二种观点认为，佛山市信托投资公司由政府直接承担经济责任，由市长担任总公司董事长，股票“保本保息”，入股者“退股自由”，只是作为一种过渡的变通形式取信于民，在目前群众对招股集资尚不了解和对投资安全性有所顾虑的情况下，采取这些办法是可以的。投资公司属下企业各自实行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享有自主权，不能算“政企不分”。同时指出：目前用政府名义作经济担保和由政府领导人担任公司领导职务应逐步改变，而应根据公司本身的商业信誉来集资。对于“退股自由”、“保本保息”的规定，公司章程将来也应逐步取消。在开设金融市场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股票“三性”很难满足，但公司可同银行协作，由国家银行代理公司的部分业务：如代理股票发行、还本付息、转让过户等。此外，股票利息率不能定得太高，过高必加重公司的经济负担，建议适当降低。

##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可发行股票

第一种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必要，我国解决资金供求矛盾应立足于现有金融体系的改革。其主要论据是：（1）股票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增长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和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可取的。（2）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必须实行垄断，以保证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应立足于现有银行体系，通过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同样可筹集资金，支援经济建设。不必另起“炉灶”成立地方的和民办的金融机构，以免妨碍国家对金融的统一集中管理，把金融搞乱。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具有重要意义，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主要论据是：（1）股份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属于一般的经济范畴，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资本论》中就有详细的论述，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也进行了阐发。在我国现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商品经济活跃的条件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金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建立信托投资公司或其它集股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它补充了国家银行和财政资金之不足，促进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2）我国的客观现状迫切需要采取多种形式集中资金。我国的社会生产要素掌握在不同的所有者手中，这决定了集中资金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并以有偿集中为主。从资金来源看，有国资、民资、外资。过去，企业仅仅依靠无偿使用的财政拨款扩大再生产，忽视利用民资，资金量少且分配不平衡，经济搞得很死，效益很低。现在，掌握在企业和个人手中的闲散资金越来越多，利用股票、债券的形式把企业多余资金和消费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建设，合理投放，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扩大就业。（3）我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深入，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资金的投放。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可以看作是投资体制的改革。任何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首先是资金的投放，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益的提高，必将带动再生产总过程一系列环节的改革和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 三、关于开设金融市场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招股集资发行股票，就必须开设金融市场。这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要内容；是打破单一间接金融方式，搞活金融的突破口；是中央银行主动调节货币流通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信托集资只解决了资金的集中问题，开放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所才能解决资金的流动性问题。股票不能流通，就会影响购买者购买的积极性。但买卖股票，会使股票价格不断发生波动，客观上会使投机买卖经常发生。因此应视具体情况，制订出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法规，以防止投机买卖的出现。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开设金融市场应持谨慎态度，要避免象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两大弊病：一是大鱼吃小鱼，二是在经济危机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有太大的资金拥有者（大鱼），也不会有经济危机，股票、证券交易的副作用不会那么大，但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如旧股票商的意见和做法的影响，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在经济发展不稳定时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仍然会存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可以搞，但应逐步试点，在发行股票上市的外部条件（指市场购买力，包括股票推销地的货币储备量、社会游资、投资兴趣及银行存款利率、发行时机等）及内部条件（指股票发行单位所具有的商业信誉、资金和偿还借贷能力等）均已具备的地方，可考虑设置交易所。如应在上海、深圳等地先搞，佛山也可尝试。股票交易应先采取现货交易，不搞期货交易，同时，股票种类也应多样化。

（谭湛明）

#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八月至九月)

## 八月

4—7日 省社联组织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到斗门县参观访问，并就理论工作如何进一步适应开放和改革的新形势进行座谈。

10日 广东小经济研究会成立。

14—15日 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省社联邀请我省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座谈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特别是如何适应当前改革和开放的要求、开创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的问题。

17—18日 省厂长研究会举行首届学术年会。

19日 广东教育学会召开会议，传达第一次全国教育学术讨论会精神。

21日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先生应省社科院和广东经济学会的邀请，作《日本经济成长的原因》和《日本经济的未来与日中经济关系》等专题学术报告。

21—22日 省厂长、经理研究会召开厂长经理负责制问题研讨会。

28日 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学会成立。选举魏南金同志为会长。

28—31日 广东劳动学会召开全省劳动保险、社会福利问题学术讨论会。

## 九月

6日 广东劳动学会举办第二期劳动工资干部培训班。

8日 《学术研究》编辑部、广东经济学会联合召开青年经济研究工作者座谈会，座谈关于经济研究如何面向改革和开放问题。

8—12日 省社联、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惠阳地委联合主办的全国苏轼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惠州市举行。

10日 瑞典隆德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鲍格丹应广东省法学会的邀请作学术报告，介绍瑞典法学教育和律师培养的情况。

10日 广东图书馆学会举行文献著录标准化研讨报告会。

13日 日本劳动协会会长、东京女子大校

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应广东劳动学会邀请作学术报告，介绍日本战后劳动工资以及合营企业的劳动、劳资关系等情况。

15日 广东历史学会召开座谈会，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九十周年。

15—16日 广东省茂名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

15—17日 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在广东花县召开广东省首次洪秀全思想学术讨论会。

15—19日 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物资经济学会、广州商业经济学会联合主办的广东省流通理论讨论会在广东佛山市举行。会议主要探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

19日 广东农史研究会成立。

20日 广东劳动学会邀请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作《关于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学术报告。

21日 广东教育学会举行教育的三个面向与广东的教育改革问题学术讨论会。

22—23日 《学术研究》编辑部和广东哲学学会联合举行青年哲学研究工作者和大学生座谈会。座谈有关哲学研究如何为改革和开放服务等问题。

25日 广东人口学会举行庆祝建国35周年座谈会，畅谈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和前景。

26日 广东图书馆学会举行庆祝建国35周年座谈会，座谈35年来我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以及图书馆工作如何在改革和开放中发挥作用的问题。

27日 广东劳动学会郑永晖副会长为会员作《劳动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27日 广东科社学会举行“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讨论会。

28日 省社联举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座谈会。座谈建国三十五年来伟大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新形势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问题。



# 《学术研究》1984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 总 类

继续前进, 为开创广东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多做贡献……………张江明(5·5)

## 哲 学

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叶汝贤(1·5)

评所谓“权力异化”……………李言实(1·14)

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罗克汀(1·21)

深圳经济特区精神文明建设初探……………李伟彦 王效文 范 英(2·47)

论庄子……………鲁凡之(3·52)

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三方面……………刘歌德(3·110)

两种文明建设的“两变”……………石 松(4·80)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是科学……………列 兵(4·42)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进化论评议……………吴照钊(4·48)

论错觉……………袁贵仁(4·108)

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心理的论述……………何梓焜(5·50)

评萨特的“人学空场论”……………赖相桓(5·54)

从社会生产系统探索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李树申 杨萃吉(6·46)

海瑞哲学思想述评……………李锦全(6·65)

## 科学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郑星燕(2·39)

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事管理学……………程寿煌(4·110)

严格纪律, 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

——学习《陈云文选》笔记……………孔庆裕(5·36)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正确认识国情,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赵举贤(1·29)

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对抗与非对抗问题……………梁渭雄(1·37)

论差异就是矛盾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意义……………陈 清(1·4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肖 前(2·28)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张江明(2·30)

论一般与个别

——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赵凤岐(3·37)

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探讨……………齐振海(3·45)

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是完全自觉的否定吗……………陈 冲(4·37)

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原则……………高清海(5·44)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逻辑”……………李秀林(6·53)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的两个问题.....李江涛(6·60)

## 经 济

###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曾牧野(1·50)
- 我国农业集约化经营问题初探.....蒋献光(1·58)
- 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一些看法.....张元元(1·63)
- 论宏观生产力系统.....张良弼 王慎之(1·68)
- 进一步放宽政策, 振兴山区经济

- 关于发展广东山区经济的调查.....邝言农(2·5)
- 三论剩余价值.....卓 炯(2·12)
- 剩余价值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王成吉(2·19)
- 如何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范畴.....丁任重(2·21)
- 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作用.....于光远(3·5)
- 论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王 琢 廖曙辉(3·10)
- 论奖金的性质、职能与经济效益.....丘舜平(3·16)
- 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李万忍(3·23)
- 及早准备, 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
- 我省部分专家座谈发言摘要.....(3·27)

-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的统一.....张浩峰 廖建新(3·109)
- 浅议农村商品流通渠道.....许经勇(4·17)
-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问题.....陈 铁(4·23)
- 关于社会主义绝对地租问题论点综述.....刘少波 丛 明(4·27)
- 斯大林对平均主义的批判.....陈镇宏(4·106)
- 论农村市场.....梁 钊(5·13)
- 加强和发展省港经济合作关系.....叶澄海(5·21)
- 利用外资加快广州地区旅游设施的建设.....曾牧野 罗福群(5·27)
- 论入股分红.....曾康霖(5·33)
- 必须重新估价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卓 炯(6·20)
- 开放金融市场刍议.....黄定龙(6·29)
- 社会经济效益的系统研究.....邓宏海(6·35)
- 企业将才的素质.....郭敬山 徐仲华(6·119)

## 经济特区研究

- 论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性质.....卢祖法 欧宣德(4·5)
- 经济特区引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唐火照(4·12)
- 加快全面改革步伐, 把深圳特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梁 湘(6·5)
- 从深圳特区新的工资制度看我国工资改革的方向.....李克华(6·13)

## 历史·考古

-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张 磊(1·93)
- 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白 钢(1·103)
- 关于明清“佛山铁厂”的几点质疑.....罗一星(1·109)
-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曾近义 颜泽贤(2·54)
- 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许丽娟(2·64)

论两汉经学的流变·····	章权才 (2·73)
“正月”读音“征月”之为秦讳说质疑·····	黔容 (2·81)
“执金吾”与“中尉”沿革考·····	谭世保 (2·83)
建国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	李宁 冯崇义 (3·59)
党成立前的省港工人阶级·····	禔倩红 卢权 (3·65)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桑兵 (3·73)
中国五口通商时期丝茶出口贸易·····	杨源兴 (3·78)
丘逢甲乙未保台事迹考·····	戚其章 (4·57)
关于被英军劫夺的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	王维俭 张兴农 (4·64)
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洋人种·····	张小华 (4·70)
潮州志考略·····	陈香白 (4·74)
明代海南岛“贤才汇兴”局面产生的原因·····	符和积 (4·105)
蔡锷确曾参加过进步党·····	徐博东 (4·105)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刍议·····	何若钧 谭杰超 (5·61)
郑观应的商战论·····	常汝琪 (5·69)
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	王贵忱 (5·73)
略论广东古代陶瓷工艺的制作和发展·····	莫稚 (5·78)
广州象岗大墓“赵昧”印释·····	黄鸿光 (5·107)
清顺治年间的吏治·····	蒋祖缘 (6·77)
中法战争期间的广东防务·····	唐上意 (6·85)
丘逢甲爱国思想的发展·····	刘圣宜 (6·91)
丘逢甲“挟款潜逃”辩讹·····	徐博东 (6·121)
林则徐与云南少数民族问题·····	林有能 (6·122)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郑之洪 (6·124)

## 教 育

“三个面向”是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根本方向(座谈摘要)·····	(3·35)
青少年的自我教育·····	傅岩 (3·112)
“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战略任务和改革指针·····	何辛 (4·80)
学习陶行知毕生从事人民教育的献身精神·····	张达扬 李红梅 (4·85)
浅谈学习系统的自组织性与学生自组织能力的培养·····	张铁明 (5·100)
略论教育投资负担·····	黄静波 (6·109)
普通中学改革的根本点在于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孙喜亭 (6·120)

## 语言文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性·····	楼栖 (1·73)
瞿秋白的文学功绩·····	陈则光 (1·79)
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	黄保真 (1·84)
现代派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	石成 (2·86)
论中国古典悲剧·····	吴国钦 (2·92)
对于艺术规律的哲学探讨·····	贾益民 (2·98)
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的矛盾关系考察 ——兼谈艺术欣赏的特质·····	杜书瀛 (3·85)
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	陈颂声 邓国伟 (3·92)
那辗——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	林文山 (3·97)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	陈炜湛 (3·104)
容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张振林 (4·89)
闻一多论新诗	吴宏聪 (4·94)
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刘斯翰 何天杰 (4·99)
肖殷的文学评论	刘伟林 (5·84)
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 (未刊稿)	丘逢甲 (5·89)
关于《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	何国华 汤孟松 (5·92)
爱国主义的强音	
——谈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吴颖 许崇群 (5·94)
创造性思维三题	凌立坤 (5·106)
《周易》的美学精义	袁振保 (5·108)
苏轼在岭南的社会和文学活动	杨应彬 (6·98)
如何评价苏轼	王季思 (6·101)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吴定宇 (6·104)

### 新书评介

一本较好的哲学入门书	陈启方 (4·53)
美学领域的新开拓	
——陆一帆著《新美学原理》评介	陈衡 (4·54)
《中国近代史通俗讲座》评介	王颀 (4·56)
关履权《两宋史论》的特色	林若琳 (5·58)
一本受欢迎的哲学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	宁江 (5·59)
有益的探索 崭新的见解	
——介绍章沛的《思维规律论》	亦黄 (6·115)
读《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罗东升 (6·117)

### 书海酌蠡

古文字笔记三则	许伟建 (1·13)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商榷三条	官大梁 (1·43)
释“沟”	陈永正 (1·57)
“狗马病”辨	董志翘 (1·67)
《明史·后妃传》中成祖妃正误一则	刘精义 (1·112)
《柳毅传》断句一商	何天杰 (2·29)
并非“爱国怀乡”诗	梁守中 (2·38)
李清照词二句解析商榷	靳极苍 (2·85)
也辨“哭庙”	陈潜之 (2·97)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倪祥保 (3·22)
西魏之亡当在何年	宦荣卿 (3·26)
邓世昌殉国情形考辨	廖宗麟 (3·64)
关于《幻缘记》传奇作者由云龙	官桂铨 (3·84)
《商颂》难句试释 (一)	晁福林 (4·11)
“少正卯”解	林集友 (4·47)
吴趸人的一首佚诗	官桂铨 (4·84)
《商颂》难句试释 (二)	晁福林 (4·112)
《辞源》勘误一例	言之 (5·60)

说“儿”	包延毅 (5·72)
温肃事迹考辨一题	张解民 (5·88)
《鲁迅全集》注释正误一则	黄朴民 (5·109)
“雀”辨	刘树华 (6·34)
“屯, 难也”辨	张桂光 (6·69)
《商颂》难句试释	晁福林 (6·84)
关于《碧梧苍石图》题词	官桂铨 (6·103)

## 青年论坛

谈谈哲学的社会功能	刘德福 (6·41)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	徐伟新 (6·43)

##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	颜泽贤 (6·70)
谈谈信息论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梁桂全 (6·74)

## 开发岭南的先驱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何维鼎 (6·96)
------------	------------

## 学术动态

广东省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1·20)
中学历史教研会举办历史教学成果展览	(1·36)
广东语文学会举行古典文学学术讨论会	(1·92)
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成立	(1·92)
广东经济学会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学术座谈会	(1·92)
全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1·113)
广东省科社学会举行年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1·116)
原广东语文学会分别建立四个学会	(2·18)
广东经济学会召开理事会	(2·63)
广东省纪念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2·72)
广州市委研究室和市外经委邀请学术界举行情况报告会	(2·82)
全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广东召开	(3·72)
广东社会科学界纪事(1984年1月—3月)	(3·封三)
《广东社会科学》创刊	(4·22)
广东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讨论人的价值问题	(4·36)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4·104)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4·111)
广东省小经济研究会成立	(5·20)
广东成立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	(5·57)
广州国际金融学会召开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国际金融学术讨论会	(5·99)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5·110)
为适应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 我省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	(5·111)
广东哲学界座谈哲学与改革问题	(5·112)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惠州举行	(6·64)
广东经济学界讨论招股集资问题论点综述	(6·126)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八月至九月)	(6·127)



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总第六十七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2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4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095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